

炎黃春秋

11
第 期
2013年

高锴：全国人大工作见闻

1970年前后我在公安部

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1952年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俄国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说

目 录

亲历记

- 1 高错: 我在全国人大的见闻与杂感 邢小群 丁东采访
 10 1969年至1974年我在公安部 施义之 口述 陈枫整理
 19 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韩爱晶

求实篇

- 36 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吴之理
 40 川北的红军“冤烈” 孙丹年
 46 “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 洪振快

怀人篇

- 53 悼于光远老 吴象 口述 吴阿丽 整理
 58 吴江的“意外遭遇” 徐庆全
 64 女儿心目中的饶漱石 陆兰沁

春秋笔

- 68 安志文谈高岗 杨继绳

沉思录

- 71 我的信仰历程 张泽石

往事录

- 77 汪东兴: 毛泽东不同意江青进常委 杨银禄

一家言

- 78 改革要有时间表 宫希魁

人物志

- 80 宋平在甘肃的两件往事 邹雅林

品书斋

- 84 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
 ——读《红尘冷眼》 董国和

海外事

- 86 俄罗斯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说 马龙闪

编读窗

- 93 读者来信摘登 白拉都格其等

顾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蠡	李大同
李冰封	李步云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 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谦	雷 颀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社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编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行部 孔 屏(主任)

办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森赵闻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 辑 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68539058

财 务 部 010—68525374

办 公 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8元 全年定价 96元

高锴：我在全国人大的见闻与杂感

○ 邢小群 丁东 采访

时 间：2012年11月26日、12月2日
 地 点：高锴家
 被采访人：高锴
 采 访 者：邢小群 丁东

在人大法制委员会

邢：您从1982年就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工作，此后一直在全国人大工作，直到离休。我想请您说说在人大法制委员会的见闻。

高：人大是议会的一种形式，代议制的一种。人大有两个功能：一、宪法规定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民意的集中代表。二、它有立法权。在立法方面，不管怎么说这几年的成绩应当肯定。我国现在不是无法可依，而是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很大的进步。至于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那是另一个问题。但人大的最高权力始终没有实现。

为什么一定要开会呢？因为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每年定期开会，才能体现最高权力，而人大常委会是在闭幕以后行使权力。

人大代表代表谁？代表选民。人民的意志就可从各种渠道集中到这里。

有人说：我们不像西方的议会，他们是代表各自的利益集团，互相争权夺利，而我们每个代表都是代表国家利益，全民的利益。问题是全民利益是由谁认定的？是领导认定的。你个人怎么知道按照全民利益应该投票给姓张的，还是姓王的？事实上，每个国家都存在利益集团，各地区，各民族，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团体，各种宗教信仰，各种不同职业，都有不同利益。问题在于公开、公正、透明地处理各个不同集团的利益，要

达到平衡、平等、和谐，这正是人大开会的目的。

人大不是劳模会。上个世纪90年代我到兰州，发现省煤管局一个副局长很有水平，很有见解。我说：你们省煤炭系统有两个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你参加会可以把煤矿的现实问题充分反映一下。他说，不行，名额内定选两个一线工人，他们反映不了煤矿的问题。我在煤矿那么多年，太熟悉了。第一线煤矿工人在工作面的时间是8小时，下去一趟走两小时，从地下走到地上来又是两个小时，还要花很长时间洗澡，然后再回家。上工就要用去将近16个小时，选这样的人当人大代表，他可以反映自己工作面的情况，其他的事情他不知道。因为交往的人很少。

谁当人大代表，实际上大多是领导选定的，是领导满意的人。群众只知道他姓什么，年纪多大，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他们来开会，先是听报告，再举手或投票。分组讨论，大都是颂扬领导，或是汇报成绩，多数代表是各级官员，下级官员让上级知道我干得怎么好。开会一片歌颂，没有辩论。外地不少代表有空就溜，他们要完成本地领导交代的任务，拉关系，跑项目，跑计委、建委。不能说会上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即便提出了，媒体也不报道。于是，每年开会都是“形势大好！”

相对来讲，政协的简报有点看头，人大的简报没有看头。什么叫团结的大会？听不到不同意见的会；什么叫胜利的大会？按原计划圆满开完的会。

彭真印象

高：听说在延安时期，人们说彭真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他忠实贯彻毛泽东的路线，但他是有思想，有独立见解、独立人格的。薄一波在他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里就讲了，

彭真在七千人大会期间,1962年1月18日发言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次日,陈伯达就发言对彭真进行指责,说:“彭真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薄一波在书中说:“他当时敢于这样披肝沥胆直言,是很不简单的。”

大跃进高潮时,彭真让崔月犁在八宝山附近的鲁谷村弄了两分地,搞试验田,我就在试验田里干过活,用最好的灌溉,最好的种子,深挖地,密植,农业专家帮助指导,但生产粮食也就是七八百斤。为什么搞这试验田?显然是彭真对大跃进的一个思考。1961年畅观楼会议,是彭真为代表的北京市委,对大跃进以来方针、政策的反思。文革中,“畅观楼事件”成为彭真的一大罪行。

反右派时,北师大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参加了章伯钧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他那天迟到了,没有说什么话。反右一开始,毛泽东把这次会议称作“六教授会议”。(六教授是指:费孝通、曾昭抡、钱伟长、黄药眠、吴景超和陶大镛)不但全国所有报纸都猛烈批判,北师大也组织全校师生大会批斗。越是得意的门生,批判得越厉害。他伤心已极。有一天,在师大体育场召开批判大会后,忽然有人对他说:有位领导要跟你谈谈。他想,大概是要下放劳动了,要处理我了。他去到主席台后面一间小屋里,惊异地见到时任统战部长的崔月犁。崔月犁两只手搭住他的肩膀,温和地说:你以前的历史,市委是了解的;你在这次运动中有什么问题,以后也会搞清楚;你要经得住考验,保重身体啊。”陶大镛说,“那时候我已经不想活了,听了这几句话,才决定要活下去。”后来我和崔月犁谈起,崔说:有这么回事。刘仁和彭真研究,认为陶大镛解放以前是进步教授,讲授社会主义,他在鸣放中,也无出格言论,只因毛主席给定了性,市里无力挽回。我了解知识分子最重视名誉,尤其被所在的学校学生批判,对他精神上的打击一定严重。这么个有学识的教授如果一下子垮了,怎么办?怕他自杀,所以,让我做些安慰工作。当时,只能说这几句话。我问崔月犁,彭真的关照是不是大棒加胡萝卜,软硬兼施?崔说:“不能这么说。毛主席搞错了,市委能

怎么办?只能私下做些挽救工作。”

1957年,毛泽东鼓动知识分子鸣放,搞所谓“阳谋”。《人民日报》社长邓拓跟不上,毛泽东骂邓拓:“死人办报”。撤掉邓拓的《人民日报》社长职务,彭真却把邓拓调到北京市委做书记。这显然也是对毛泽东的一种抵制。

后来,邓拓和廖沫沙、吴晗一起在《北京晚报》开专栏,发表《三家村札记》。邓拓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白开水最好喝》等杂文,讽刺了“大跃进”。文革开始,邓拓是第一个自杀的著名人士。听说他是服水银死的。水银可以使尸体笔直,表示刚强不屈。还听说,他留下了一封遗书给彭真、刘仁:“我牵连了你们,对不起你们了。”

彭真有人格魅力。我做统战工作,和老舍先生、乐松生有较多接触,感到他们对彭真心悦诚服,把彭真看作党的化身,极为信赖。“文革”开始后,老舍先生和乐松生(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先后自杀了,我认为,跟打倒彭真有关系。他们满腔热诚跟着党走,跟着他们心中的党代表走,而彭真一下子却成了“反党”头子。他们不能理解,失了信心,人生一片迷惘,自杀成了解脱。对高层领导人,我觉得不能光从表面上看。他们在党的全局利益下,在毛泽东大权独揽的组织纪律下,即使并不赞成,也不得不这么做。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例如,拆北京城墙,使这么伟大的文物毁于一旦;再例如,彭真在1957年前后说过政法部门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等等,都是错误的。但这是不是他的本意,还是服从组织决定不得不如此呢?到了“文革”,他是忍无可忍了,他坚持“批学阀”,反对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坚持“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坚持保吴晗等人,很有义气和骨气。他明知道得罪毛泽东,也不顾了,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文革”以后,彭真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他对全体干部讲:我在国民党时期被关过四年半监狱,在共产党领导下却被关了八年,建国前,我的很多好战友牺牲了,被敌人杀害了,可是,建国后,也有好几个战友死在自己的监狱里。从进监狱的第一天,我就一直在想: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主要是没有法制!一次习仲勋和彭真谈话,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得住像

文革这样的压力就好。彭真说：“建立法制，就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压力。‘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

彭真在六届人大当选委员长，在立法方面起到很大作用。我在人大十年中，先后参加了《民法通则》《继承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出入境管理法》《义务教育法》《人大议事规则》《选举法》等10多个法律的研究和制订，也曾多次参加研究撰订迄今尚未出台的《新闻法》《出版法》和《结社法》等法律草案。彭真在法制委员会时拼命工作，头一年出来五个法。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修改草案，半夜十二点后把稿子送彭真家里，他总是连夜进行修改，第二天清晨就把稿子退回，进一步研究修改。一次他发烧，中央开会讨论《刑法》，他让护士打了退烧针，坚持参加会。

彭真在人大常委会上，再三强调：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常委是它的常设机关，我们是集体权力，没有个人权力，退下来的部长到常委会来，要记住我们现在不是行政人员，没有任何行政权力。但是，我们一百四十几个人大常委会委员要集体决定国家大事。这是多大的权力啊！

现在有人提出：人大必须确保党的主张，通过立法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必须确保党提出的领导人选在人大会议上通过。还说，人大是党的工具，凡事听从党的指挥。按照这种说法，党委的意见，人大必须确保通过，那么这样的会就是“走过场”，这样的决议就是“橡皮图章”。这跟彭真主张的“充分讨论，民主决定”是不一样的。彭真还说过，人大和党组织的关系，政治上服从党的领导，主要指政治方针和思想的领导，但组织上不是从属关系，并没有一条规定说人大一定要服从党委。反过来，人大的决议，所有的人都要服从，共产党员不例外，党委不例外。

在彭真主持法制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期间，立法工作很活跃。法制委员会集聚了一批在“以法治国”的同道，业务骨干大半是解放前清华、北大、师大等大学毕业的老大学生，包括6位改正的“右派”。他们都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敢说敢为。社科院的王家福研究员曾评论说：“我感觉法制委员会的很多同志，有一股志在必得的使命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那时，法律委员会的组成就很有意思。副主任张友渔和雷洁琼曾



1981年6月，习仲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

多年任职燕京大学教授；副主任宋汝棼、项淳一都曾经在燕京上学。他们既是老革命，又是知识分子，思想活跃，敢说敢为，每次开会讨论都很热烈，什么意见都提，言无不尽，滔滔不绝。我觉得那是个立法的春天。后来再也见不到这样热烈的讨论了。

关于习仲勋

彭真同志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法制委员会主任改由习仲勋副主任兼任。他领导我们组织起草《民法通则》。先后搞了几份草案征求各方面意见，反应都不够好，主要认为草案文字“法言法语太多，看不懂”。一次仲勋同志找我们几个民法室负责同志讨论。有人说：“提这些意见的人，不懂起码的法律知识，可以不理他们。”仲勋同志听了很生气，说：“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对不同意见应当欢迎，我和他们一样也不懂法言法语，就不能改得明白通俗一点吗？定出法律来大家看不懂，这样的法律能普及吗？”他当即邀请语言学家吕叔湘来参加会议，当面要求吕老帮助我们修改，并指定我（由于我当时是民法室负责人中较年轻的）把草案和有关资料送吕老家去，按吕老意见修改。仲勋同志说：“你听吕老的，他是语言学家；不要听我的，我不懂！”一个堂

堂的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这样高层领导负责人,当众说“我不懂”的,仲勋同志是第一人。后来,我去了吕老家三天,他把草案一字一句地斟酌修改,改掉了不少重叠的或含义不清的字句。

第一次讨论《民法通则》草案,是个大热天,人民大会堂一楼会议室开足空调很凉快,而我们办公在四楼上,为节省用电,不开空调,个个汗流如雨,民法室负责人中,当时唯有李由义称得上法学家,他是被公认的北大法律系“四大才子”之一,对《民法通则》的制定极为热情,又极为认真,为了向仲勋说明有关情况,从凉爽的一楼到火热的四楼下四次,突然因脑血栓昏厥在会议室门口。仲勋同志立即站起身,呼叫着:“快用我的车送北京医院抢救!!”他急得说话有点结巴了。正是由于坐了他的车,交警看到立即开绿灯,李由义同志被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北京医院抢救室,挽回了生命。李由义送医院后,习仲勋还情绪沉重地对大家说:“是个人才啊!可别出了事啊!”他的诚挚,让人感动。

关于傅冬菊

傅冬菊是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她和崔月犁合作创造了战争史上一页传奇。

冬菊和爱人周毅之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原在天津《大公报》任记者。北平围城期间,地下党把她调来北平,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当时,国民党中统对傅作义监视极严,崔月犁负责和她联系,每次见面都冒着很大风险,但他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一次,傅冬菊把傅作义每天做些什么,都详详细细汇报,崔月犁当天就用秘密电台传给北平城外的解放军大本营。聂荣臻司令员表扬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真清楚,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的,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对我军做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我是1951年认识傅冬菊的。那时,有一种不健康的言论在革命队伍中传播,说什么“老革命不如新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说傅作义兵临城下,为保命投降,却当上了水利部长,连他的

大小姐也沾了光。傅冬菊气得找崔月犁诉苦。事后,崔月犁说:有的农民参加了革命,是为了“三十亩地一头牛”;傅冬菊参加革命完全是为了国家,为了革命。她真诚热情,是个好党员,优秀情报员。即使是傅作义,他是几十万军队的统帅,围城时要走也容易,但为了千年古都不遭毁灭,为老百姓和老部下的生命安全,他起义了,“对人民立了很大的功”,这是毛泽东说的。

后来,傅冬菊在《人民日报》任北京记者组组长,写出很多好文章。一次,她来北京市委采访,回身离开时,刘仁叫住她:“等等,傅冬!”傅冬菊站住了,刘仁快步上前,把她衣服领子后面上的一根小树杈子轻轻摘下,说:“它会扎着你的。”刘仁是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地下斗争领导人,日寇和国民党特务机关都畏之如虎,对傅冬菊——一个年轻的部下如此爱护,像是老大哥对亲妹妹一般。这虽是一幕细小的情景,却长久地留在我脑中。

关于李葆华

李葆华是李大钊的长子。解放时任北平市委副书记,后来调水利部任党组书记。“文革”前在安徽任省委书记、省长,以艰苦朴素闻名,爱护老百姓,被老百姓奉为“李青天”。但在“文革”中也遭到造反派的围攻。

1985年整党,主要查“文革”中的问题。高层的意思是,“凡是造反派头头,一个不能用。”我所在的民法室,有个干部叫吴崇其,曾在1967年任安徽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大家认为他是造反派头头肯定无疑了。但他自己解释说:“我是听从省委书记李葆华指示组织的红卫兵,怎么说‘造反’呢?”在当时的气氛下,百辩难明。为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我千方百计找到李葆华的电话,他答应见我。

那时,李葆华刚从财政部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职位上退下来。这位全中国管钱的最高官,住的却是一个普通的小三间。进客厅,唯有李大钊亲笔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副对联耀眼,其他如沙发、桌椅、电视机都很陈旧,窗子上的纱帘都有几处破洞,地上铺的是北戴河出的草编的地毯,我觑了一下里屋(卧室),只见床还是上世纪50年代那种木板床。真是廉洁得

不可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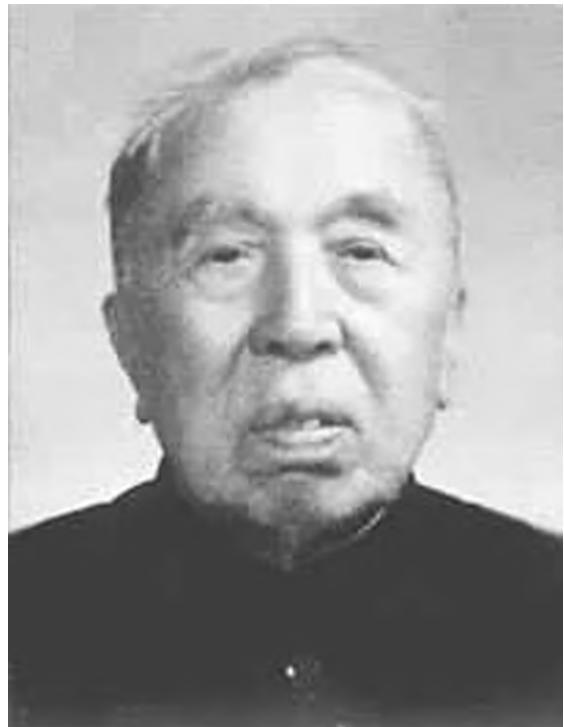
葆华同志说：吴崇其的红卫兵确实是我组织的。那时安徽的造反派红卫兵把省委机关包围起来，我们没法工作，就想了这么个办法，也组织一个红卫兵，让他们保卫省委。经费和驻地都是我批准的。组织部选了吴崇其做这个红卫兵的司令，我不认识他，但也是我同意了的。不久后，我还是被“打倒”了，被迫游街，这天才见到吴崇其，他被扣上“坏分子”帽子，游街时还上了手铐，而我们几个省委负责人只是戴上“走资派”帽子，没有戴手铐，当时我就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年轻人，委屈了他。“文革”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他道歉。现在正好，你来调查，我正式声明：这个红卫兵是我们组织的，是完全错误的做法，主要是我的责任。如果需要，我可以写书面检讨。

我把找李葆华调查的情况向整党领导小组汇报，吴崇其的问题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吴崇其感谢我为解决他的问题做调查，我却感谢他为我创造了拜访李葆华的机会。我亲眼看到了掌管亿万财产的“财神”这样俭朴，这样诚实。

关于许德珩

许德珩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五四运动时，他是学生领袖，撰写过《五四宣言》，是著名爱国进步人士，1979年加入共产党。1980年至1982年，起草修改宪法时，他是“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在最后一次修改委员会开会时，主持宪法修改工作的彭真亲自朗诵草案条文，念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句时，坐在主席台一侧的许德珩插嘴说：“应改为工、农和知识分子联盟”。彭真解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农联盟已经包括知识分子了。”随后，彭真又从头念这一句，念到此处时，许德珩再一次插嘴：“应改为工、农和知识分子联盟。”彭真再一次耐心解释，许德珩才默然无语。

“1982年宪法”（草案）提交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时，赞成票3037张，弃权票3张，弃权者中很可能就有许德珩。讨论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个人坚持己见也是好事情，历史将会做出正



张友渔

确判断。许德珩当时已年逾九十，他的坚持，使我至今难忘。

关于张友渔

北京解放时，彭真任市长，张友渔任副市长，当时只有他一位副市长。他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社会学部，曾任北京《世界日报》总主笔，重庆《新华日报》社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学识渊博，年事已高，但对法律的熟悉，无人能及。1985年讨论《义务教育法》时，他坚持不同意当时国家教委主任批示的草案中关于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收杂费”的规定，他说：“如果可以收杂费，将是无底洞。”何东昌来电话说，这是国家教委主任上任后批的第一个文件，最好不要退回去。当时人所共知，国家教委主任是高层领导属意的“政治新星”，要维护其威信。张友渔说：“草案规定有错误，为什么不退？”人教委的领导也劝张友渔：“暂时同意了吧！以后再修改”。张友渔凛然说：“我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但是要把我的意见记录在案。既然称为义务教育，就应不收任何费用，还应该提供书籍、午餐

等等,否则,不如改称《小学教育法》。

对于《新闻法》他明确主张,必须以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为宗旨。限制条款是例外,目的也是为了保证自由。他反对出版前审查,主张出版后如违法进行追惩。报刊媒体是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载体,决不能制定违反自由、限制自由的《新闻法》。

王光美的一句话

王光美去世前住在木樨地22号楼,和崔月犁隔门而居。一天,我见到她,异常消瘦。我在上世纪50年代多次见过她,她曾经骑一辆女式自行车,穿着背带式工装裤,来市委统战部看望崔月犁,和大家嘻嘻哈哈,完全是女学生派头,一点没有架子。几十年不见,苍老得快认不出了。我趋前向她问候,说些慰问的话:“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我们永远怀念他。”王光美严峻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不!少奇同志还没有得到彻底平反,他是被陷害死的。”我一时愕然。等王光美离去之后,我才慢慢体会到她的意思:少奇是被陷害死的,陷害的含义是无中生有,捏造罪名,置人于死地,少奇同志身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为革命立过巨大功勋,却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状,他是被蓄意制造假证据陷害死的。这样震惊世界的罪案,至今没有深究,平反怎么能说彻底呢?

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北京部分设在翠明庄(东华门附近)办公,急需要英语翻译,特别提出不要中共党员,避免国民党特务对有关人的怀疑。崔月犁熟悉王光美一家,她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她思想倾向中共。就找她希望帮助中共代表团解决翻译的燃眉之急。王光美当时辅仁大学毕业,正准备去国外留学,听了崔月犁的话,毅然参加了中共代表团工作。1947年国共内战严重,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王光美跟着去了延安,在延安入了党,后来和刘少奇恋爱结婚。

胡乔木起草修改宪法

邢:您刚才提到胡乔木对宪法的看法,您可



胡乔木

以说说对他的印象?

高:据我所知,1980年9月,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决定设立秘书处,由胡乔木任秘书长。但是后来,乔木身体不好,需要休养,从1981年7月起,宪法修改工作改由彭真主持。在胡乔木主持期间,曾提出一个报告《关于修改宪法的几个问题》。报告中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成为真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是现在人大代表人数过多,不利于大会讨论决定问题,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因此,可考虑分设“地方院”和“社会院”。“地方院”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组成。“社会院”,由各行各业的代表组成。两院人数相等,每院六百人,任期相同。享有平等的权力。这样,可以使代表们更好地从各方面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不仅能对政府起监督、制约作用,而且两院可以互相制衡,使通过的法律更为严谨、准确,实行的监督更为有效。

后来,考虑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历来只有一院制的传统,如果搞“两院制”,协调起来非常麻烦,没有采纳乔木的这个方案。

关于我国是否建立联邦制,早在1949年建国前夕召开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讨论

过了。那时,很多人认为,苏联是“联邦”,我们应当效仿苏联。李维汉提出,苏联的各少数民族占总人数的一半,而我国的各少数民族加起来才占到全国人数的百分之六,苏联的情况和我国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应当成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同时,实行民族区域地方自治。会议采纳了李维汉的意见。

由此可见,“两院制”和“联邦制”都是可以讨论的。宪法是我们全国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各政党团体、各行各业组织的共同的根本活动准则,宪法的规定必须遵守。但是人们对宪法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研究修正意见的。随着时代的前进,宪法也将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修正、补充是必然的。如果想都不准想,还能进步吗?

在1982年宪法通过前半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胡乔木负责修改制定新党章。这个党章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此以后,每届党代会修改党章,都明确规定这一原则。胡乔木1982年9月在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还明确说:“党是国家和人民的领导力量,但它并不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党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工作。”他为制定1982年宪法是做了贡献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

高:我在上世纪50年代做过北京市人大的工作。80至90年代做全国人大的工作,前后20多年,对人大制度有些想法。

有人说,我国人大和西方议会必须划清界限,根本性质不同。有人说,人大不是议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各国议会有一院制,也有两院制,我国人大是议会的一种形式。我国人大代表团和各国议会互相访问,参加了国际“议会同盟”,委员长去年就出国参加了“世界议长会议”,这都说明我国人大是议会,名称不同而已。所谓议会就是代议制,由少数人代表各阶层人民讨论决定国家大事。议会起源于英国,历经七百多年的演变,证明是代表民意的好方法,各国竞相仿效。现在世界各国几乎都建立有议会,当然,有的是真民主,有的是假民主。但是不可否认,西

方各国议会在限制、监督权力方面确实起到了作用。以美国为例,它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总统兼海、陆、空军总司令,可说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但尼克松仅由于“水门事件”,议会就逼使他辞职,告诉他如不辞职,将立即启动弹劾程序,有可能落得刑事处分。尼克松闻听后马上乖乖放弃总统权位。克林顿的“莱温斯基绯闻”,在普通美国人生活中是小菜一碟,但国家对总统的道德要求很高,更不许说谎。于是,全世界都在荧屏上看到堂堂美国总统在议会的逼问下,含泪承认“犯有不正当的性行为”。毛泽东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可以肯定的是,像中国的反右派、大跃进、文革的疯狂,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主要是由于议会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当然,还有言论自由、舆论监督。西方议会有历经数百年的运行经验,这么大的优越性,我国人大应当学习和借鉴他们好的经验。

但是,我国人大确有“特色”,需要研究解决。建国初期,我党力量还较小,党员代表占少数时,人大开会决定政府方针是按照世界各国通例办的,即党员代表统一按照本党的决定和指示投票,违反本党指示就得退党。但我国现在的情况和外国比较和建国初期比较,大不相同了。全国现有8000多万共产党员,在全国人大代表3000人中,中共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党员代表都按照党的指示投票,也就不要开会了。会前早就定局,每年花几千万元经费开会只是装样子,走过场,干脆开党代会通过决定国家大事,人大根本不需要,是个多余的机构。但是,如果进行一些改革,人大这个制度还是有利于人民民主,有利于集中人民的意志,我初步想到下列各点:

(1)应当恢复实行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三三制”,即中共代表限制为三分之一,进步人士和各界非党成员各占三分之一。

(2)中共党员代表各自代表选区人民利益,反映选区人民的要求,汇合起来就是全国人民的意志。每个代表都有独立判断和自主投票权。党中央可以组织党员代表研究讨论,但不统一决定他们如何投票。

(3)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人民代表有权组织讨论,可以串连研究,可以自主决定投票。

只有这样,才叫民主讨论,才叫集中人民的意志,否则,只是贯彻领导意图。如果未来,又出来一个马克思+秦始皇,如何是好呢?

有人主张人大改成议会,这没有用。现在人大开会是一年一次,是个喜庆的节日,媒体套红,红旗招展,代表打扮的花花绿绿,那是喜庆,是光荣,是走过场。到会上就是让代表们听报告,学习领导讲话,表态。没有大会讨论,只有按省分组讨论,分省讨论也是几十人、上百人的大会,坐在中间重要位置的是省委书记、省长。代表的百分之七八十也都是官员。县、市长发言了,很高兴,可以跟省长见面了,有的是奉承领导,有的是宣扬本县、本市的政绩,有的是讲点鸡毛蒜皮的事。都有稿子,毫无味道。

艾青是1980年代的全国人大常委,当了几届我记不清了。对艾青我很佩服,因为小时候念过他的诗。我发现他开会很认真,每次开会都准时出席,每次都做记录。人大常委会两个月开一次,每次四天,一年开六次会,一届五年开了三十次会,没有听见他发过言。我是记录组成员,忍不住过去请教,为了不显唐突,背诵两句他的诗,他立刻喜笑颜开。我说,艾青同志,几十年前就念你的诗,多想听听您的意见,你怎么不说话啊?艾青说:小老弟,我是犯过很多错误的人,认识不清楚,政治水平低,党让我做人大常委会委员,是党的安排,是给我很高的荣誉,我要认真的学习,认真听大家的发言提高自己。艾青很虚心,但他辜负了选民的希望,他没有弄清楚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责任。

还有另一种情况,哪一年我记不清楚了,熊复(原《红旗》杂志总编辑)把我骂了一顿。他知道我是记录组的成员,火气冲天的过来骂我压制了他的言论。他是反对开放的,再三讲“苍蝇”从纱窗外要飞进来,要防止帝国主义通过经济手段对中国怎么样。他生气,因为简报只登了他两三句。他当时被看作是“凡是派”,因此格外生气。我向领导汇报,另行全文印了他的发言。我把重印的简报送给他。他问:为什么别的简报人手一份,而这个简报每个组只发几份。我没法回答,他气得缺席几天。其实,他反对开放的发言也有

正确的部分,有值得参阅的,需要警惕的。人大开会会有不同意见,能启发思考,利大于弊。

1989年3月,这一天的人大全体会议是少有的,彭冲主持。他主持通过关于人大常委工作报告的决议,按惯例问三声:“现在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如果都没意见就通过。”以往惯例都是没有意见,顺利通过。但这次,中科院物理所一个副所长(人大代表)站起来,彭冲问:“你是有不同意见吗?”他说:“我是有个意见。决议上不是讲要年轻化吗?可是现在看看,怎么主席台都是老年人?”全场一片哗然。他刚做人大代表不久,不懂惯例。黄顺兴从台湾回到大陆,在农科院从事科研,他接着放了一炮,说周谷城年龄太大,不适合再在人大工作。他们两人在台前正说着,台下也闹哄哄的时候,从主席台上后排走下一位老者,到台前说:“我本来就不想做人大代表,是你们要让我做的。我愿意立即交差,响应年轻化。”台下一片笑声。会后,议论纷纷,有的说:今天的会不像话,开得像西方国家的议会了,是资产阶级的一套风气。我遇见从主席台下来的方毅同志,问他怎么看。他说:“很好嘛!气氛活跃点,物理所那个同志提出的意见不错嘛!”同样的两件事,总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彭冲,原是政法委书记,取消了政法委以后,他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大概在1985年的一次什么会上,我提出关于财产申报问题,彭冲反问我:怎么申报,今天我砸了两个暖瓶,你怎么报?其实那时,我也不太懂。过了几年,我要办离休了,领导请几个离休干部吃饭,散席时,他忽然对我说:我要送你一幅字。还请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做财产申报?

我记得那时不叫财产申报,是财产登记,反正是新鲜的事物。可见他脑子里一直记着。我简单地解释道,如果一个官员上任时,申报自己有十万块钱,他每月工资2000元,五年任期,不吃不喝,也就二十多万。如果那时有了四十万,一百万,就肯定有问题。不是计算那个暖瓶,不算小地方。他说:有道理。这样申报确有好处。后来他送了我亲笔写的一幅字“高锴同志惠存:老来红”。这是首长的鼓励。

几年后,他也退了,约我去谈谈,谈到政法工作,他说:“哎,又走了老路了。”我说:我给你写个

自传吧,你当过上海市市长,南京市市长,你思想非常清晰,你谈谈我给你记下来。而且不一定现在发表,以后适当的时候发表,甚至不是我发表,留给后人发表。这将是历史的珍贵资料。他想了一阵子回答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功过是非总有明白之时,让后人去总结吧。”

“四人帮”刚粉碎时,有一股励精图治的风气。那时还崇尚朴素,政协委员全部安排住各大宾馆,而人大代表全部住各机关招待所,吃饭也在招待所了。有一次我去看望辽宁省的人大代表团副团长钱令希,一间屋子三四个床,几位省领导一间大屋子。直到1989年以前基本都是这种风气。现在这种风气变了。

邢:我看到您1983年写的一篇内参《对民主党派现状分析和未来预测》,您对中国民主党派的性质分析很到位。

高:我当时应邀参加中央统战部的一次理论讨论会,我写的这份材料被印发为领导参阅资料。我想明确民主党派的性质。我国目前的民主党派是“在野党”吗?不是。因为有不少党派领导人被安排为国家领导人。那么,能否叫“执政党”呢?不能。因为各民主党派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几年,有的民主党派人士被委任为国务院某部部长,但实权还是在中共党组手里,虽能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能决策执政。叫“少数党”行不行呢?也不行,因为西方议会政治中的所谓多数党、少数党,就是反映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既非“在野”,就不能叫“少数党”。理论上讲,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党的方针、政策可以提出不同意见,所谓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意见。那么,能否叫“反对党”呢?更不能,因为各民主党派是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那么,能把各民主党派说成是我党的“兄弟党”吗?也不能那样说,因为我党同各民主党派在法律上虽是平等的,但在政治上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并不是平等兄弟党的关系。因此,比较恰当的提法还是:“友党”。这个提法对内对外影响都比较好。

各民主党派没有自己的政纲,严格地讲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即使如此,我仍然主张民主党派应该大发展。发展到几百万人,比我党8000多万人仍然是“小党”,有什么可怕呢?对民主政治有好处,对监督我党有好处。

世界各国议会控制政府,主要靠财政,而我们现在人大开会不讨论预决算。非洲一些国家欠我们的1000多亿元,一句话免了,人大批准了吗?对国外的援助数量大的,应该通过人大审议批准。我们对外援助中浪费太多了,从老百姓节衣缩食中把大量资金支援外国,最后落得人家痛骂和反对的事情还少吗?

计划不讨论,鸡毛蒜皮的事提不少。人民想谈的事不谈,最明显两个事情,一、“三公”消费提了多少年了,人大就是没安排讨论;其实“三公”消费经人大讨论是完全可以解决的。现在副部级以上退了休还给专车,请问是什么文件规定副部级以上给专车?包括部长因私用车都不对。而且在退了以后,绝大多数不是自己用车,是老婆儿女们在用。那天我在八一小学校门口见到一个给小孩送饭的,是爷爷的车,据司机说,他爷爷走不动路了,根本不用车,是专送小孙子的。早晚接送,中午送饭送水,这是谁规定的?

财产透明,阳光法案,这才是民意呢。按说人大是有权做出决议的。但主席团就是安排不上去。一些人就是怕阳光,怕透明,所以,在解决好权大还是法大之前,在解决好党和人民关系之前,在解决好人大和党委的关系之前,人大叫什么名称没有用,改叫议会、改成联邦院制都没有用。如果这些关系理顺了,人大真正能代表人民了,仍然坚持人民代表大会的名称和制度是最好的了。■

(高锴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原主任)

(责任编辑 黄 钟)

本刊调价启事

尊敬的读者:

感谢您对《炎黄春秋》杂志的支持和钟爱,为缓解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自2014年第1月起,《炎黄春秋》杂志每期定价10元,全年定价120元。希望您们理解并继续支持《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杂志社
2013年8月16日

1969年至1974年我在公安部

○ 施义之 口述 陈枫 整理

1969—1970年

1969年春节后,公安部参加干部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下放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五·七”干校。公安部除接待组和第三专案办公室外,业务组只留下40多名干部。部领导小组中留曾威、赵登程和我在京,李震、于桑随干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除原分工外,于桑分管的侦破组由赵登程负责,治安组交我负责。

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公安部出席九大的代表是张其瑞(原劳改局政治处的干部,九大会议结束后仍回干校)。在九大会议上,李震、于桑被选举为中央委员。24日九大结束,接着召开九届一中全会,李震和于桑从“五·七”干校回来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于桑提出要在“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就回干校去了。李震回部负责全面工作。

公安部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1967年1月夺权后,就割断了同各省、市公安厅、局的业务联系,同北京市公安局也如此。因此各业务组实际没有什么业务工作。治安组就决定作调查研究,组织了七八个干部,到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蹲点。

10月,林彪发布“第一号令”进行备战。李震在领导小组会上传达了国务院决定:各部委都要一分为二,公安部一部分留北京城里坚持工作,一部分到京郊西南山区备战。领导小组成员留北京的是谢富治、李震、曾威,我和赵登程到山区。我们在部内检查了原有的防空设施,等待着在国务院统一安排下去看地形。后来此事搁置下来,地形也没去看。

同时,为了战备要疏散犯人,赵登程专程到湖北、湖南、陕西勘察犯人疏散地点。回来后,领

导小组讨论确定把北京的犯人疏散到陕西,放在没有开工的国防工厂里,写了报告报送国务院,当时没有批,后来也搁置下来了。

召开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九大后,全国社会秩序渐趋安定,正常工作也开始恢复。1970年春节后,于桑结束了干校劳动回部工作。接着,原副部长刘复之也从干校回来复职。还陆续回来一批原公安部的干部。

1970年3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后,公安部领导小组讨论研究决定恢复公安部在全国的业务工作,恢复同各省、市公安部门的业务联系,筹备召开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过去全国公安工作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文革五年以来没有开过会。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准备会议文件,组织一批干部到各省、市调查了解当前公安工作的情况。

领导小组决定由李震、刘复之、陆石(原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朱万林(军队支左干部,原某师政委)、我等十余人到上海、湖南、武汉等地进行调查了解。李震因工作走不开,我们先走。

这次南下,暂时摆脱了复杂的政务纷争,大家的心情都比较轻松。我们先到上海,住在上海最繁华的大世界附近的大沪饭店。同来的北方同志对每天清晨都能听到倒马桶的吆喝声,及此起彼伏的刷马桶声很新奇,我对这些比较熟悉,回想起12岁时因家境贫寒到上海学徒就是先从倒马桶开始的。这一带过去是旧社会的红灯区,外表热闹,实际上周围房屋破旧,居住拥挤。我很久没到上海来了,解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变,我也从一个童工成为革命干部,可这里的市井生活依旧。

我们在上海听取公安各部门的汇报,了解了

一般治安情况。

6月,因公安部成立革命委员会,我和刘复之被部里召回。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是李震,副主任有于桑、曾威、赵登程、刘复之和我。委员有张其瑞等。同时取消领导小组成立核心小组,组长李震、副组长于桑、曾威,成员是所有的革委会副主任及张其瑞。张其瑞1970年初从干校回部工作,任部办公室负责人。

会后,李震和我们一起到上海。到了8月,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通知李震去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后面的调查李震就没有参加。

我们调查组从上海、杭州到广州,然后分两路。朱万林等人去武汉,我和刘复之等人去了长沙,再到武汉会合。我们所到之处,均是听取当地公安部门军管负责人汇报,诸如文革中揭发出哪些问题,造反派联合情况,当前社会治安、消防、交通等方面的情况。在汇报中也谈到对文革前十七年公安工作的评价问题,多数意见认为应该一分为二,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一般在听完汇报后我们在发言中都讲一些鼓励的话。只有浙江省的汇报中强调十七年公安工作没有成绩,是特情专政。理由以萧山县为例,认为萧山县的公安干警多数是原国民党特务争取过来的特情人员,以及被解放的旧政府留用人员。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对十七年的公安工作应该一分为二,不能全面否定。因此在他们汇报后要我们讲话时,我没有表态。请刘复之讲话,他也不愿意讲。汇报中各地对公安部门掺上军队支左干部都表示肯定,认为这是掺沙子。刘复之也一再说:掺沙子是必要的,不是一把一把地掺,应该一筐一筐地掺。

调查小组于国庆节前回京。国庆节后就着手起草第十五次公安会议文件。文件起草由刘复之负责,有陆石、朱万林等同志参加。文件起草了两个月,起草中对一些敏感问题也有分歧意见。文件中提出要处理好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防止逼供信、扩大化等六对矛盾,文件经核心小组多次讨论后上报周总理。

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1970年11月开始至1971年春节后结束,会议时间较长。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的负责同志,大部分是军队的军管干部(多数是副军职的军

事干部)和少量的原各公安厅老公安干部。会议由李震主持,中央直接领导(此时谢富治已患癌症住院),汪东兴、纪登奎经常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中反映强烈的问题有:一、文革以来公安部迟迟不同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部门恢复正常联系,不抓业务;二、如何估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公安工作;三、对“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有意见。在讨论中大家对“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意见最大。过去谢富治说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汪东兴说没有听到毛主席讲过这句话。为此李震专门写报告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得到毛主席指示:“‘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该提‘公检法彻底闹革命’。”

讨论中我向李震建议:十七年的公安工作应该一分为二,可以表态。李震说,这话我不能说,把问题提出来,请周总理说。

会议最后由周总理进行总结。周总理从红军时期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历史经验讲起,肯定了十七年公安工作的成绩,批评了浙江提出的十七年是特情专政的错误论点。也说到当前在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中发生一些事情也难免。同时周总理批评了公安部迟迟不恢复同各省、市、自治区的业务工作关系,说:文革初期不联系业务工作是对的,现在还不恢复业务联系是最大的失职。周总理在讲话中同意我们起草的文件中提出的公安工作六对矛盾,说要处理好这些矛盾。

全国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后,公安部恢复了正常的业务工作。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组织机构作了调整,设立了侦破、治安、边防、劳改、政工等组及办公室。从“五·七”干校陆续回来了一些原局级干部,如陆石、马剑等,与军队支左干部,按军、干、群原则配备了各组的领导班子。部核心小组的分工是:李震负责全面工作;于桑负责侦破组;曾威负责三办、劳改组;刘复之负责办公室、边防组;我负责政工组、治安组,赵登程按中央决定去青海国防二一一厂蹲点。

1971—1974年去固原地区平反

1971年9月14日,李震在核心小组会上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乘飞机外逃叛国,发现后,有人主张把飞机打下

来,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随他去吧。”结果,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

大家都非常震惊,事前都不知内情,谁也没想到党的第二号人物,毛主席的接班人会走到叛党叛国这一步。

国庆节后的一天,大家正在核心小组会上讨论此事,李震带来了国务院指示。李震说:“农林部的杨立功同志去了宁夏西海固地区,回来向中央汇报:西海固地区群众生活困难,发生过多次叛乱,一批批的‘匪属’产生,使一些生产大队发展党员没有对象,征兵没有对象,选举基层干部没有人选。周总理决定公安部去个副部长带工作组蹲点调查,配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干部摸清历次叛乱情况,进行平反。”在讨论谁去时,李震说他想去但走不开,我就说:“我去。”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包括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原五个县。1953年,西吉、海原、固原三县曾成立西海固回族自治州,故又称西海固地区。后调整为五个县,称固原地区,有时仍称西海固地区。该地区1.6万平方公里,人口98万,其中回族占42.8%,个别县如泾原县回族占97%,是以回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1971年11月,我带了十几名干部,有军队支左干部吴泮才(原某师政委),有老公安干部甘重斗(原内务办副主任)、张文炳(原政治部训练部长)、杨满才、许妙道、李景雨等同志。我们从北京出发到银川,部分同志是从笔架山干校出发到银川的。

到了银川,见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这时宁夏保卫部和银川市公安局已派人下去了,我们主要是配合他们调查研究进行平反。经研究,调查的重点定在西吉、海原,以西吉县夏寨公社车路沟为中心。我们分两个组,我在的一组住车路沟大队,另一组在车路沟附近。

二十一军当时驻陕、甘、宁,军部在宝鸡。军里从安全考虑,要派一个警卫排来,被我谢绝了。我要军里派几个医务人员,带些药品,也带上武器。这样晚上站岗,白天有小病也可以治疗,还可以为群众治病,同时自己起伙,一得几便。我们就住在车路沟生产大队的院子里。

当地地处黄土高原六盘山区,自然条件极

差,常年干旱,缺水少雨。山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生态失衡,粮食亩产量很低。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吃的主要是一些土豆和返销的玉米、薯干等,白面很少。很少吃到盐,更没有油。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与群众同吃同住,一天两餐,吃的是白水煮土豆、荞麦面饼,没有盐没有油,大家反映吃不饱。这里缺柴,烧的是牛粪和有限的麦秆、秫秆,不够烧就用铁丝耙草,连草根耙出来烧掉。这样年复一年恶性循环,黄土上的草越长越少。缺水,有的村庄只有个积少量水的水窖,大家都吃用这小水窖里的水。真是缺粮、缺柴、缺水、缺盐。我在刚进入固原地区的路上,看到一个老汉带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女孩身上只披了张羊皮而没有穿裤子,非常惊讶。到了村里,我看了一下,每家屋内只有土炕、土墩,炕上有一条破席和破旧不堪的棉被,有的只有破棉花套。一些极贫困户到了冬天,一家大小就围在炕上,有的只有一套衣服,谁出去谁穿,回来又蹲在炕上。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光了屁股,男孩子更不用说了。看到这样的景象实在不少,部队来的年轻卫生员都落了泪。

群众中主要是呼吸道、消化道的疾病。普遍的病是疥疮、蛔虫,不少孩子闹蛔虫大肚子。有病没处治,公社卫生院只有一两个大夫,但没有药,更没有医疗设备。随我们调查蹲点的医生、卫生员天天在村里给群众看病,给些常用药,或用针灸治疗,可解决不了严重的缺医少药问题。

在生产上看到的情况是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常年干旱,亩产量很低。农业生产只让种玉米、小麦、荞麦、土豆等粮食,不让种植经济作物(固原地区过去种过胡麻,胡麻油可以外销),而小麦、荞麦亩产量只有几十斤,玉米有时长势很好,但常遇雹灾、霜冻等自然灾害。生产工具落后,还是牛拉或是人拉的木犁。

当地是回族聚居区,但在领导上没有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不尊重回民习俗。不提倡养牛养羊,不论汉民、回民硬要响应每户养猪的号召,引起回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说:“现在强迫我们养猪,以后要强迫我们吃猪肉哩。”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没有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活动场所甚少,甚至原来每村有一个

阿訇负责念古兰经,负责宰牛宰羊,现在都没了。严重地影响了党群关系和民族团结,脱离了群众。还有平叛扩大化的问题。解放后十七年中这个地区的回民发生过八次叛乱。在处理叛乱案件中,由于政策上没有分清主谋和胁从,不少被裹胁、被欺骗的群众也被打击,家属成了匪属,造成了平叛扩大化,解决矛盾而又激化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为什么解放已经20多年,人民群众还是那么贫困?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不是亲眼看到是不会相信的。我们蹲点调查,主要调查了解这八次叛乱的情况,想尽快进行平反,落实政策,体现党对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关怀。同时,也了解其他方面情况。这一年固原地区产粮仅26万吨,除去种子、饲料,人均口粮所剩无几。人均收入仅47元(这是后来从统计局了解到的数字)。

我们在固原地区过了1972年新年。春节前的一天,我们正在包饺子,部里来电话要我回京。一方面要我汇报固原地区调查的情况,一方面因谢富治病重。我回京时,谢富治已经不能讲话,对他说话也没有反应了。

回部后,我向核心小组详细汇报了固原地区的所见所闻。李震要我写个书面报告上报国务院。周总理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把我叫去,沉重地对我说:“群众的生活那么苦,我们工作上有错误。”他当即批示对西海固地区进行救济,问我救济面有多大。我了解到山沟深处群众越困难,估计约70%需要救济。周总理决定拿出海军仓库积压的被服,按70%的需求发出救济。后来群众穿上了救济的军服。大家开玩笑地说:西海固出来的老百姓都是拉练的(指拉练的军队)。周总理还指示国务院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兰州军区卫生部等单位派出十多个医疗队下农村,给群众检查治疗。同时批示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干部来北京召开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指示我和农林部杨立功副部长参加。在汇报平反工作,谈到我们正在对八次叛乱的案情和档案进行了解时,纪登奎说:“不用那么细的查档案,宣布



1972年3月6日在现场审讯“反革命骨干”咸得有(右一是施义之)全部平反算了。”

按周总理指示,1972年1月24日到2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固原地区的负责同志,地区所属的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原五个县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宁夏来的同志表示:1971年中央政治局在听取自治区党代表大会准备工作的汇报时,指出宁夏的问题是党的政策落实不好,农牧业生产发展缓慢,特别是固原地区平叛扩大化必须纠正。但是半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没有有效地解决,这次召集我们到毛主席身边来开会,帮助我们分析情况,提高认识,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要认真开好这次会议,拿出切实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

在会议讨论中,大家认识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大汉族思想:认为回族“落后”,在工作中违反党的民族政策,不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造成了民族关系紧张化;在处理叛乱案件上扩大化,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被欺骗裹胁进去的基本群众也当作敌人,把大批家属当作匪属,给少数敌人以可乘之机,利用我们的错误煽动叛乱,进行破坏活动。再有农业生产落后,农田基本建设搞的很少,乱开荒,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很低,群众生活极为困难。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

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满腔热忱对待少数民族事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对平叛扩大化的错误,对逼供信造成的假案必须平反纠正,凡错判、错管、错戴、错划的劳动群众一律平反。对策划和组织叛乱分子按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根据认罪态度区别对待。会上也明确了平反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把党的民族政策和肃反政策交给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落实政策。

会议还研究了如何促进生产,要求国家支援什么。县里的干部提出要解放牌汽车、手扶拖拉机、电磨等等。我同杨立功同志的意见是,按当前地区生产情况,首先应该解决草籽、树种,从种草种树、养牛养羊抓起,增加生产,改善生态平衡(其实小块耕地用不上拖拉机,村里当时又都没有电,电磨一时用不上)。为各县解决了草籽树种,但县里并不太欢迎。后来胡启立同志任西吉县委副书记时,曾找过我,要我再帮助搞些草籽、树种,是我同农林部沙风同志联系后解决的。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会后写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上报毛主席、党中央。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发了中发(1972)22号文件,发至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将这个报告和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做了通报,肯定了两个报告的精神。

会后各方面的工作抓得很紧,除了原来进行试点调查的230多人的宣传队搞了15个试点,领导蹲点取得经验外,地县两级又组织了760多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平叛扩大化比较严重的133个大队落实政策,纠正扩大化的错误。

会议开罢,正准备再赴固原地区时,1972年2月29日,隆德县杨河公社中岔大队又发生了叛乱,这是全国解放以来该地区回民发生的第九次叛乱。以糟占林、咸荣华、咸得有等人为首,串联陕西省陇县,甘肃省灵台、张家川,宁夏的隆德、固原、海原、西吉等县11个公社的150余人,杀死了前来阻止其叛乱的隆德县保卫处长君连升和保卫干事杨效智,并抢去他们的手枪。

3月1日,李德生、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召我和杨立功去,告诉我们武装叛乱分子和民兵对峙在隆德县中岔大队的山头,要我们立即去平叛。

并对我说,你是二十一军出来的,二十一军在当地驻军,你去有很大的方便,临时需要动用一些兵力也好办。

第二天,我们乘专机到西安,换乘空军小飞机到甘肃平凉,平凉没有机场,就在塬上用石灰画了一个圈,作为临时机场。我们下飞机后在驻军六十三师师部吃了晚饭,赶到隆德县已是深夜了。

我们到达隆德县,自治区领导康健民和县委领导都在。当时听取了叛乱情况的汇报,知道叛乱分子糟占林是从外地来到隆德的,自称是大依玛穆,刚从麦加朝圣回来,说“在北京见到了林彪,林彪领导西北五省区,要我领导西海固回民,在西安与林彪会师”等等。叛乱分子打死了干部,夺取了武器。大肆宣传欺骗群众说,打死了干部,共产党不会罢休,胁迫村民一二百人上了山。

隆德县领导当即组织了一个民兵营第二天拂晓上山清剿。天黑后,叛乱分子下山占领村头的窑洞,民兵在外把守,想等天明后处理。等到天明,叛乱分子都跑了,首犯没抓到。由于叛乱分子有枪,老百姓害怕,民心不稳,天天跑反,影响了生产。这次平叛双方武装冲突中,干部民兵死13人,伤12人,击毙叛乱分子咸荣华、咸有忠等13人,伤十余人。

3日,开了一天县委常委会,杨立功同志和我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同时我与兰州军区取得联系,兰州军区请示了中央后派二十一军的一个连在交通要道将台堡驻下,镇住叛匪,稳定了民心。

3月6日,我建议到发生叛乱的现场去看看。我同杨立功、自治区及县里的干部一起,分乘三辆车出发。由于山高、沟深、路窄,许多地方汽车行驶困难,只能步行。我们到中岔大队,先看叛匪打死武装部干部的地方,再一家一户地看。有的家没有人,有的家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的院子里散着一地鸡毛,宰羊锅里散发出一股股腥臭味。我们走到一处院落门口坐下喝水,然后顺便到旁边的院子里看看,却发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在和面烙饼,烙的饼已有尺把高。在当地吃到小麦面是很不容易的,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上前问她家有几口人,她说两口。怎么两三口人烙了那么多的饼,疑点更大。我要同志们仔细观察周围的窑洞,看到一个窑洞上了锁,要她打开。进门后看到炕上有被

子,掀开被子、炕席,露出一个炕洞。我问那妇女:“下面有人吗?”妇女答:“没有。”我的秘书王京宗用手电一照,发现一支带刺刀的枪。我想首犯可能就藏在这儿,就喊话。经过喊话,下面先送出了枪,然后出来了一位公社革委会委员,原来这是他的家。问他话他支支吾吾,后来供出大依玛穆也在里面。要他下去,把大依玛穆叫出来。经过初步审问,这二人便是发动叛乱的首犯和主犯。案犯交县保卫处处理。

我们立即向广大群众宣告大依玛穆已被抓住,宣布凡参加叛乱的人只要向政府自首便不予追究,要群众安心生产。我们先后到被叛乱分子杀害的干部、群众家里看望慰问。为尽快弄清案情,自治区的一名领导干部同地区保卫部干部和隆德县的干部一起,组织宣传队到杨河公社中岔大队向群众交代政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追捕漏网的重要案犯。叛乱平息了,民心也安定下来。

这次叛乱,对落实中央召开的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带来了新的困难。很多党员干部对平反工作另有看法,有的干部说“2·29”事件的发生,说明现在的问题“不是平反,而是镇反”,甚至认为“现在搞平反是站在敌人一边”,把平反与镇反对立起来。我们从党的民族政策、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讲起,经过多次谈话、讨论,做这些干部的思想工作,多数干部的思想有了转变。我们要求地区各级领导在处理叛乱事件中认真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认真落实民族政策,纠正扩大化的错误,打破敌人妄图煽动群众干扰我们部署的阴谋。提出要防止急躁情绪和感情用事,不能随便抓人,已抓的人凡属上当受骗者,经教育后放回让其投入生产;除对在这次事件中牺牲的同志做好善后工作外,对对方死伤人员也要妥善处理。干部、群众的思想稳定,为落实座谈会精神铺平了道路。

1972年3月13日到17日,为了总结这次平叛的经验教训和进一步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固原地区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地区党委和五个县的县委书记、保卫处长及参加蹲点的宣传队长等,有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的所有成员,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康健民和领导成员张怀礼、蓝天民等。

对于“2·29”叛乱事件的总结,大家认识到,



1972年专机在机场降落,施义之(前排右一)正在走出机场。

由于过去违反民族政策和平叛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实际掩护了敌人,孤立了自己。敌人早在去年六、七月就开始串联活动,事件发生前两天即2月27日,他们杀鸡宰羊,制作凶器,四处散发反革命传单,有的竟纠集二三十人公然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而我们由于群众基础薄弱,严重脱离群众,对此毫无察觉。有的干部平时麻木不仁,叛乱发生后又惊慌失措,因此对纠正扩大化错误发生动摇。这次叛乱事件能迅速平息没有蔓延扩大,其根本原因是党的政策的威力,中央及时发放了大量的救济物资,派出医疗队,召开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赢得了群众的心。敌人也感到末日到来,迫不及待地策动叛乱,他们手持斧头威胁群众“你们想抹帽子吗(指平反),想抹帽子就别要脑袋”,以此同政府较量,破坏落实政策的工作。在平息叛乱过程中,由于宣传并执行了党的政策,严格甄别敌我,坚持“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少数”和“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原则,只要回家生产者不予追究,

争取了群众,及时逮捕了躲藏在窑洞里的首恶分子,迫使骨干分子投案自首,瓦解了敌人的阴谋,很快扭转了局面。

会上学习讨论了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检查了落实报告的情况。此外还介绍了先进点上的经验。

经过摸底,初步掌握了全地区平叛扩大化涉及86个公社,516个大队,1756个生产队,17198人。全区抽调了26名各级书记、常委,6名处、室负责人和766名干部组成宣传队,深入到133个大队开展工作。以团结大多数群众为原则,纠正平叛扩大化错误,大力宣传解释党的民族政策,发动群众讨论平反名单再上报批准,卸掉了群众的思想包袱。宣传队在工作中抓住并着重解决领导上严重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尊重少数民族习俗,纠正了要回民养猪的错误决定。使各级干部认识到宗教信仰的历史延续性;认识到群众的宗教信仰、习俗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认识到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搞好回、汉族之间的团结,自觉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整个国家安定团结的保证。

会上强调在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同时,要求不失时机地进行春耕生产,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

会后,公安部、农林部联合调查组向中央书面汇报了关于平息隆德叛乱事件和贯彻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情况。

杨立功同志返回北京,我送他到西安。我离开西安还没有回到西吉我们蹲点的村子,部里又来电话要我回去。回京第二天,谢富治病逝,我参加了追悼会。

会后又立即回到固原地区。在查明情况后,我配合当地领导到有关生产大队进行平反,宣布历次叛乱被迫胁从的群众和所谓“叛属”无罪,恢复他们的名誉。

1972年7月,调查小组的工作全部结束,我们一起回到北京。

半年以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将对隆德叛乱事件的处理意见报告了中央,华国锋转给我看了。报告中提出要枪毙7人,有糟占林,有杀死乡干部的叛匪,还有那个革委会委员。我向华国锋建议不要枪毙那个革委会委员,能教育过来的人不

一定枪毙。以后是怎样决定的,我就知道了。

关于“算旧账”的争论

1970年11月至1971年春节,公安部继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后,召开了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调整健全了组织机构,部分干部从干校回部工作,恢复了因文革而停顿了多年的业务工作。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国按中共中央通知学习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在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罪行的同时,公安部多次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和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听取干部群众对这几年工作的意见。我在固原地区平反期间回京两次,断断续续参加过几次会议,知道一些情况。

“批林整风”运动中,在核心小组会上于桑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有意见,说:“我今天有意见,以后还是有意见的。”在部全体职工大会上,于桑说“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动员大家把意见说出来。经过发扬民主,群众提出的意见主要有:“砸烂公检法”、下放“五·七”干校、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社会治安方面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等问题。另外,对于“伪党”一案向赵登程、李震、曾威提了许多意见。

为此,李震对过去的工作做了检讨,并把检讨和部里“批林整风”情况写成简报,上报国务院。

纪登奎看了简报后,把李震找去。李回来在核心小组中传达了纪登奎的批评:“别的简报我不看,你公安部长检讨的简报我不能不看。你们公安部发生了‘算旧账’的苗头,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对各省、市公安厅、局会有影响的。”李震还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核心小组内部自己统一思想,然后写个报告报送国务院。纪登奎和周总理的指示在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上作了传达。于是,部里一部分干部认为“算旧账”是于桑、刘复之带头引起的,批评了他们有“傲气”、“怨气”、“不服气”三气,一部分干部则不同意纪登奎的批评。

这样,公安部从核心小组到广大职工中产生了“算旧账”和反“算旧账”两种意见,实际上是怎样

样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分歧和争论。

1972年2月,赵登程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拘留审查。这时李震任核心小组组长,于桑、曾威任副组长,成员有刘复之、黄庆熙、张其瑞和我。黄庆熙接管了第三专案办公室的工作。

第十六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1972年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座谈会,汇报总结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以来的工作情况,研究1973年的工作纲要。座谈会开始后,李先念、纪登奎召集部核心小组会议,研究座谈会方向。在会上纪登奎说:“我看了座谈会会议简报,又有人提出‘砸烂公检法’问题,当时哪个省市委、哪个党委不是当作黑党委被砸烂的?还要砸烂你的狗头呢。我批评你们发生了‘算旧账’的苗头,还是留有余地的。不要扭着不放了,否则对今后的工作没有好处。”李先念说,“‘算旧账’名义上炮口是对着林彪,实际上炮弹落在群众头上”,并要李震、于桑、曾威、刘复之在会上各自作自我批评。

按常规两年开一次公安工作会议,第十五次公安工作会议开后已有两年了。经中央批准,将此次公安厅局长座谈会改为第十六次公安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始终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除纪登奎、李先念参加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参加了最后的总结大会。总结是纪登奎做的。总结的内容主要是以批评“算旧账”来统一思想。会上李震作了对部里出现不利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算旧账”承担责任的检讨,其他人没有发言。

第十六次公安工作会议后,我患淋巴结核,长期低烧不退,基本半休,只参加核心小组会,负责一些治安方面的业务工作。看到部里干部从上到下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不一,并且很难统一,看到李震部长工作上十分为难,自己工作也不好做,这时听说中央要派人去西吉县任县委书记,我想去西吉县,能摆脱公安部繁杂纷乱的环境,我又对西吉县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很愿意到那里好好干一场。和妻子商量,妻子怕我身体吃不消,劝我治好病再说。不久,胡启立被中央委派到西吉县。

公安部整顿

周总理在李震死后指示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同时指示清理公安部大院。公安部在发动群众配合破案工作的同时,结合批林批孔运动批“算旧账”的思想,进行了思想整顿。

1974年春节后,华国锋指示我们:“你们过去发生了‘算旧账’,对下面起了不好的影响,这次结合批林批孔,要带个好头。”还说“下面反映来的情况,除了反对毛主席外,反对任何人不要表态”。

在批林批孔过程中部内反复批判了刘复之、于桑为代表的“算旧账”思想,还联系批判了刘坚夫等几位局长。清理大院的要求是,要把被审查干部的家搬出去,但因为无处可搬,困难很大。结果只有少数几家搬出,大多数没有动。

关起门来整顿一年后,华国锋批准进行组织机构整顿。华国锋参加了核心小组的研究,指示说:“健全组织机构要按精简原则,人数仍按谢富治传达的毛主席指示,不能超过450人,设哪些机构你们讨论。”还指示:“各局领导班子必须是战斗性强的,不要有安置性干部。干部按老、中、青,军、干、群搭配。”经核心小组讨论决定恢复一局、二局、三局(原三局、七局合并)、边防局、劳改局,以及政治部、办公室,后来又增加了民警局。各局下设几个处,各处人数和人选名单由各局党支部按华国锋指示精神提出建议,交核心小组讨论,核心小组讨论后再下放各局党支部讨论。这样上下结合,反复多次才决定最后的名单上报华国锋,华国锋同意后再报国务院批准。从“五·七”干校陆续回来的一批局级干部,如刘坚夫、丁兆甲、石广平、侯西斌、陆石、姚伦、马剑等同志任局级领导。按中央指示精神,局、处级干部里安排了一些文革初期参加造反派的年轻干部,当时全国都是按老中青组织各级领导班子,造反派年轻干部参加领导班子是很普遍的现象。

精简下来的干部,经核心小组讨论决定,哪个省、市需要人,动员他们自愿去,也可以经组织介绍去。在“五·七”干校期间,新疆、宁夏、陕西等地曾来公安部要过干部,有部分干部被介绍去。后来人民日报社、北京市等单位也陆续要去了一些干部。到1976年,还有一部分干部在

“五·七”干校待分配。

公安部健全了局、处机构,安排了干部后,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刘冰清、张牧还专门来公安部总结经验。

1974年,中央决定杨奇清、严佑民、凌云从专案一办转来三办结案后,回部工作。杨奇清住院治疗,恢复一切待遇,未安排工作。严佑民、凌云任公安部副部长,参加核心小组。核心小组成员有我、于桑、黄庆熙、杨贵、祝家耀、严佑民、凌云、张其瑞。曾威有病,不久回部队。我们的分工是:我负责常务工作,于桑、祝家耀管一局(侦察局)、四局(边防局),杨贵、严佑民管二局(经济保卫局)、三局(治安局),凌云、张其瑞管办公室、五局(劳改预审局)、六局(民警局),黄庆熙、祝家耀分管政治部,黄庆熙负责专案三办。

1973年尹肇之从沙洋干校(1972年中苏形势紧张,笔架山干校有一部分到湖北沙洋,称沙洋干校)回京。1974年组织整顿后,中央决定调他到政法干校工作,任该校负责人。

李洪枢案

1972年秋,新疆边防部队巡逻时在国境线我方一侧发现刚吃过丢弃的食品空罐,报公安部。公安部即向新疆、甘肃、陕西以及全国各省市公安部门通报此情况,要各地的旅馆、饭店、交通站口注意盘查从苏联潜入的间谍。

不久,在吉林长春的一个小旅馆内查到一名叫李洪枢的人,经审问,李是黑龙江人,30岁左右,原是小学教员,1967年偷越国境到了苏联,1970年到莫斯科,在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机关接受了特务训练,1972年6月接受派遣任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越境回国。据李洪枢交代,他到过北京,已同苏联大使馆联系过两次,联系的方法是在某街道的电线杆上做记号,联系上后去的长春。查清李的基本情况后,此人由长春市公安局送交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一局负责,决定经教育后逆用。

李洪枢由北京市公安局拘押后,在我们掌握下同苏联使馆进行联系,在第二次联系时,我们通过夜视仪观测到苏联使馆来了人,证实了李洪枢的交代。

接着李洪枢在我方安排下用密写的方法提出要克格勃发给电台,苏方答应给予。电台放在香山附近,埋在地下,做上标志,李在我们监控下去取。取时挖出一个水泥匣子,打开一看是电台,还有人民币1000元。这架电台在当时比较先进,预先把声音录在录音带上,只要一按电钮就发出了。

这期间曾因看管不严,让李洪枢跑了,李震为此批评了北京市公安局。李洪枢跑到了郊区,不敢进村子,偷挖老乡的地瓜吃,被老乡发现扭送了回来。

1974年1月15日晚,吴忠要我去卫戍区,到了大会议室,吴忠告诉我中央决定逮捕李洪枢,也就是停止逆用。逮捕前要李洪枢同苏联大使馆联系,在西坝河桥下接头。吴忠、我、市局副局长王更应率领换了便衣带着棍子的民警在西坝河周围埋伏,王更应埋伏在桥附近,我和吴忠在西坝河东头的小木工房内指挥。听到汽车声音后不久,王更应用夜视仪观察并向我们报告已接上头,这时便衣立即围上去,人赃俱获。缴获了一台快速收发报小型电台、密写的指示信以及密写显影药、伪造空白边境通行证、活动经费等。当场还扣住一辆汽车,里面有苏联使馆一等秘书等五人,一起带到公安局,后将使馆的人放走。1974年1月19日这几个人被我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

这事件当时公开进行了报道,揭露了苏联使馆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事实。

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过,我们取得了两个胜利:北边珍宝岛边防的胜利;南边抓住苏修特务的胜利。■

(责任编辑 黄 钟)

启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 13611159388

电话(传真): 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 102488 收款人: 崔秀岭

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 韩爱晶

【编者按：本文原文近三万字，因篇幅原因，本刊发表时有删节，其中与本刊今年第2期发表的《1968年向毛主席请教》一文内容相同部分，全部删除。】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学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从北大往清华走去。只见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待命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看着这种平常少见的场景，我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清华园里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广播员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听到这个广播，我的脑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走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另一个女头头，好像是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李冬民说搞不清。

我回到北航，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让他改变广播台的政治态度，避免学生和工人之间发生冲突。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忙打电话到市革委会总机，找吴德。很奇怪，找不到吴德。我又请总机找分管文教的丁国钰，也找不到丁国钰。平常，只要一报我是北航韩爱晶，总机马上会接通要找的市领导，这很正常，我是常委，吴德是副主任，丁国钰也是常委。

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清华大学的情况，回答是搞不清楚。总之，当时我处在被蒙蔽的状态。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清华大学的情况向领导汇报，我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我毫无办法，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对天大喊：“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下刀子！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告诉我，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具体情况搞不清。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两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打来的。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赶到人民大会堂,这次见中央首长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而是在西侧南门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早就习以为常。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握手就进到会议厅,比如安徽厅,等待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有时我们北京的一些学生负责人或者再加上工人负责人,会被安排在小客厅里等着。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钟、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还有几十或几百个学生、工人或者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传最快,流传最多,影响很大。

可是7月28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口等着。聂元梓、我、谭厚兰及王大宾先后来,我们很自然地议论起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很不应该!”

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是怎么回事?我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20分钟,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副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挨在谢富治身边。走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着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都站住了,我说:“没有”。他们也都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的裤腿抹下来。因为天热,我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站起身

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儿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反差太大。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快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站在门口。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大家和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毛主席同黄作珍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还不认识,没有打死?”

陪同毛主席的中央领导人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

进屋之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一个一个大号的藤凉椅,围成大半个圆形。我看着毛主席面色很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在这里,已经议论一会了。

江青说:“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

毛主席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

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大雪茄，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毛主席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温玉成说：“不是他们。”

黄作珍说：“北大和哪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与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说：“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元梓回答：“互相打了。”

毛主席说：“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富治说：“不到三万人。”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第三个办法，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



1967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周恩来接见红卫兵代表(右起: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韩爱晶)。

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情况好办一些吧？”

周恩来说：“他们学校还好。”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说：“去、去。”

王大宾原来坐在离毛泽东较远的位置，好像是女服务员拿来一把椅子，放在后面离毛泽东较近的地方。王大宾起身坐了过去。

毛主席说：“坐下，坐下。”

毛主席说：“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这么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说：“天下大势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厚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注：北大井冈山兵团）、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你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

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说不是有一个凶手要截你吗？知道了也不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清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控制也不紧。”

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主席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

毛主席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主席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毛主席风趣地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文元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韩爱晶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一派权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当面劝他，可是他回去就又变了。”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毛主席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到会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省妇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加了。”

韩爱晶说：“我参加了。”

江青说：“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

毛泽东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周恩来在3月24号、27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来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时还用火柴重新点燃雪茄。毛主席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兵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断羊腰’（注：有的版本是‘炖羊肉’）？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

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这么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又不行，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如果还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都要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马上接着说：“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



1967年，江青、韩爱晶、蒯大富(前排左起)国庆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

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是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就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就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

周恩来说：“是何克全。”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同志，《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江青说：“那个何克全……主席要他……他不肯……”

毛主席说：“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特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文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

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和王大宾。

我说：“学了八年俄文，学过一点点英文。”

王大宾：“学俄文。”

毛主席：“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学起。”

这时，谈话离开文革的事，显得轻松，我向主席提出个人前途问题：“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兵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两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算什么知识分子啊？还不是丘八！”

毛主席问黄永胜：“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毛主席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算下中农。”

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毛主席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算贫农。”

毛主席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那么点学问，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黄埔军校×××，蒋介石奖给他一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说：“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叶群：“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科、××学科、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主席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现在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学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我说砸烂公检法，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留下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地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让个小战斗队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查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了。聂元梓，侯汉清你们还没有提他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诬蔑些也不要紧。牛辉林的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缉的案子，有群众参加办，他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缉

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些人又不认识几个人，就根据几个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他们……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里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禁闭早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主席说：“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现在发明了一种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厂串联，人家欢迎你们，就没有打你们。”

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出的嘛！不是说工人是领导阶级吗？工人阶级专政嘛！专你们学校里极少数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还在搞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我说：“我也不知道有这些组织参加！”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着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恩来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恩来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我听到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恩来说：“不要开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我为啥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也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开始，管了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了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主席说：“群众就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我们的造反的旗号，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

毛主席说：“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要

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

康生说：“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毛主席说：“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恩来说：“广西老多也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主席说：“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我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他们说与黄永胜、温玉成很熟，来见黄永胜、温玉成。”

江青笑着对黄永胜、温玉成说：“呵，原来还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呢。”

我接着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同学打来电话，要我接待广东省这两个革委会常委。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学生说，现在外面说你‘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造反派头头，外地群众组织负责人，可是你根本没有热情接待，见都不见。人家说你老大作风，骄傲自满，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武传斌说他和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关系都很好。最后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几个可靠的外省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聊聊天，只摆情况，不谈办法，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

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们纷纷打电话给我反映情况。我说,那你们赶紧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有些……”

康生说:“你韩爱晶……”

姚文元说:“韩爱晶……”

毛主席说:“你们把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嘛!”

江青说:“在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访,你们接待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就不行了,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是江青同志。”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做得出来,我听了都流泪。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韩爱晶:“我错了。”

毛主席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政府主义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会消灭,这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我对你们那个对立面并没有好感。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不是替他们说话,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几十个反革命,也是年青人。”

聂元梓说:“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江青说:“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是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说一说。”

毛主席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过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他是个群众组织啊,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你搞又搞不掉,几千人。”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同天下呢!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的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统统可以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到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问:“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恩来、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主席说:“此外,北外‘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要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聂元梓说:“牛辉林很坏,他父母与彭小蒙父母有关系。”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自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

学习班。”

毛主席说：“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他父亲在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他们，是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的，里边有坏人，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地方。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有经验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错误，我们是护你们的。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

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一会儿，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谈话结束。

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四十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主要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

毛主席说：“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个好处，就是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不让串联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号啕大哭。毛主席站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门口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江青看着蒯大富狼狈样子，又好气又好笑。

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毛主席右边站着。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

“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回答：“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



1967年，蒯大富、韩爱晶、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

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主席问：“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因为蒯大富迟到，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

姚文元说：“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主席说：“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了？”

周恩来说：“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像四川一样大打一场。”

江青：“败家子。”

毛主席：“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是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江青：“……”

毛主席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他们忙啊！”

周恩来说：“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主席说：“不要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遙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研究，什么……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

姚文元说：“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走，斗、批、散。”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的教授，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但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有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了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对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应该去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做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像你们讲的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的麻烦没有？”

谭厚兰说：“没有，同学们对他有意见。”

毛主席说：“过去是有关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主席今天语重心长。”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北京

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了。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么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出身骑兵，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很好地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主席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你们，人家不要抓我黑手，我还见你们呢，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都不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两百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两百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用武力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

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飞只剩下匹马。”

叶群说：“那是失街亭。”

林彪：“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不是，而是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也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说：“清华两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说：“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真想不到会有人向中央报告这样的假情况，赶紧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个要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我比你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搞多中心，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

心了。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很好地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了。”

毛主席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必胜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做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仍然要打,你们打到哪一年去?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打伤工人。正如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偏向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井冈山。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做好朋友。韩

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革命的井冈山!”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恩来说:“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大富说:“有。”

毛主席:“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江青说:“……”

周恩来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点办法。”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少天,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主席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骂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他们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出两人,四一四出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说:“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并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了。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方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打得鸡飞狗走，我们可能犯错误。”

王大宾说：“现在搞教改困难很大，要下去和工农结合，到实际中去，但没钱，卡得要死。”

江青说：“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问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是讲了吗？他的学问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长冈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级斗争，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读那些什么厚本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反而统统在外边，这样不好，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毛主席看看手表，说：“现在八点多了，五个钟头了。”谈话的过程中，埋在我心里的一个大问题又出现在脑海里。**【此处删掉了作者向毛泽东请教部分。详细内容见本刊2013年第2期《1968年我向毛主席请教》。】**

谈话结束后，我们围在一起，大家发言，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子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去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清华学生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还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

车队开进北京航空学院。从清华大学跑出来的部分学生汇聚在北航，可能有一百多人。基本都是蒯大富领导下的铁杆子弟兵。当时，北航最大的会堂就是北航俱乐部，这里成了清华学生临时栖身的营地。

谢富治说：“我们先去看看跑出来的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我说：“等下你们去清华，我跟你们一起去；俱乐部礼堂我就不去了。我要先见我们北航的主要负责人，简要地传达一下，他们还不知道毛主席接见的事呢。”

我就和谢富治他们临时分开。我赶到主楼，这时，北航革委会、北航红旗的部分核心成员和一些



蒯大富、聂元梓、吴桂贤、韩爱晶(左起)在深圳

平常负责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等着。

大家问怎么才回来?到底怎么回事?都焦急地想知道清华出了这么大的事之后,中央首长接见有什么重要指示。我让广播通知,全体革委会委员立即到会议室开会。在等待开会人员时,我先给在场的人简单地谈谈情况和感受。

我说:“清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是毛主席派去的。清华老团开枪打死宣传队,出大事了。毛主席接见我们,从夜里三点多到早晨八点半,五个半小时,陪同接见有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叶群,还有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吴德、黄作珍。被接见的就是聂元梓、蒯大富、我、谭厚兰、王大宾。因为开始找不到蒯大富,实际是一边谈一边等,蒯大富迟到了三个多小时,他来了又接着谈。直到早晨毛主席去休息,主席每天夜里工作。”

听我一说,在场的非常惊讶,着急想知道毛主席接见的情况。毛主席说什么?五个半小时跟毛主席在一起,毛主席到底是什么样?同学们差不多都只是在天安门广场或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上见过毛主席。我在此之前见过几次毛主席,握过手,说过话,时间都很短。每次回来传达也是内容少,幸福多,神秘感极深。

这次突然见到毛主席五个半小时,简直是去天宫神殿,又从九天之上返回人间。我说:“跟毛主席在一起谈话五个半小时,最深的感受有两条:第一个最大的感受,毛主席是人。毛主席不

是神,毛主席是人。跟毛主席坐在一起说话,就跟回到家里见到家里最亲近最慈祥的老人一样。一点也不拘束、一点也不紧张。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可以把心里最真心的话说出来。毛主席谈话很平易,并不像广播最高指示那样一句一句的很严肃。毛主席最袒护年轻人、毛主席对我们学生最亲、对我们的心最明白。毛主席对社会上的事很清楚,大街上的大字报、发生的事他知道很具体。第二个最深的感受是,毛主席身边有些人在讲假话,哄主席。有时候,毛主席又不能听到真实情况。我感到很担忧。林副主席很少讲话,有时表态,指示几句。周总理对主席身边每个人都看得明明白白,周总理对他们各人说话的真实想法可以说洞若观火。周总理记忆惊人,无论毛主席和谁谈到什么历史细节,毛主席问起当时某一件事、某一个人的名字、当时情况,周总理从旁可以讲得很清楚。江青、康生、姚文元和谢富治对自己的主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其他中央领导很谨慎,主席不问,一般就不说话。军队干部对毛主席毕恭毕敬。”

北航全体革命委员会委员到齐后,我又把总体情况向各位做了介绍,又按照在人民大会堂整理的简稿,做了传达。

谢治富、吴德、黄作珍、丁国钰、聂元梓、谭厚兰和王大宾等一行已从俱乐部会堂看望清华学生返来。我又坐上谢富治的车一路向清华大学开去。

车队到清华,先去明斋看望,我们陆续下车,看见军宣队、工宣队一些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站在路边。他们面部表情是冷冷冰冰、目光充满仇恨。谢富治、吴德等领导走过去与他们握手说话。有的工人很愤怒、很激动地向谢富治等控诉。一看就知道是在控诉蒯大富团派开枪打死打伤了工人师傅和解放军同志的事。有的工人妇女边诉边哭,边哭边诉。场面很惨痛。自以为是而又缺少基本政治常识的蒯大富就能把清华弄到这种地步!

我远远站在旁边,又难过、又痛苦、又尴尬、又无奈,实在是千夫所指之窘境。在工人、解放

军仇视的目光下,谢富治又领着我们进到化学馆,我们从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只见破墙破洞,断壁残垣,就像电影里战争结束后的画面。清华大学的科学实验场地竟成了这种情况,是清华团派和四一四百日武斗所致。

走上楼顶的大平台,任传仲等武斗负责人和最后一批坚守阵地的战士像一群遭受劫难的农妇遇到亲人一样,拥过来拉着谢富治、吴德的手,扯着衣袖,一边嚎哭一边告状。

武斗指挥、学生任传仲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不堪,他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地哭:“啊!——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保卫毛主席革命线路有罪啊!——杨、余、傅黑后台挑动工人镇压红卫兵啊!”

任传仲是真情真泪,悲痛欲绝!我眼前的场景,悲惨而又不可思议,魔鬼也很难重新造就如此复杂荒诞的境界。这个任传仲是直接指挥制造命案的罪人。但他们还在梦中,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毛主席派的工宣队、军宣队,他们也根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反革命的围剿,遭受了天大的灾难!

大家只好安慰他们,等他们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安抚之后,谢富治、吴德、黄作珍、丁国钰等又去安抚慰问工宣队、军宣队的同志们。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各自回校。蒯大富留下召集他的人开会。

我又回到北航,在红旗小院看到聚集在那里的蒯大富的部下,十几个骨干分子,他们还在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工人进清华对不对?有没有人欺骗毛主席?老团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宣队是错误的,工人的斗争矛头错了。

我委婉地说明,工宣队是毛主席派的,现在要承认开枪是错的。我的话显得极不中听,他们希望从我口中说出,是毛主席受了欺骗,工宣队是错误的。我发现团派学生处在情感惯性中,梦还没醒。我是不受欢迎的,我就走开了。

当天下午,丁国钰分别给我们五个打电话,他说:“你们整理的稿子原来写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改成召见,好不好?”

我当然说:“好。”

我明白,我们是受毛主席批评的,并不是光荣地被接见。我感觉丁国钰是正在通过电话方式同

我们五个头头商量,把接见改成召见。当天,毛主席跟我们谈话五个半小时的消息已经传遍北京高校、机关、工矿。同时也已经传到外地大中城市。从此,这次谈话多称为“毛主席七二八召见”。

从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到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遣宣传队开进清华,整整两年,虽然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团派占有诸多优势,但根本就没能一统天下,清华没有建立起合法的、有权威的权力机构。在中共执政60多年里,唯有这两年清华处于党政领导缺失状态。在清华大学建校已过100年的历史里,也仅此两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真空”。

在这两年里,清华校园处于无政府状态,这里的一万多精英享有极端民主的权利。学生、教师以及工人和干部们基本不上课、不生产也不上班,随心所欲地在校内或北京街头召开会议、演说、游行,他们张贴大字报、搞广播宣传、印刷传单报纸,随处散发,甚至可以跑到外省市去搞同样的活动,串联成立组织,向当地党政机关和领导人发起批判斗争。

在清华这个最高学府里,师生们想法各异、志向不同。一万多精英在这个小王国里,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取得清华大学的领导权,各据山头、打派仗,不择手段,最终激化为百日武斗。这两年里,高等学府清华付出了惨痛代价,蒯大富更是身败名裂!回首这两年,不能仅仅痛心痛惜。

清华园付出惨痛代价的这两年,其政治生态实属罕见,可谓绝版!这里成了中华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最生动的试验场。

任何历史阶段,在一个社会区域里,人们的利益和主张千差万别,都想各抒己见、各行其是。那么怎样才能让千万不同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在纷争的情况下形成健康的建设性的合力呢?怎样才能避免无谓肮脏的政治对抗给社会造成的不必要破坏呢?我们应该从清华民主政治试验场找到答案。

民主与权威,民主与法制必须同时起作用,社会才能文明进步,才能建设富强。■

(2013年5月26日,韩爱晶先生根据多种版本,对七二八召见谈话内容重新进行过校对整理。)

(责任编辑 黄 钟)

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 吴之理

【编者按：本文系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吴之理同志的遗作。除个别句子以及明显的文字错误外，只要不影响对内容的理解，本刊发表时均不予以删改。】

朝鲜战争停战距今(1997年)已44年，至于1952年轰动全世界，美帝国主义有口难辩的细菌战的真相如何？

答案是一场虚惊。

当年党中央是确实(至少开始的时候)认为美军是进行了细菌战，我们动员了全军和全国，花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反细菌战运动，美帝国主义也是一时臭名扫地，原驻朝美军司令李奇微，1952年末调任欧洲盟军司令，到达机场时，群众骂他是瘟神，一时下不了台。他说凭上帝之名发誓，美军没有进行细菌战，才让他走。

事件的缘起是冬季的雪地上出现大量苍蝇和跳蚤。后来知道是雪蚤，不是人蚤，朝鲜语称oguli，是冬季雪地自然现象。雪蚤是弹尾目(Collembola)黑跳虫属(Isotomapalustris)。我东北也有雪蚤的报告。那时我们认为雪地上不可能有苍蝇和跳蚤，加上外国报纸报导日本细菌战犯石井来朝鲜前线调查美军不明死亡，于是中央判定美军进行了细菌战。

事件的主要经过如下：1952年1月29日，志愿军卫生部和志愿军司令部收到42军电报称：美机于1952年1月28日飞过平康郡该军驻地，战壕雪地上发现多种昆虫，内有蚤、蝇和类似蜘蛛的昆虫。42军送来23个跳蚤(雪蚤)，33个苍蝇和类似蜘蛛的昆虫标本。我们化验室进行培养，没有发现致病菌。42军卫生部部长是高良，是我在三师时卫校的教育长，一个很细心和有水平的卫生干部。他一定对细菌战有所警惕，才发这个电报。42军的电报同时报志司，引起彭德怀司令员的高度重视，转报党中央，又电告各部

队警惕和要及时报告类似情况。一时几乎所有部队都有类似发现的电报(两个月中有近千次报告)，报告敌投的东西是五花八门，有死鼠，有苍蝇，还有大蚊子，有昆虫容器(是美军撒宣传品用的铁四格弹壳和带降落伞的纸筒)，有树叶和蛇，还有一个单位报告有朝鲜居民突然死亡；报告河中漂来大量死鱼，并送来10余条小死鱼(鲫鱼)标本，经细菌学培养出是纯沙门氏杆菌。《人民日报》又报导美机多次侵东北投撒细菌、死鼠和其他东西，恰巧此时，美军前线发现不明死亡，美军派日本细菌战犯、原731部队的头头石井来朝鲜调查此事，并公布此消息。党中央根据以上情况判断美军进行了细菌战。不几天，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醒目消息，发表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政府的名义，谴责美帝在朝鲜和我东北进行大规模细菌战并附有投撒物和细菌涂片的照片，在全世界引起震动和纷纷谴责。事先我们并不知《人民日报》这么快公布。公布后，我对卫生部朱直光副部长(已故世)说，这下我们要被动了。朱说今后只有做文章。

中央卫生部是贺诚副部长当家，他在东北工作过，知道日本的731部队是搞细菌战的部队，知道石井其人其事，是他的错误判断，党中央同意了。他派昆虫学家何琦教授和细菌学家魏曦教授(二人均故世)来朝鲜调查。他们来前，我们已多次派员(包括我本人)到报告单位去核实情况，结果是雪地上有昆虫和其他投撒物，但未发现突然死人和可疑病人，前报死人的单位说是道听途说的事。至于苍蝇，几乎家家灶前灶后都有，它们可随时飞到门口雪地上。我个人分析：(1)帝国主义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细菌战也不例外。(2)但严冬不是进行细菌战的好季节，天冷昆虫活动能力弱，也不利于细菌繁殖。(3)在前线战壕一带投，人烟少，有病也难传染，

而且离美军战壕不过数十米,还有反弹的可能。(4)朝鲜本有虱媒传染病流行,城镇房舍多被炸毁,百姓都住防空洞中,生活很困难,朝鲜民族极顽强,再来个细菌战也不会有更大灾难迫使他们投降。(5)我们的初步调查尚不能证实美军进行细菌战。我向洪副司令汇报我的看法,他同意我将意见发报报告彭总和中央,我并建议暂勿大事宣传,以免将来被动和浪费人力物力。(这是何、魏二教授尚未来到前的事。)中央即来电批评我警惕性不高,说就是敌未进行细菌战,也可乘此加强卫生工作。后来何魏二教授下去作了调查,并看了昆虫标本和细菌涂片。何发现所谓跳蚤是雪蚤,魏发现雪蚤染色涂片是有形如鼠疫杆菌的细菌,但呈格兰氏阳性(鼠疫杆菌是阴性),也培养不出鼠疫菌。我问他们的看法,何琦说(原话),“我看是 false alarm(虚惊)。”彭总看到我的电报后,要我当面汇报。洪副司令要我如实地向彭总说说我的看法。恰巧朝鲜人民军防疫局的金局长奉命来找我摸摸底和商量如何办,因为他们也拿不出证据。我带他一同去见彭总,希望金能作个找不到细菌战证据的旁证。当晚到了桧仓郡志司所在地。(我们住成川郡,离志司大约两小时的汽车路程。)彭总、邓华、宋时轮副司令等十余人在座。我汇报了我们调查的结果和上说看法。彭总严厉地说(大意):我们的卫生部长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替敌人说话,志愿军的健康能有保障吗?他接着说,还有人反映你们对伤病员不关心,战场上死一千死一万都可以,下来后死一个,我都找你算账。我说,我可以不当卫生部长,我别无所求,但请让我留在朝鲜打仗。彭总宣布临时休会,常委讨论。复会后,彭总说,常委还要你当卫生部长,好好干,成立总防疫办公室,你当副主任(邓华的主任)。和金局长回志后的路上,他说他当时吓得发抖,以为真要杀头了。又说你们彭总真好,他爱兵,对你又教育又器重,你们有好党,好司令。回到志后,向洪副司令汇报,包括彭总和我个人的谈话内容。洪不吭声,说你好好干吧!不几天后,东北军区卫生部戴正华部长(已故世)受军委卫生部之托,来检查反细菌战工作,我向他汇报彭总的指示。戴说,你不要怕,就按彭总说的去做。当日半夜,我接到驻志司的苏军参谋团长的翻译的电话,说斯大林

问细菌战是否真有其事。我答,你去问彭总,挂了电话。我心想,真难办!搞不好真会杀头,要有个杀头的精神准备。

过不几天,贺诚和宫乃泉组织一个连何琦和魏曦在内有30余人阵容强大的防疫检验队来朝协助反细菌战,他们之中有:

昆虫学家何琦

跳蚤专家柳支英

寄生虫专家吴光,包鼎丞

细菌学家魏曦,陈文贵(鼠疫菌专家,抗战时证明过日军投撒鼠疫),方亮(朝鲜族),谢知母,郭时钦,程知义

病毒学家郭成周

流行病学专家何观清、俞焕文

立克兹小体专家刘维通(也是流行病学专家)

青年科学家10人左右(任民峰,吴滋霖,胡介堂,李义民,李振琼,高韵调,刘育京等)

摄影师和技术员10余人

我把他们组成4个组,最大的组放在卫生部附近,另3个组放到东、中、西三条线的兵团卫生处。这3个分组担任从基层送来的标本的初检,并负责到现场指导防疫工作。初检有问题的标本,送到成川大队本部作二检。标本是收到不少,有好几百份,也培养出病菌,但都是沙门氏菌之类,未出现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有1-2次在树叶标本中,查到炭疽杆菌。所谓大投撒物,形形色色都有,但很难和细菌战挂上钩。

我很快拟定了反细菌战的措施(加强个人卫生措施,注射多种疫苗,每人要扎裤腿和袖口,毛巾围颈,设对空监视哨,采标本送检方法,就地扑打空投昆虫,撒消毒药,发现可疑患者先隔离后报告等),颁发全军,并取得彭总的同意,可以对死者尸解(由志司和志政联合通知全军),对后来研究伤死原因,开了绿灯。

整个一年中,没有发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或死者。由于讲究卫生,病号减少不少。当时一些部队领导干部,1987年遇见我的时候说,美帝搞这么大的细菌战,我方竟没有一名死者,那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们忙于接待调查团:李德全和廖承志率领的国内名人的调查团,国际民主法律调查团和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后者团长是英国科学

院院士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副团长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他很有这方面经验,曾任伯力审判日本细菌战犯的医学专家。他带一名青年英文翻译可华斯基先生。团员有巴西生物学蝙蝠专家贝索亚教授,法国兽医专家马戴尔教授,瑞典临床化验家安德琳博士(女),意大利生物学家奥利佛教授。我国钱三强博士担任联络员,陈述医师担任俄文翻译,热带病学专家钟惠澜博士和(妇科)严仁英教授(女)担任英文翻译。前两个调查团,一个全是中国,当然全力合作。国际民主法律调查团员,不是自然科学家,我们讲什么他们都认真记下,都骂美帝国主义。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就不一样,虽然他们是相信美帝进行了细菌战,但我们不能在证据上出一点问题。苏联茹科夫院士是受托于斯大林。他真行。他们来朝鲜的时候,正是美军对平壤进行大轰炸之后,平壤一片瓦砾。调查团先在东北调查美机在那里投撒细菌的证据(7月12日至7月25日)。入朝之前,茹科夫院士对他们说,朝鲜是战场,很危险,我们不妨对东北调查结果作个结论,签个字,免得万一有意外,我们劳而无功。其余的团员认为有道理,于是写了美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初步结论。在朝鲜(7月28日至8月1日),他们被安置在深深的地下旅馆,夜晚还受到美机的骚扰。开听证会那天,朝方先作两个案件报告,一个是霍乱病死亡例,说是美机在平壤大同投下草包,内有带霍乱菌的蚌(文蛤),患者吃了蚌,得霍乱死亡。朝鲜多年没有霍乱了。另一个案例是鼠疫死亡,说是这家人某天在水缸表面发现了跳蚤,很奇怪,过了几天,家中有人病故。尸解是鼠疫。朝鲜从来没有鼠疫。(这是朝方请教陈文贵教授准备的案情,和他40年代日本在常德投撒带菌的跳蚤,在水缸中发现的情况相似。)志愿军拿出的是20兵团驻地两名中尉在砍柴时发现密密的跳蚤群,他们收集了不少,送来培养出鼠疫杆菌的案例。由于我们在反细菌战时,要求每人都要束紧裤腿和袖口,及时对投撒现场消毒,故该军无患者和死亡。此事件很顺利地被科学家接受,通过了证词。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是,跳蚤是在森林里的小茅屋里发现的,小屋里有柴草和杂物,适合跳蚤的繁殖。这就很难说是美帝

投的。他们上报的时候,没有提到小茅屋。这次要他们出场作证时,他们中一人说,毛主席教导他不要说谎。僵住了。怎么办?只有说服他服从当前的对敌斗争,把发现跳蚤的地点说成是露天。蚤标本都是人蚤(*Pulex irritans*)。至于鼠疫杆菌,那好办,我们使它出现了。

大约在5月间,陈文贵在我们检验队的细菌室打电话告诉我说,方亮把敌投的鼠疫杆菌菌种丢了(原来是方亮负责细菌室,实际是从来没有过鼠疫杆菌菌种)。陈文贵在印度索克教授那里专门学过鼠疫,一下子就发现了。我意识到是大问题,马上发报给北京的贺诚部长和东北的王斌部长,说即派门新同志来取鼠疫菌种,一定要给,不然一切都好办。门新(后在辽阳203军医院当院长,已离休)去沈阳,来回,5天,取回两管鼠疫菌种(装在密封的铁管里)。我把一管交陈文贵,一管当我们防疫队副队长李哲范的面交朝鲜保健副相鲁振汉。他向我要过菌种,这时他心中有数为何我给他菌种。事后我对李哲范说,万一到时难证明细菌战,你给我注射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他说,那不行,总有办法可想。可见当时压力之大。李是朝鲜族,解放前和苏联专家在东北一起搞过防鼠疫工作,已是出色的专家了。早几年我问他记不记得此事,他说记不太清了。

这一年里,我跑了三次北京,汇报有关反细菌战问题。每次都见到周总理。周总理虽日理万机,对此事过问非常之细。一次,朝方保健副相和我同去北京,向总理汇报对国际科学调查团的准备工作,总理问朝方有何困难,我插了嘴,总理马上问鲁副相对我的意见是何看法,使我非常感动总理尊重别人的高贵品格,同时使我感到我不该随便插嘴。一次,晚上8点多钟,总理一面吃饭一面和我们谈问题。他就吃一小碗饭,两小碟菜,一荤一素,一小碗汤。多俭朴的生活。

调查团回东北前,去朝鲜北边碧潼战俘营会见美空军几名飞行员,他们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们投细菌弹的经过。这次他们又自由地向调查团谈他们听过投细菌武器的课和投“不爆炸的炸弹”经过。停战后,他们被交换回国,美军审问他们为何乱说莫须有的细菌战之事。他们回答说,中方答应很快放他们回国。听说他们都

为此受了处分。我真佩服战俘营我方人员的说服工作。

调查团回到北京,签了字,发表了500页厚的黑皮书《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毛主席接见了他们。

国际科学家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说,我看美帝是实验性的搞细菌战。他们异口同声赞同这样的说法。

茹科夫院士回苏联向斯大林汇报后,苏共中央来电说,细菌战是一场虚惊。周总理马上找黄克诚总参谋长和洪学智副司令问,你们做了手脚没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时没法交差。当时,我国正派人在欧洲作反细菌战宣传,总理即下令撤回。之后我国再不提此事,但下面并不知道。一些编书的人老要把美帝搞细菌战写进去。我总是建议用我们受到细菌战的“威胁”的口气,把文章做在“防”的方面。黄克诚病中要我向军事科学院编百科全书的同志转达他的意见,说美帝没有在朝鲜搞细菌战,现在两国关系也不坏,不宜再说这个问题。他们听到之后,派人来问我究竟有没有细菌战。我只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

这是我几十年的心病,没有别的,只觉得对不起中外科学家,让他们都签了名。也许我还是太天真,因为他们可能知道真相,但服从政治斗争需要。如是这样倒罢了,如不是这样,他们是受我们骗了。我曾不止一次向黄克诚说对不起他们。黄说你不用这么想,搞政治斗争嘛,而且一开始你就表示了你对细菌战的看法,是很不容易的事,你已尽到责任了。

我想这件事在历史上总有一天要说清,现在由我这不在职的知情的83岁的老人说出来比较合适: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1997年9月

(2005年2月2日追记。去年,2004年,军事科学院李义民教授转来一份比利时医科大学一位教授写的文章,专门讨论此事,说:俄国公布了前苏联的档案。苏共中央1952年秋,同一天给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主席发了电报,称美军并未进行细菌战,你们是一场虚惊,已给苏联专家茹科夫撤销院士的处分,因他带头搞了黑皮报告)■

(作者为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部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 :010-84608877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 / 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川北的红军“冤烈”

○ 孙丹年

川陕苏区的阆南县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川北南部县的党史工作者们,在整理编辑红军史料时,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冤烈”,纪念川陕苏区在“肃反”中被冤杀的红军及地方干部。

1932年12月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入川,1933年9月4日占领南部县境内嘉陵江以东全部地区。据徐向前说,这次战役是为了夺取南部县的盐井以解决红军对盐的急需。红军将南部县与阆中县的嘉陵江以东红区合组为“阆南县”,为川陕苏区23个县之一。

“阆南县”是川陕苏区的西部边界,以嘉陵江为界,红、白双方虎视眈眈隔江对峙。蒋介石先后发动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川陕会剿,红、白双方在这里展开拉锯战,红军两次撤离南部县境,又两次收复失地,1935年4月2日占领南部县城,4日撤离。当月中下旬,红军分别转移,参加长征。

建国后,经南部县政府和党史部门调查核实,一共有1.2万多名南部儿女参加红军,他们中绝大多数后来音讯杳无。建国后能够调查到的南部籍红军烈士,有性别、出生村镇、出生年月、所在部队番号的,共1258名。幸存并在全国各地担任职务的南部籍老红军有104名,参加红军西路军幸存、回南部乡下务农的有48名。被害于张国焘“肃反”的南部籍地下党干部、红军领导干部、各级苏维埃及游击队干部,据南部县民政局统计,一共有68名“冤烈”。

张国焘“肃反”

1933年5月、6月、8月、12月,中共川陕省委

发出一系列文件,要求“坚决肃清苏区内一切反革命分子”,随之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保卫了川陕苏维埃的后方安全。但是,担任党中央代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的张国焘,利用“肃反”的合法手段,混淆党内思想斗争和“肃反”的不同性质,借机清除异己,杀害经历多年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红军干部战士以及不少革命群众。

张国焘“肃反扩大化”有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依据和借口。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必须继续和加紧揭露托洛茨基主义的反革命实质”,“揭露国民党一切派别”,“铲除自己队伍内暗藏的取消派,帝国主义的走狗改组派”,“坚决反对机会主义倾向”,把党内有右倾倾向的人都看成是帮助反革命在党内活动的内奸。王明则指责“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未曾有计划的进行”,要求在党、红军、苏维埃内部加紧肃反,张国焘有恃无恐。

“肃反扩大化”的又一原因,是中共从1927年“八七”会议开始,在一个时期内,习惯于将斗争失败和工作失误的责任归结到领导者个人头上,轻率而粗暴地作出处理。仅以南部县的“升钟暴动”为例:1932年11月,中共领导南部县升钟寺农民暴动,5000余名暴动参加者数日之内摧毁了国民党区、乡政权,占领了升钟寺及接壤的阆中县、剑阁县广大地区,成立“川北工农红军”。8天后暴动失败,队伍分散游击。

暴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还造成损失,党内追究个人责任:

南部申市(即升钟寺)的游击战争在立三路线的领导之下失败了!本小册子是公布省委对它的政治结论。……省委认为此次错误应在政治上加以严格的纪律制裁,特首先提出下列纪

律:1、南充中心县委全体常委严重警告一次,玩某同志(罗翰文)开除中心县委书记职务……2、覃某同志(覃文)立即撤消省委特派员职务,开除省委候补委员资格……

随后,对思想抵触、完全不接受处罚的玩○同志(罗翰文),省委再增加严重警告一次;总指挥○民同志(张友民)留党察看三月;閔南书记○山同志(李汎山)及第一队政治委员立森同志(罗南辉)各留党察看二月;第一队长任○同志(任足才)留党察看一月。

党内高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战争环境下,在“肃反扩大化”中,政治上的轻率粗暴蔓延成为对同志生命的轻率粗暴。后来,南部县长坪区苏维埃游击队营长张德会,领导大东山阻击战,几位战友牺牲,之后以“错误指挥”定罪,处死在巴中县杀牛坪。

张国焘的军阀习气更是“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专制残暴,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充满仇恨,必将置之死地。“肃反”法令非常严厉,写上条例的反革命政党、团体、军事组织有“国民党改组派,AB团,第三党,国家主义派,赤蜂派,法西斯蒂,共产党的叛徒组织,托陈取消派,工贼富农组织,民团,铲共团,剿赤团等等”,这些组织的头目和成员不自首者必处死刑,有的即使自首也处死刑。

残酷的“肃反”

“肃反”中,先后被杀害的红军高、中级干部及地方干部,有红10师参谋主任吴展、73师217团政委闻盛世、218团政委陈少卿、原鄂豫皖军委总经理部主任余笃三、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参谋主任杨白、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旷继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章、陕南特委书记杨珊、汉中特委书记张德生等等。由“川北民军”改编的红军独立第一师,从师长到排级干部一共200多人全被杀害。在双河场开党代会,当场抓了70多人,绝大部分杀害。监禁中命悬一线的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央特派员廖承志等侥幸得到解救。

对待中间分子,张国焘破坏统一战线政策,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投诚起义的军阀部



旷继勋

队,“要兵不要官”,军官一律杀掉,此后就少有白军部队投靠川陕红军了。杀了陕南过来的30名小商人,就没有人敢来苏区做生意了。对地方上较为富裕,甚至仅仅是饭吃的富裕中农、地主跑过差的一般甲长,统统杀尽。还杀掉可以争取的分子牌首、甲长、窑子、妓女、端公等。在长赤县(南江县长池镇)捉到反动头子杀掉,但主犯从犯不分,将被欺骗去的农民(胁从分子)也一律枪毙。还殃及这些人的家属,连亲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牵连而遭残杀。

红军中的南部县知识分子,被错误杀害的有閔南县委宣传部长马步旭、县团委书记赵文浩、秘书马安华、县农会主席黎光武,以及苟安顺、赵文定、席仕文等数十人。

楠木乡第8区苏维埃主席马益先参加红军,其父被刘湘部队杀害。反六路围攻胜利后,马益先随部队回乡,见父亲被害、房屋被焚毁,心里十分悲痛。这时红军叫他继任区苏维埃主席,马益先稍微犹豫,就以“革命意志衰退”为罪名押送“革命法庭”审判,判处死刑,连带其两个弟弟马举先、马贵先同被斩首。柴井乡第二村苏维埃委员陈邦生给游击队带路,一时高兴,学了几句外

省红军说话的腔调,被红军知道了,不由分说,将陈邦生抓到新政乡游街示众。柴井乡苏维埃赶紧写保状去保,无用,陈邦生被杀害于新政大西门河坝。

南部新政第13区苏维埃主席杨开仁、碑院第7区苏维埃游击队营长何廷湘、阆南县苏维埃军区指挥长李胜卫的亲属,都遭到批斗、关押、杀害。

1933年10月,阆南县第6区第三乡苏维埃在梨子垭一次就杀了40多人,在场的一些农民,到了21世纪初,回忆起来还不寒而栗。1934年9月,红军二进南部县,嘉陵江以东的老百姓有30%的人跑到江西岸“躲杀场”。

据1933年12月19日《新蜀报》报道,南部县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询,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剐,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此惨死者,已数百人。”

张国焘尤其敌视知识分子。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保管科长杨文局说,张国焘在银行“动辄杀人”,连剪票房的工人也不放过。有一次抓走十来人,这些人只是家庭出身不太好,读过书,有点文化而已。在银行之外发现假钞票,一次就枉杀许多人。

徐向前和部分红军以及地方干部坚决反对乱杀人,1933年6月,眼见事态越来越严重,川陕省保卫局在通江县城召开各县保卫局长会议,强调“杀人要严格按政策办事”,对关押的犯人要给水喝、给饭吃,禁止刑讯逼供。对万源县保卫局长杨泽甫不给犯人喝水而给喝尿,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撤销其局长职务。但是,这些精神并未能得到很好的传达。

南部“冤烈”任炜章、李载浦、张友民

南部县的任炜章及其战友张友民、李载浦,是最为典型的“冤烈”。

任炜章(1893—1934),南部县大桥镇人。少年行侠仗义,当过团总,曾替别人顶下杀人罪而

入狱。1922年到军阀杨森部,由见习官逐渐升为第二混成旅旅长。1929年6月,受旷继勋“遂蓬兵变”影响,也决心发动兵变投向共产党,遂由中共四川省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李鸣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任炜章遭杨森部排挤,离开军队,改任渠县县长。他为政清廉,积极肃清土匪,振兴地方实业,倡办职业中学,因搭救冤枉入狱青年又拒收其家人表示感激的银元而颇有声望。任炜章决心发动兵变,以“要饭吃,要薪饷”为口号鼓动士兵,联络地方武装,秘密组建起一支拥有200人枪的“人民军”。任炜章按照共产党的规章制度训练部下,整顿组织纪律,学习政治军事理论。

“人民军”在川陕交界处活动,不私取民物,不奸淫妇女,劫富济贫。桃园寺是南江力侠(俗称背二哥)去陕南的必经之地,自从任部驻扎该处,民房住满士兵,背二哥们只好野外露宿。任炜章知道后下令:凡背二哥过境,都提供住宿方便。由此深受劳苦大众拥戴,参军者日众,队伍扩大到近2000人。“九一八”事变后,任炜章将部队改名为“川北民众救国义勇军”,简称“川北民军”,任炜章自任司令。

1932年底红军入川,1933年1月,任炜章派张友民、李载浦率领部队前往川陕边境迎接红军。张友民与红军先遣队接上头,任炜章立即率队前往迎候。1月19日,任炜章与红73师师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见面,任炜章诚恳表示愿意参加红军,王树声等同意接收。

1933年1月25日,任炜章配合红四方面军主力夹攻南江县城,攻克东部屏障甑子垭、鹿角垭,2月1日占领南江。任炜章部发展到3000多人,红四方面军总部派去50多名干部帮助整顿,将其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独立第一师”,任炜章担任师长,政治部主任李载浦,参谋长张友民。

独立一师的政治部主任李载浦(1896—1934),南部县黄垭乡人,出身贫苦。1916年考取成都法政学堂,在成都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6年由同乡、黄埔四期生李鸣珂介绍考入武汉军校,学习期满被分配到叶挺部队的李鸣珂中队任文书,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随部

队参加“八一”南昌暴动，南下广东，潮汕突围时身负重伤，与部队失去联系。伤愈后辗转回到南部家乡，独立开展斗争。

1928年李鸣珂由周恩来派遣回川担任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恢复了李载浦的党组织关系。李载浦先后参加潼南“双江兵变”、邝继勋部“遂蓬兵变”、遂宁“吉祥寺兵变”。1930年冬，组织派李载浦去任炜章部，协助组建部队。任炜章率部起义，李任参谋长。部队改编为红军独立一师，李任政治部主任。

独立一师参谋长张友民（1902—1933）是南部县升钟寺人，从小“人穷性硬”。1927年考入成都团练校，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推荐为南部县团练局局长。他利用局长身份，发动群众运动，与省城的同志联合行动，迫使军阀田颂尧将专横暴虐的下属李炜如调离南部，还撤换了昏庸腐朽的县长。1929年夏，旷继勋领导“遂蓬兵变”部队路过南部县境，群众起而响应，遭到军阀报复围捕，张友民组织群众进行反围捕斗争，暗中保护了许多地下党员。到秋天，张友民的团练局长被撤职，他转而回到老家，担任升钟寺暴动总指挥。暴动失败后，张友民受组织派遣，历尽艰辛到南江县找到任炜章，担任“川北民军”党代表。部队改编为红军独立一师后担任参谋长。

为保障“通南巴”苏区后方，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任炜章独立师赴广元夺取普子岭、进行马桑庙阻击战、配合红11师32团作战反“三路围攻”，都赢得胜利。中共川省委巡视员余洪远检阅任炜章的部队，夸赞“独立一师为川陕苏区立了大功！”1933年2月19日，任炜章在《红色中华报》发表《我们要翻身，只有坚决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宣言：

……出身穷家，久历行伍，自愧20年来在军



红十师政治部镌刻于南江县的岩石上，现收藏在南江县博物馆

阀统治下奔走牺牲，无非受人驱使利用，每欲参加革命，又未得到良好时机。当此工农痛苦益深，民族国家亦危，以及红四方面军到来的时候，故特宣布坚决脱离反革命29军系统，加入红四方面军，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之下，誓死追随广大工农群众之后，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

江西中央苏区政府致电嘉奖任炜章“英勇觉悟，坚决果敢地打碎了自身的锁链，脱离了军阀的压迫，站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赞誉他领导的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幕”。

任炜章在张国焘“肃反扩大化”中被杀害了。因为任炜章的好友旷继勋（川陕临时革委会主席）敢于向张国焘提意见，张国焘视为眼中钉，但又对其畏惧三分，于是先拿任炜章开刀。以极端荒谬的一项政策为借口——对待起义投诚部队“留兵不留官”，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兵”为无产阶级，“官”是资产阶级应当消灭。

1934年4月21日，张国焘命令任炜章、李载浦带领独立一师全体干部到宏济宫开会，张国焘诬指任炜章是“改组派”，拿出田颂尧的“劝降书”作为证据，将任炜章独立师原排级以上军官全部扣押，士兵遣散，番号撤销。

当他们被捆绑扣押时，一些干部挣扎反抗，任炜章和李载浦说服部下服从命令，相信党组织会弄清是非。他们在监禁中遭到严刑拷打，强迫承认自己是“改组派”。任炜章、李载浦再三申辩，陈述三个月来的战绩，但是不被理睬。

参谋长张友民此时已调任川陕省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闻讯大惊，立即向上级进言，要求明辨是非，保护独立一师的军官。张友民也被扣上

“改组派”帽子，并以曾担任县团练局长罪名将其扣押。

张国焘先杀害了独立一师营长以上干部。6月，任炜章被杀害于通江县城郊，时年41岁。到秋天，在巴中县花丛垭，37岁的李载浦和31岁的张友民被杀害。该师排长以上军官200多人先后全部被害。

当田颂尧获悉任炜章被害消息时，幸灾乐祸，立即通电全川。

此事株连到任炜章的亲属。1935年3月红军西渡嘉陵江时，红三十一军赶去大桥镇石泉乡，找到任炜章的家，3名红军战士将任炜章的妻子张秀章拖出后门，不问青红皂白，当场枪毙了，同时还抄了家。

不久，红四方面军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追认任炜章为革命烈士。

1950年中共中央“老根据地慰问团”赠与张友民故居一块金光闪耀的“壮志永存”大匾。

1951年，李载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烈士遗孀李鹤鸣

南部县“划江而治，地接阴阳”，极易导致人员“身份疑问”，参加红军的干部战士常被怀疑为白军的“探子、特务”，这是南部县出现大批“冤烈”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鹤鸣，中共党员，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李鸣珂烈士的妻子。

其丈夫李鸣珂是黄埔四期生，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暴动中担任警卫营长，负责保卫核心领导成员，直接保护周恩来。由周恩来派遣回川后，李鹤鸣随丈夫到重庆，先后住顺城街、东水门芭蕉园，以家庭妇女身份掩护中共省军委秘密机关，担任交通联络员。李鸣珂先后领导了1928年6月潼南“双江兵变”、1929年6月“遂蓬兵变”、1930年3月“涪陵兵变”和4月涪陵“罗云暴动”。1930年4月李鸣珂在重庆被刘湘逮捕，牺牲于朝天门沙嘴刑场。

李鹤鸣承受着失去丈夫的悲痛，将4岁的次子托付给在刘文辉江津驻军中的党内同志张志和抚养，自己带着7岁的长子、1岁多的幼女回到南部县，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

1933年红军到达南部时，李鹤鸣精心绣制了三面镰刀斧头图样的鲜红党旗，南部地下党负责人就扛着这三面红旗，敲锣打鼓去迎接红军。李鹤鸣也抬上粮食、猪肉慰劳红军，并发动妇女踊跃支前。李鹤鸣先后担任阆南县红6区妇女委员、苏维埃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1933年10月，全区做军鞋共430多双，鞋垫270多双，李鹤鸣挨家挨户收军鞋，用大箩筐装好，箩筐外面贴上红纸，写上“红军”两个大字，带领妇女儿童运输队，敲锣打鼓送给红军。她还在输送食盐的干道旁，每隔10里路设立一个“军民招待站”，提供餐饮、洗衣服务，并组织起十多个“扩红”宣传队号召青年踊跃参军。

红九军军长何畏、副军长许世友知道了李鹤鸣是省军委书记、烈士李鸣珂的遗孀，他们亲切慰问李鹤鸣及其子女，为李鸣珂组织了隆重的烈士追悼会。

1933年11月，李鹤鸣调到红九军经理处被服厂担任教导员，被服厂营级建制、共200余人，一面发展生产保证军需，一面随着红军在战争中的进退而频繁搬迁。

1934年春战斗失利，红军收缩阵地，驻南部长坪山的红九军八十一团奉命撤离，被服厂也随军转移，经仪陇县转移到巴中县柳林铺。李鹤鸣拖儿带女，背着机器行李，同男同志一样走深谷，穿丛林，顶风沐雨昼夜行军。由于长期劳累，她患了慢性胃病，吃不下饭。不久，又转移到巴中县恩阳老场。1934年3月，敌机轰炸巴中城，被服厂连夜转移去通江县青江渡。8月红军反“六路围攻”胜利，工厂又奉命搬迁到通江以东的洪口。

李鹤鸣在通江白河渡口被关押，然后遭到杀害。《南部县志》记载：

8月，红九军被服厂迁通江洪口。李鹤鸣因儿女拖累，加之体弱，不堪日夜行军，因而掉队。后至白河渡口，被红军另部扣押，送毛峪镇鸡子顶保卫局，竟诬以叛逃而遭杀害。终年36岁。

关于李鹤鸣被冤杀，还存在更为详细的说法：她掉队后，牵着儿女在白河渡口上船时，船上有两个红军战士，是当地小伙子，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她。李鹤鸣穿着在重庆买的毛衣，提着在重庆买的箱子，在荒僻闭塞的毛峪镇一带很少见。

两个战士认为她有可能是国民党军官太太,来刺探红军情报,不由分说将她捆起来。李鹤鸣的侄子赵丛森回忆:

……张国焘在四川巴中(即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开会决定,审查白区地下党知识分子,责令部队把所有跟随红军的原白区党工作过的和知识分子统统带往巴中审查。那时总保卫局局长曾传天负责审查,李鹤鸣随部队送往巴中。当时我是在红九军廿七师七十七团一营三连,不知道她的情况。直到解放后回乡探亲,问早生(李鹤鸣长子李正文的小名),才说他母亲被一个特派员威逼她供认是国民党派到红军部队来的,李鹤鸣系烈士家属,忍耐不住和特派员吵起架来,还同那个特派员打赌,说看究竟谁是坏人。在由巴中往嘉陵江撤退途中,有一天把她和孩子分隔开了……

李鹤鸣罹难后,11岁的长子李正文在通江替人放牛,后经南部老乡带回老家,投靠舅舅。5岁的女儿还没来得及起个正名,据说被弃置在通江一个地名叫大草坪的地方,放在一家农民的土墙边,由姓方的人家拾去当了童养媳。1964年政府出面找到李鹤鸣的女儿,她发育不良,体质很弱,兄妹见面时才取了正名叫李正芳。

中共南部县委书记、阆南县委宣传部长李仕修

李仕修(1901—1934)南部永定乡人。1925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回乡参加中共南部特支组织的一系列反抗军阀暴政的斗争,曾担任中共南部县委书记。

1933年春夏之交,川陕苏区的红军极度缺盐。李仕修组织几名党员,穿过重重封锁线,将南部出产的食盐运往川陕苏区。8月14日,李仕修等地下党员扛着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敲锣打鼓迎接红军进入南部县境。9月组建苏区阆南县委,李仕修出任宣传部长。

1934年春红军收缩阵地,撤离南部县河东地区,李仕修等一批南部籍干部也随着转移到巴中、通江。然后,他们莫名其妙地被隔离审查了。

李仕修非常愤慨,提出要向红四方面军总指

挥徐向前写信反映情况,他一起关押的南部籍干部说:“如此对待我们白区干部,太冤枉了!我们要反映!”大家一致赞成,公推李仕修执笔写信。信写好后,托阆南县苏维埃作战部干事马安兴和另一名战士转交徐向前。

马安兴和战士装成讨饭的,把信藏在打狗棒的竹筒里。他们一前一后,走到一条溪水旁时,被便衣岗哨拦住。战士走在前面,藏在竹筒里的信件被搜查发现了。走在后面的马安兴机警地绕过了岗哨。马安兴到达南江县的上两河,遗憾的是,没能找到徐向前。

而搜出的信件直接送到了张国焘手里。张国焘秘密派人到通江县,将李仕修、马步旭、赵文浩、席德松等从山上转押到通江东门外招待所,这几个人便再也没有了消息。

李仕修时年33岁,他留下一首诗:

繁星闪闪风萧萧,临难不改一身豪。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明朝!

在1951年国庆招待会上

1951年9月,中共中央派出“老根据地慰问团”来到南部县,李鹤鸣的大儿子李正文当选南部县所有红、烈、军属的代表,去北京出席1951年国庆盛典。

9月30日晚他们出席了中央设宴的国庆招待会,所有南方来的老区代表都安排坐在前面。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走到每张餐桌前,和大家挨个握手。毛主席问四川城口县的老区代表田先明:“你是哪里人?你们那里的农民吃不吃得饱?有没有衣服穿?”还问了一句出乎他意料的话:“红军在你们那里好不好?”

田先明壮起胆子回答:“红军好倒是好,就是杀人太多。”

毛主席转身问在旁的徐向前:“老徐,他说得对不对?”

徐向前点了点头说:“这是张国焘犯的错误。”(《终生难忘的首都国庆观礼》,田先明口述,朱万鹏整理,载《重庆政协报》2011年11月1日)■

(作者单位为原重庆市文化局创作室)

(责任编辑 黄 钟)

“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

○ 洪振快

“狼牙山五壮士”是一个著名故事,因为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并沿用数十年,可谓尽人皆知。该故事的官方版本,可以新华社北京2005年6月16日电、次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为代表: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第七连奉命掩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六班马宝玉等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这个版本已经沿用了几十年,但也不断受到质疑。比如,文革中,红卫兵对葛振林、宋学义跳崖而未遇难表示怀疑(详见后文)。1994年7月9日,《长江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当时六班不是5个人,而是6个人,还有一位副班长,投敌被杀。1995年8月11日,《羊城晚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称五壮士跳崖是“三跳二溜”,马宝玉等三人跳崖牺牲,葛振林、宋学义是“顺着崖壁溜了下去”,所以被树木挂住,得以生还。

那么,真相到底怎样,得依靠证据。有可能提供证据者,主要是以下一些人:首先,是两位当事人——葛振林、宋学义。其次,是目击者——易县龙王庙村农民冉元通和棋盘陀庙的李道士,

据说他们看到了五壮士跳崖。此外,五壮士所在部队——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七连二排六班的相关领导——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一团团长邱蔚、政委陈海涵,七连连长刘福山、指导员蔡展鹏,他们也算是知情者,但在五壮士跳崖前的活动上,他们并非目击者。还有第一军分区宣传干事钱丹辉和《晋察冀日报》记者沈重,他们采访过葛振林、宋学义。当然,上述人员都是一个方面即“我方”的人,还有一个方面——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

当我们深入“狼牙山五壮士”有关叙述的细节时,就发现上述人员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下的陈述存在诸多互相矛盾之处。而对于同一件事,相互矛盾的描述可能都不符合事实,也可能有一个符合事实,但不可能同时都符合事实。因此,对于“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还有待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在何处跳崖

狼牙山五壮士事迹的传播是从其所在部队开始的。9月25日五壮士跳崖,当日杨成武就获知情况,并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报告;第二天傍晚,邱蔚又向杨成武报告二位负伤的战士葛振林、宋学义已返回部队。得知消息后,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立即让宣传科派人到一团采访。当天,宣传干事钱丹辉就背上背包出发了。他爬上狼牙山,在老君堂那里找到了邱蔚同志,然后又赶到桑岗卫生部,找到葛振林和宋学义同志,代表分区领导向他们表示慰问,让他们好好养伤,并仔细问了他们那个班的战斗经过。钱丹辉同志回来后,很快就写出了报告。我(杨成武)一看,写得挺好,就叫机要科立即向军区发报。没想到,聂司令员连着收到我们的两个电

报后,马上就报告八路军总部。很快,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传遍了抗日根据地,延安电台还向全国作了广播,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则消息。我们一分区战线剧社的同志,还自编自演了歌颂狼牙山五壮士的节目。”(杨成武:《敌后抗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286页)

钱丹辉1995年回忆当年采访经过:“杨司令闻讯,立即命我去调查,直到老君堂见了邱蔚团长,详细讲了一团七连六班在班长领导下,摔断步枪,纵身跳下悬崖经过,一一作了笔记。又到卫生部看望了生还的两名战士葛振林和宋学义,他们虽受伤但没有致命伤害。回到司令部(玉皇沟门)向杨成武司令作了汇报,写了电报,开列了名单,上报军区聂司令员。当时无论是邱蔚同志的谈话,还是葛振林、宋学义二同志谈话都讲得很详细。我跟葛振林宋学义谈了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余炳年:《壮士葛振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249页)

10月18日,晋察冀军区发出关于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训令介绍五壮士跳崖前后经过:

该连以第六班掩护主力转移,英勇战士胡德林、胡福才、葛振林、宋学义在班长马保林同志(党的小组长)领导下,以高度的英勇顽强精神,固守阵地,与敌激战五小时。敌人曾作四次猛烈冲锋,均被我击退,计杀伤敌寇五十多名。最后因子弹、手榴弹全部用完,且众寡悬殊,在最危急时,该班长马保林同志领导战士葛振林(党员)、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四同志,先将所有武器全部破坏,遂即跳万丈悬崖。马保林、胡德林、胡福才三同志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二人光荣负伤。此次战斗计毙伤敌一百余名以上,敌异常恐慌,全无斗志而退。(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70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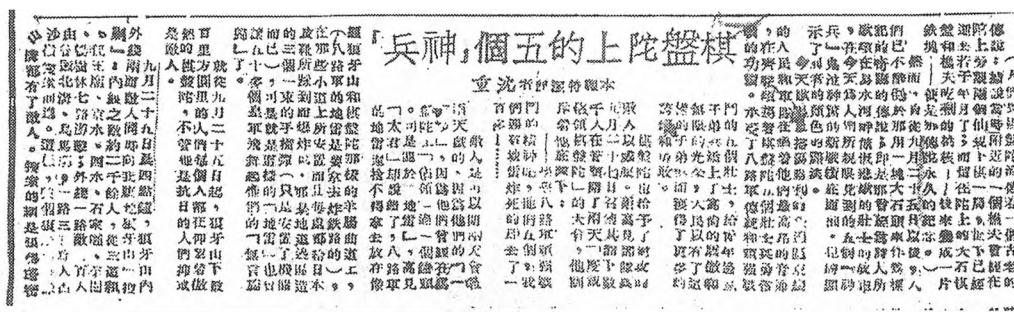
训令说了“跳万丈悬崖”,但对跳崖的细节没有交代。训令刊载于10月23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

1941年11月7日《晋察冀日报》刊登聂荣臻等签署的训令



1941年11月7日《晋察冀日报》刊登聂荣臻等签署的训令版的《抗敌三日刊》第318期。11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上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沈重撰写的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以下简称“神兵”)。据后来的文章介绍,沈重是《晋察冀日报》驻狼牙山所在易县地区的特派记者。当他得知这一事迹后,立即奔赴五壮士所在部队做深入采访;10月19日,文章完成,稿件经秘密交通线送往报社驻地平山县(其间需经过七个县,200多公里路);稿子到达后,立刻进入编辑程序,进而排版印刷,11月5日出报。(王卫国:《“狼牙山五壮士”是怎样报道出来的》,《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1期)该报11月8日也全文刊登了训令。

“神兵”对五壮士战斗和跳崖有详细描写,其要点是:五壮士把日伪军引向狼牙山顶峰棋盘陀(让敌人认为一团主力在棋盘陀上面,引其围攻),打退敌人五次冲锋,弹尽路绝之后,摔断武



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登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

器，五人跳崖，“五个人一齐，向下……葛振林和宋学义给树枝挂在半空，二十丈绝岩的沟底有着三堆血肉……”（转引自王笠夫：《狼牙山五壮士赞歌》，接力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训令和《“神兵”》给人造成印象，是五壮士在棋盘陀顶峰跳下了“万丈”或“二十丈”的悬崖，三人在沟底成了“三堆血肉”，“壮烈殉国”，而两人“给树枝挂在半空”，“光荣负伤”。这也正是壮烈的狼牙山五壮士故事的核心所在。之后，根据训令要求，“在烈士牺牲地点，建碑纪念，并命名为狼牙山三烈士碑”，1942年7月纪念碑在棋盘陀顶峰建成，8月举行落成典礼。9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此事，标题为：“棋盘陀上纪念塔落成，三青年烈士英名永垂！”正文说：“（本报晋察冀边区通讯）易水狼牙山棋盘陀三勇士壮烈捐躯（按：三勇士壮烈捐躯事迹，见本报八月三日四版）后，军区为表彰忠烈，特在烈士殉难地建立巨塔，以资永远纪念。”（转引自余炳年：《壮士葛振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由这些材料可见，中共官方认定，棋盘陀顶峰即为烈士牺牲地点，亦即跳崖地点。人们印象中一直如此。

可是按照1957年7月15日出版的《红旗飘飘》第2集刊出了葛振林的口述（作家王愿坚记录整理）《狼牙山跳崖记》，最后跳崖的地方并不是在棋盘陀顶峰，因为文中说：“跑了一阵，我们看看把敌人撇远了，才找了个小山头歇下来。……我绕山走了一转，看了看地形：这地方离主峰棋盘陀不远，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正面从我们来的地方是一条小山脚，弯弯曲曲地伸开去，背后和两侧是陡陡的山坡，下去就是望不见底的陡立的悬崖。”然后五次阻击战都发生在此地。跳崖后，两人爬回原阵地，宋学义发愁“奔哪里”，葛振林说：“上棋盘陀。现在敌人走了，那里可能有自己人，先弄点吃的再说。”（葛振林讲、愿坚记录整理：《狼牙山跳崖记》，《红旗飘飘》第2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1、46页）若依此说，两人所在地方，是在棋盘陀下面的一个山包，而不是在棋盘陀顶峰。

在此之前，《解放军报》曾刊登文章，写到邱蔚“登上了狼牙山的高峰之一——棋盘陀。三烈士塔就修建在这里”，“邱蔚将军和刘福山站在塔旁，久久地注视着对面的“莲花瓣”（五壮士跳崖的

地方），悼念着壮烈牺牲的勇士”。（邢纪棠：《邱蔚将军重回狼牙山》，转引自中共蔚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蔚县委员会合编：《狼牙壮士马宝玉》，1992年9月印，第89页）

而宋学义的叙述则是：“太阳还有一竿子高，我们便攀上了棋盘陀的顶峰。日本鬼子也象一群疯狗似的跟了上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三面是万丈悬崖，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引敌人了。日本鬼子还在拼命向顶峰上爬……”从这个描述看起来，给人的印象五壮士跳崖地点还是在棋盘陀顶峰。（宋学义：《在狼牙山上》，转引自王笠夫：《狼牙山五壮士赞歌》，接力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该书后面注明此文原载《星火燎原》选编第六期，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宋学义1971年去世，叙述应早于1971年出版）

1985年4月，冉元通讲到五壮士：“他们说着，上了小莲花瓣，走向牛角壘。我与他们分了手，上了大莲花瓣山。大莲花瓣山比牛角壘高，五位八路军的动作我能看清楚。”（冉元通：《壮士跳崖目击记》，转引自王笠夫：《狼牙山五壮士赞歌》，接力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这就是说，五壮士并未上棋盘陀顶峰，而是上了小莲花瓣的牛角壘。

1985年8月，杨成武将军的《敌后抗战》一书出版，里面提到：“六班的同志赶紧往棋盘陀山峰上爬，谁知那里早上去敌人，机枪一个劲地朝他们打。他们只好转身攀上棋盘陀附近的一个山峰。这个山峰叫牛角壘，异常险要。那凌空而起，伸出来象只牛角的悬崖，使人望而生畏。牛角壘三面是悬崖绝壁，只有一面有条崎岖险峻的小路，爬上牛角壘，等于走上了绝路！”依这段话，五壮士上的是牛角壘，而且当时棋盘陀已被敌人占领，五壮士就是想上也上不了，这也与要把敌人引向棋盘陀一说有冲突——既然此时棋盘陀已被敌占领，哪能还要引向？

在后来，比如，1995年3月葛振林也说：“最后退到靠近棋盘陀顶峰的一个山头，只有我们五个人。”（《壮士葛振林》第250页）1996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年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一书中，葛振林的口述与杨成武将军《敌后抗战》一书的描写几乎一模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关于跳崖地点，就是“五壮士”的幸存者还在世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

跳崖是怎么跳的

“狼牙山五壮士”的核心情节是跳崖。训令和《“神兵”》对跳崖的细节都不明确,仅是简单地说“遂即跳万丈悬崖”,“光荣负伤”,“给树枝挂在半空”。以后官方版本涉及此处,均以“负伤”、“给树枝挂在半空”一笔带过。文革中红卫兵对此表示怀疑,在批斗会上当众质问宋学义:“人家都跳崖跌死了,你怎么活着回来了?你再到狼牙山跳跳,跌不死,就承认你是英雄。你从房顶跳下来也行,房顶还没狼牙山高,跌不死也算……”(刘荣荣、朱艳冰:《宋学义的最后一段旅程》,《河北日报》2011年6月28日)

1995年8月11日,《羊城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壮歌重唱狼牙山》,写到“五壮士”跳崖细节时说:马宝玉“带头跳下万丈深渊。紧接着胡福才、胡德林也从马宝玉跳崖的地点跳了下去。几乎同时,葛振林、宋学义在距马宝玉只有四五步的地方顺着崖壁溜了下去。……因为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是‘跳’,距崖壁比较远,坠入了万丈深渊;葛振林、宋学义是‘溜’,紧挨着崖壁,被崖壁半腰上长出的树木挂住,受了重伤,昏死过去。”

这个说法为跳崖而未遇难提供了一个解释。给《羊城晚报》提供材料的是当时一团政委陈海涵(后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夫人陈逊。1942年5月在易县北娄山村一团驻地给五壮士庆功授奖后拍摄的合影中,陈海涵就站在葛振林(或宋学义)的旁边。而陈逊当年则是第一军分区战线剧社的指导员(后曾任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中不少细节描述都被葛振林等驳斥,但“溜”的说法却未见反驳。

实际上,从1957年刊出的葛振林自己的口述中,也是可以印证“溜”的说法:

等我抬起头来,只看见班长的白衬衣在崖上一闪——他跳下去了。……我就近跑到崖边,一纵身也跳下去。我是第二个跳的。

当时自己的决心是:猛一跳,栽下去就算啦。谁知道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不由自主地伸出来,去抓树枝子。我闭着眼,扎煞开手,左抓一把,脱了,右抓一把,脱了。手被树枝



1942年5月庆功授奖大会后,杨成武(前中)、陈海涵(前左一)、罗元发(前右一)等领导与葛振林、宋学义(前排戴胸花者)合影。

划了,不觉得,腰被石块碰了,不觉得,只是“蹬蹬”地往下滚。猛然身子一虚空,又“通”地一声一撞,脸朝山、屁股朝沟,停住了。这时,我心里还是明白的,伸手摸摸,身子底下是并排的几棵小树,把我给挡住了。我知道没有摔到底,自己还活着,只是浑身没劲不能动,又怕一动再摔下去。这时会不会摔死,也没去想它,倒是身旁的石头怪讨厌的。也不知是我和同志碰下来的还是敌人推下来的,人头般大的石块顺着我下来的山崖不断地往下滚,一会,“刷刷刷”下来几块,一会“刷刷刷”又下来几块,经过我的身旁,“通通通”摔下崖去了。幸好一块也没有砸到我的身上。接着听到敌人的声音。我闭着眼静听,那声音离我不过半里来路,很清楚。日本鬼子在哇啦哇啦地说什么,一个伪军在说:“这些八路真有种,死也不缴枪!”不一会又向着山沟里打了一阵枪,子弹嗖嗖地从我头上飞过去。我心想,我只要一挪动地方就下去了,反正你得不到活的。

敌人在我们阵地上打了一阵枪,在棋盘陀方向又响了几炮,就再也没有动静了。大概那些家伙走了吧!我试探着抬起头,从树杈里看出去,原来我正在大沟的半山腰里,再往下不远,就是立陡的悬崖。我正被一块大石头和几棵小树拦住了。要是再偏左一公尺呀,别说话,哪怕是连骨头也剩不下啦。再往上看看,离跳崖的地方约有不到一里地;太阳已经平西了,再看看自己,衣服到处是豁口,血从破衣服缝里流出来,也说不

清是伤着了哪里。最疼的是腰，麻辘辘的，一动就钻心地疼，大概伤得不轻。

我想，老呆在这里不行哪，就决定往山上爬。当时还有股急劲，咬咬牙，翻过身来，就往山上爬。别看滚下来时容易，再往上爬就困难多了，爬一步要停下来，揪上一棵小树或者一块石头，咬咬牙，攒攒劲，再爬上一步。爬了好大一会，还不到一半。

正爬着，忽然听到不远处草叶子、石块“哗啦”一响，我一愣，连忙靠上一块石头，往外一看，只见不远处一个人在动，好象是宋学义。我小声喊了声：“宋学义！”

“哎，是班副么？”

“是呀！你怎么样？”

“我动不了啦！”

我看看离他还有一段路，横着又走不过去，只好说：“动不了也得爬。敌人可能走了，你自己设法往上爬，我在上边等你。”……

我爬上原阵地的时候，太阳已经靠山了。我爬到班长跳下去的地方探头望望，这个地方特别陡，黑沉沉的，一眼望不到底，近处，光溜溜的石尖横点着，石缝里长着一簇簇酸枣棘子，被晚风吹得一摇一摆。我放开嗓子喊：“班——长——”“马——保——林”回答我的只有空谷的回声，和那越旋越低的鹰。我沿着崖边转到前沿。我们战斗过的地方，到处是一片黑，真想不出当时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葛振林讲、愿坚记录整理：《狼牙山跳崖记》，《红旗飘飘》第2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4—46页)

为表示对《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的不满，1995年9月2日，葛振林在北京京西宾馆写下一份《我的说明》，对跳崖后的情况作了说明：“我多次向首长作家和听众说过，当年我和宋学义纵身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到坡上……”(见余炳年著：《壮士葛振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依葛振林所述，他跳下的应该是一个“陡陡的山坡”，所以才有“溜”和“滚”下去的动作，也才有“爬到坡上”而不是攀崖的动作。

后来，葛振林又有新的说法。2005年7月前一到三年间，葛振林在接受大型文献纪录片《八路军》摄制组采访时说：“敌人一上来了，就把手榴弹扔了过去，把敌人一炸，调头一看，看不见班

长了，班长可能是牺牲了，也搞不清楚了，我们就往这边跳了，跳下去了以后呀，一层一层地树，我们跟那个猴子一样，这棵树窜那棵树，那棵树窜这棵树，就是那样在树上架着，摔到半腰上了，让那个树给挡住了。”(葛振林：《狼牙山跳崖那悲壮的一幕》，见张军锋主编：《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92页)按这个回忆，似乎跳下去后也不是“溜”，而是在树间“窜”。

敌我双方战斗伤亡

关于9月25日的战斗伤亡，训令中说七连在上午的阻击战中，用地雷“毙伤敌四十余名”，七连主力退出后，五壮士在打退敌人四次过程冲锋中，“计杀伤敌寇五十名”，总共“毙伤敌一百余名以上”。《“神兵”》一文中说，“敌高见部队长九月二十七日召集其部下数千人在营头开了两天‘庆祝占领棋盘陀’的大会，他训斥着他的部下：‘学学八路军顽强战斗的精神吧，他们五个，我们连被地雷炸死的却去了一百多！……’”所说与训令基本一致，即日方死伤“一百多”人，不过突出了我方是“五个”，给人的印象是我方除五壮士外没有死伤。

《聂荣臻年谱》1941年10月16日条下写到：“北岳、平西的秋季反‘扫荡’作战结束，历时66天，作战800多次，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但我抗日军民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1900多人，根据地面积缩小了4000多平方公里。”

而日方提供的数字则不太一样。日方在总结1941年夏季围剿晋察冀边区(日方将此次围剿作为“1941年度的治安战”的夏季“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中)的作战成果时说：

此次作战的综合成果如下：(据第一一〇师团的材料，截至作战中途的10月27日)

敌方损失，遗尸5616具。俘虏3769人。……

我方损失战死84名、负伤224名。

上述数字，做为对共肃正作战战果是十分巨大的。方面军的综合战果数字不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2页)

当然，日方公布的战果只是可供参考的一面

此次作战的成果

此次作战的综合成果如下：（据第一一〇师团的材料，截至作战中途的10月27日）

敌方损失：

逃尸 5,616具。

俘虏 3,769人。

主要缴获：

迫击炮 7门、重机枪14挺、轻机枪54挺、自动步枪103支、火枪784支、步枪2,413支、子弹116,777发、手枪444支、刺刀3,707把、手榴弹144,504颗。（以下笔者略）

我方损失 战死84名、负伤224名。

上述数字，做为对共肃正作战战果是十分巨大的。方面军的综合战果数字不明。然而此次作战的收获，战果尚属次要，主要在于扩大了我治安圈及对中共施加的压力，从而使之陷入经济穷困等方面。当时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大佐曾有如下叙述：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中的有关内容之词。

1957年刊出的葛振林口述中，详细讲了战斗经过——包括四次打退敌人冲锋，但没有讲毙伤敌多少人，却说“在进入战斗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配备了二三十发子弹，五颗手榴弹，经过一上午的战斗，子弹早没了”，在班长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时，也只说“‘轰！’地一声，敌人又往后缩了一下”，没说具体炸死多少敌人，只有在跳崖后又再爬上来才说“在我们阵地前面，敌人的尸体都被带走了，到处是一堆堆的血衣，看样子被我们打死了不少”。（《红旗飘飘》第2集，第43、46页）

按照葛振林此处的说法，在凌晨战斗开始时五个人总共只有100—150发子弹和25颗手榴弹，即便不算七连主力未突围前的战斗，而把它全部用于打退敌人四次冲锋的战斗，其能毙伤敌人50余人，在山地战中可以说是命中率相当高。

按照葛振林此处的说法，也没有七连头天晚上预埋地雷，导致第二天日伪军进攻时“毙伤敌四十余名”（训令）或“让五十多个‘皇军’飞舞起他们的‘无言旋归’了”（《“神兵”》）的事。葛振林说：“走到半夜十二点钟左右，翻过了狼牙山，来到山背后一个小村子。连里把一、三排派出去放警戒去了，我们二排就集中在山脚下的几间草房子里待命。一直待到夜三四点钟，任务还没有来，我们私下里说：大概今天不会有情况了。就弄了点草一铺，有的同志还打开了背包，躺下来。我一歪身，拉过胡德林个被角盖在身上，刚刚睡着，就被一阵急促的枪声、手榴弹声震醒了。这时指导员跑得汗淋淋地闯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下命令：赶快上山，靠近团首长。”

可见当天夜里，根本没有布置地雷（指“三个一束的手榴弹”）。

而《棋盘陀上的“神兵”》详细交代了何谓“地雷”：“可是关于‘地雷’，高见‘太君’却说错了，八路军的地雷还舍不得拿去放在像通狼牙山和棋盘陀那样的羊肠曲道上（八路军的地雷是要拿去炸铁路的）。在那些小道上所安置的和每处都给日本皮鞋所踩到而爆炸的，是地道边区造的三个一束的手榴弹（只是安置了机关而已）”。

但葛振林在1957年以后的口述中，则与训令和《“神兵”》差不多。

关于我方伤亡情况，除了跳崖牺牲的三位烈士之外，这次战斗中七连到底有没有伤亡？葛振林在不同时期的口述有不同的说法。在1957年刊出的口述中，他没有说到伤亡，只是说“这时机枪组不知道哪里去了（那时班长无权指挥机枪，他们大概在转移时走散了），留下来坚持的只有我们班五个人”。（《红旗飘飘》第2集，第41页）而在1985年出版的杨成武回忆录中，则说：“在激烈的战斗中，连长刘福山负了重伤，他带领的二班和机枪班的同志大都牺牲了。”（《敌后抗战》第289页）1995年刊出的葛振林口述中，说法与杨成武几乎一模一样，明显是沿用了杨成武的说法，可见是认同其说的。（见葛振林口述、王书波整理：《视死如归壮军威——忆狼牙山之战》，《党史博览》1995年第12期）将两处对比，似乎前者的“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是后者的“大都牺牲了”。

1994年7月9日《长江日报》刊登的文章中，说“七连六班当时共有9个人，除了五壮士之外，还有个小商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另外几个战士因病没参加战斗，当时阵地上共6个人”。易县文化馆的王公理写信给葛振林，请求说明事实真相。葛振林回信答复说：“9月25日战斗开始时，我们除本班12名战士外，还临时配备四个人的机枪组和几个民兵。战斗到后期，机枪组因为弹药消耗完了，他们和几个民兵先转移。我们六班除了伤亡者，也只剩下马宝玉等五名战士，直至战斗到最后跳崖，此时并无其他战士补充。”至于吴希顺，六班没有，二排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王公理再次写信要求“开列当年全班战士的名单”。“然而，葛振林为难了。已是耄耋老人，时间又过去了50多年，再好的记忆，也无法满足王

公理的这一个要求了。”(本段内容见《壮士葛振林》第246—247页,《狼牙山五壮士赞歌》第356—357页)

从葛振林的复信中可以知道,9月25日战斗开始时,六班原有12人,但到阻击敌人四次冲锋时已经只有5人了。那么其余的7人呢?从“我们六班除了伤亡者”这句话来看,似乎是“伤亡”了。而在杨成武的叙述中,9月23日七连“接到团长保卫狼牙山的命令,立即集合队伍出发了。二排六班走在队伍后面,全班除去因病住院的同志外,只剩下五个人”。(《敌后抗战》第287页)依据这句话的意思,六班不止五壮士,还有其他人,但在战斗发生前其余人“因病住院”了。葛、杨两人的陈述都承认六班实际上不止五壮士,但在其他人下落的说法上互相矛盾。

至于葛振林复信中提到协同作战的民兵,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原来共同边走边打跟上来的民兵,一个不剩了。有的战死;有的挂彩,就地隐蔽;有的中途散失了。”(《壮士葛振林》第91页)

“五壮士”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

从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对很多细节的描述都是不一致的,包括对带头跳崖的班长的名字,都有三个说法:在训令中是马保林,《“神兵”》中是马宝玉,1942年重庆出版的《国讯》杂志中是马保林(集纳:《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河北通讯)》,《国讯》1942年第309卷(期),第13—14页),1957年出版《红旗飘飘》第2集中是马保林,1958年拍摄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中是马保玉,杨成武《敌后抗战》和《杨成武回忆录》是马保玉。目前很多文献都说是马宝玉。

有一篇《于细微处见精神——狼牙山英雄宋学义访问大寨》(李成杰、赵倡文,《福建党史月刊》2005年第5期)的文章记述1970年春天河南沁阳县委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郭玉栋与宋学义一起到大寨学习,陈永贵接待,设家宴接风等事。郭玉栋说1969年和宋学义去太原化肥厂,厂方请客,宋学义推说自己有病,不能赴宴,事后问他为

藏人的钢盔在乱晃了。班长随手把枪往大沟里一撇,真叫人心痛,那支崭新的三八大盖子“轰”地声飞到山沟里去了。接着他看了我们一眼,扭身就往一块光崖上跑过去。他这样做,我心里也明白了,我连忙拾起枪往石头上一摔,没摔断,也随手甩下沟去。等我抬起头来,只看见班长的白衬衫在崖上一闪——他跳下去了。我只觉得心里象吃了多饭似的,闷闷的。撒腿就往崖上跑,跑着,听到后边崖里响,大概他们几个也在掉家伙。我就近处跑到崖边,一纵身也跳下去。我是第二个跳的。

当时自己的决心是:猛一跳,就下去就算啦。谁知道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又不由自主地伸出来,去抓树枝子。我闭着眼,扭头,左抓一把,股了,右抓一把,股了。手被树枝划了,不得,腰被石块碰了,不觉得,只是“蹬蹬”地往下滚。猛然身子一虚空,又“通”地声一撞,脸朝山、屁股朝朝,停住了。这时,我心里还是明白的,伸手摸摸,身子底下是并排的几棵小树,把我给撞住了。我知道没有撞到底,自己还活着,只是浑身没劲不能动,又怕一动再摔下去。这时会不会摔死,也沒去想它,倒是身旁的石头怪讨厌的。也不知是我和同志们砸下来的还是敌人推下来的,人头般大的石块顺着我下来的山崖不断地往下滚,一会儿“刷刷刷”下来几块,一会儿“刷刷刷”又下来几块,经过我的身旁,“通通通”撞

葛振林自述跳崖经过(葛振林讲、作家王愿坚记录整理:《狼牙山跳崖记》,《红旗飘飘》第2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7月15日出版)。

什么不去,宋学义说:“狼牙山阻击日寇打得那样艰苦,两天一夜水米没沾牙,可我们从群众萝卜地过,将萝卜拔起按下,牢记革命纪律,不白拿群众一针一线,不白吃群众一粥一饭,终于赢得了群众的拥护,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吃一顿饭事小,给贪心开了方便之门,却事关重大。”

而葛振林在1957年刊出的口述中则说:“刚才忙着打仗倒不觉得,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

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人拔个吃着……班长从容地咬了口萝卜……我把块萝卜屁股一扔……”这是跳崖前的活动。跳崖后,往上爬的过程中想起死去的战友:“还有那个不笑不说话的胡福才,那个年轻的胡德林,几个钟头以前还一气吃了两个大萝卜……”爬上原阵地后,“我转了一圈,实在有些累,这时宋学义还没有上来,我砍了两根棍子,又拔了两个萝卜,擦净了泥,等着他。又过了一会儿,听到宋学义的喊声。我连忙过去帮他攀上崖头。他的腰骨摔断了,一上来就大口吐血。好不容易把血止住了,吃了块萝卜压了压。……”

在上世纪80年代,葛振林在一次座谈会上,再次谈到拔萝卜的事,陈述有了一些变化:“突然发现半山下不远处一块坡地长着一片绿油油的白萝卜,象无价之宝似的吸引着我们。竟(尽)管使我们高兴地跳了起来,但是谁也没有动。那时部队纪律严明,每个战士都牢记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命令谁也不能拔群众的萝卜吃。几个战士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盯在了班长的脸上。我看见班长十分为难,皱了好几次眉头,似乎才狠下心来,允许每人拔一个萝卜吃。并对我们说:‘等打完这一仗后去找萝卜主人赔偿。’我们香甜地吃着……”(葛振林:《血洒狼牙震敌胆——忆老战友马宝玉牺牲前后》,见中共蔚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蔚县委员会合编:《狼牙壮士马宝玉》,1992年9月印,第44页)■

(作者附注: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张全海博士帮助查找资料。)

(责任编辑 黄 钟)

悼于光远老

○ 吴象 口述 吴阿丽 整理

近三年来,老病常犯,并发症增多,不断进出医院,与老朋友也疏于来往。这一次医疗效果明显,从医院回到家里,感到身体精神恢复了一些,正与女儿商量去看望一些老朋友,当然就有光远同志。没想到9月26日,就得到光远去世的消息,深感悲痛。第二天就到光远家中吊唁,在光远同志的遗像前向他深深鞠躬的时候,不禁想起与光远同志相处的点点滴滴。回到家里,心情更是久久不能平复,一连几天如此。

记忆一下沉入历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前后十多年在山西日报社任职期间,就听说过于光远这个名字,知道他是中宣部的科学处兼理论处处长,别的却一无所知。文革十年动乱的末期,邓小平复出任副总理,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并成立了七个人为首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文件发的消息十分简短,别的几乎什么都没说,七个人的名字却一一公布了,于光远的名字是比较靠前的。我从几个报人老朋友处听到关于他的几则“目光远大,敢作敢为”的小故事,对他萌生了仰慕之情,可惜无缘相识。此后的三四年是个历史大转折时期,事件迭起,风浪不断,大悲大喜。最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1980年5月,我奉中组部调令,从安徽来到北京,由安徽省委副秘书长改任新建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我报到时,室主任邓力群笑着对我说:“室里不给你分配什么任务,你主要是帮助万里同志搞些调查研究,起草讲话报告之类。刚来中南海,一般人都有点神秘感,你还是搞在安徽的那些事,领导也没有变,只是环境是新的,过几天就熟悉了。至于办公室、看文件、电话、用车这些问题已安排好,有人领着你去看,有什么问题再商量。我这边有间办公室,主要在勤政殿那边办公,有事可随时打电话联系。”

开始工作之后,才知道书记处研究室是原来国

务院政治研究室改编的,名称、机构、人员有了变动,又从中宣部、红旗杂志等单位调来了不少人,编辑出版了四五份内部刊物,人来人往显得很忙碌。于光远听说已任新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不知是否在此挂职,却时常来参加会议。会议休息中间或会后,大家经常在走廊里聊天,光远同志是个极随和的人,毫无领导架子,喜欢和别人闲聊,而且总是很有兴趣地聆听别人讲的信息和意见,这样他和我就逐渐熟悉了起来。

光远同志最大的特点是平易近人,待人平等,什么人都能谈,谈什么都行,都谈得拢,谈得愉快,而且还都能说出一套系统的看法,所以,不少人都称他是百科全书式学者。他主要是位经济学家,经济学需要集多种知识于一体,他对经济学涉猎甚广,重视创新,对其他交叉学科也有兴趣研究,造诣颇深,如自然辩证法、国土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数量经济学、未来学、休闲学等等,他都写有专著,真正是著作等身。在这段时间不长的日子里,尽管我与光远同志直接交谈次数不多,内容也非深谈,可对他如何为人处世,却深受启发。我深感有缘认识光远同志,时常在不同场合与他不期而遇,与他交谈如沐春风,这对我来说是来京后最高兴的收获。

后来,光远同志社会科学院的事忙,我也不断下乡出差,互相就很少见到了。不料一次开会,我又看到了光远同志坚持原则的另一面。这个会召开的准确年月记不准了,是社会科学院为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
特 约 刊 登
回忆久久为您撰写回忆录
咨询热线: 400-653-6199



于光远

他从事科学活动四十周年举行纪念座谈会,地点就在原来学部的一个会场内,大概一百人左右,既有年龄较大、气度不凡的学者、将军、名流及有关各界知名人士,也有许多像我这样的普通机关干部、仰慕者。我到得比较早,四处张望了一下,竟没有找到一个熟人,好在空座位还很多,我便找了个地方坐下,也不知道旁边坐的是谁。到正式开会宣布到会的贵宾名单,才知道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上比较解放,社会上对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很多,也反映到这个会上,甚至有些大科学家对此也持支持态度。有位年轻人听着不顺耳,突然站起来表示反对,并说这是伪科学。于是会上发生了争论。争论中有位最负盛名的大物理学家也讲了话,引起了轰动。我听后却不知如何评论才好。多年后与一位也参加过这次会议的同志谈起这段往事,他说,这位大科学家确有大家风度,讲话富有逻辑性和吸引力,但仔细推敲,实质却是在更高层次上支持特异功能,还是欠缺一点科学精神。

当时会场的气氛还是使会议主持者感到有些尴尬,没想到这时于光远本人站了起来,他说,我从来不赞成什么特异功能,最近社会上嚷嚷的不少,中宣部和有关部门也收到各种反映,什么

耳朵识字,隔墙认人,等等,我们下去做了几项调查,发现了许多弄虚作假的现象。他不仅语言朴实,几乎没有专业用词,举例更是普通简短,人们平常习见,调查才知是这么回事,惹得哄堂大笑。人们抢着发言,会场气氛很是活跃。争论之后,会议开得更好了。接着钱三强在会上的讲话更成了峰巅,他说,30年代他和于光远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同班同学,他们的导师周培源对学生的功课要求特别严格,用各种方法考查学生的能力,比较差的就要留级或被劝转系、转校,毕业之时,全班学生只能留下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可是1936年升四年级时,班里忽然多了一个于光远,几个同学议论要盯着这位同学,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四年级一个学期还没读完,大家都服气了,公认他是博学多才的冠军。后来周培源受邀到美国讲学,还为这个班的学生争取到一个去法国居里夫人实验室读研究生的名额。大家议论不用考试了,非于光远莫属。但是于光远放弃了这一难得的机会,“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就去南方工作了。结果是钱三强得到机会,去法国深造。钱三强对此很感动,出国前专门打听光远的行踪,终于找到了他,原来光远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已参加中共,是半公开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两个总队长之一。分别时,于光远在钱三强的纪念册上写下一段气壮山河的话,大意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我的选择首先是抗日救亡,发动群众,不懈斗争,建立一个民主的劳动人民的国家。你出国深造也是多难的祖国的需要。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奋斗,十年后再来合作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这次会议光远同志在是非面前,不畏权威,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遗憾始终没有和光远同志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但两个人都在北京,见面的机缘还是多的。1982年中央农研室及国务院农研中心先后成立,两块牌子,其实是一个单位,主任杜润生是位老专家,曾被贬为“小脚女人”,却在他的统一领导下,迈开了农村改革的步伐。我在中南海工作,又在杜老领导的机关里挂了个副职,逐渐把重点转移到了“九号院”来。

记不清是哪一天竟在院子里突然碰见了于光远。我问:“您怎么来了?”他说,杜老找我们开

了个小型座谈会。又对我说，想去看看万里同志，有几个问题想听听他的意见。听说万里同志有点耳背，我的耳朵也有点背，最好你能陪我一起去，听不清楚的，可以请你顺便当半个翻译。我说，好啊，我去问一下，就给你打电话。我把这件事给万里同志汇报后，他也说好啊，非常欢迎。就让秘书安排在第二天上午10点会见。第二天快到时间，我在中南海西大门口等他，他看见我打招呼，便把车停下来，我拿着工作证给门卫说了一下，就坐了他的车一起到了勤政殿那边。这一次他们谈得很愉快，很融洽，两个人距离很近，互相讲话基本上都可以听到，我这半个翻译实际上真只要半个就够了。后来有一段日子光远同志没有再来电话，万里同志和我谈起别的事情，忽然问到：“你最近见于光远没有？他还是那么健谈，问题那么多吗？问他什么时候有空，再来说说啊。”当天我就给光远同志打电话，还没有说什么事，他就说，这一阵身体不好，住了几天医院，正想打电话告诉你，我最近做了两副耳机，我自己戴一副，还准备送万里同志一副，可以对谈。两天后到了万里同志家里。万里一见便说，我前一段已经找了副耳机，戴起来很费事，还是听不清，我就不戴了。承您盛情，送来专为我做的礼物，我当然要再试一试。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俩一切顺利！万里是个高个子，做了个滑稽的姿势，又伸出右臂说：“医生请！”光远掏出眼镜戴上，才把带来的耳机取出试着装好，又把一根不长的线接到耳机上，假装严肃地说：“医生认为，现在可以开始。”屋里好几个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果然戴了耳机要比不戴好。

当时社会上对雇工问题争议很大，他们对此交换了一些看法，互相觉得对问题的认识有帮助，但是情况很复杂，还要进一步研究。以后光远还去过万里同志那里，也是我陪着去的。这种双方满意的交流形式进行

了好几次，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继续下去，两位老人耳朵都背，年过九十，不断加重，更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自此之后我和光远同志更熟悉了，思想交流更广泛而深入了。

会议多是新中国的传统。改革开放年代又兴起了研讨会之风，从北京刮向全国。1980年我来北京工作，几年之后，被邀请到有关研讨会的次数明显增多，有时就遇到光远同志，听到他一些内容厚实，对人很有启发的专题讲话。90年代我开始比较自觉地重视这方面的机遇，但是比较之下，我认为向他学习最好的方式还是登门拜访，这种方式简便、灵活，次数几乎没有限制，受启示、教育最多也最深。

我知道他住在史家胡同，却不清楚具体什么地方。记不清哪一年什么时间了，有个星期天到东单煤渣胡同人民日报社宿舍看望一位老友，又经他指点，才找到史家胡同于家。这是座老旧的大宅门，有两三家人居住，已不那么气派了，但院子还是比较宽敞。光远同志住北屋，好像改装过一下，有三四十平方米，突出的印象是全屋几乎都是书，三个门都不显眼，一个通院子，后墙角一个通后面几间卧室，大窗户靠墙边还有个门，里面还有个卫生间。其他三面靠墙的地方都摆满了书架。很多书架顶上也重重叠叠摆着书，一直顶到天花板。屋内有套大沙发，他的办公桌不小，靠窗户这边，光线好，对面还有把靠椅，桌面上除了电话机、订书机，还是书，有三四本摆着的，也有单本的，翻着展开放的。我进屋时，他正在转椅上看书，见了我，便说：“这几天又行动不



于光远(前排中)和朱厚泽(后排左四)、吴象(后排左五)等友人在一起

大方便,请坐这里对面说话,又近又好,我还能听得清。”里屋孟大姐出来,给我们弄了两杯茶,寒暄了几句又回里屋去了。我们开始谈话,这种谈话随兴所至,漫无边际,海阔天空。有时向他请教专门问题,有时就是闲聊,时不时会有一件事、一句话使我有所领悟,受益不浅。

90年代和新世纪初,有好几年每隔一两个月或更长一点,我们几乎必有一次这样的谈话。有次我不知为什么忽然问他,“百科全书式”这个词是怎么出来的?他不以为忤,笑着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也不赞成,我曾写过本小册子,叫《九十感言》,还没有送你,今天你来了,正好送你一本,请你批评指正。”说着拉开抽屉取出书写了两行字送我,对我说:“这本书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不必回答,和我根本没有关系。但我实际上是表态了。”他翻开书指着一页,写的是:“我这个人看问题一般来说还算敏锐,不笨,但在学术研究工作中,不论旧学、新学,底子都不算深厚,我自己清楚。学识浅,常识比较多。”这几句话使我受到震动,领悟到光远同志待人宽厚,处世实事求是,两方面互相结合都是性格使然,出于真心实意,参加革命后重视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改善提高,便到了一个比一般人更高的思想境界。

还有一次,我进入他的办公室兼客厅,他的秘书胡冀燕等几个都在,大家谈兴正浓。我就问什么事情这么高兴,胡冀燕说,那个提纲终于找到了。当时正值“六四”风波之后,社会上对改革开放议论很多,人们的思想也很迷茫,大家都盼望着邓小平对改革开放能有一个肯定。胡冀燕指着对面墙那些书架对我说,就是那架顶上高高的一摞书里用张报纸包的书里,我站在凳子上几乎还够不着。于光远笑着说,我要指不出这摞书,你也找不到。他高兴地拉开抽屉,取出那包东西,打开报纸,把书中夹着的三页纸给我看,原来就是三中全会邓小平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纲,用铅笔写的,是邓小平的笔迹,一共三页,列出了七个方面的问题,包括: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光远对我解释说,那是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期间,党的主席华国锋请邓小平在工作会议结束、正式召开三中全会之前,做一个讲话。按惯例,这种讲话

稿都是由那位党内第一支笔起草。那时,党内思想非常复杂,邓还专门找他谈了一次,应该写些什么。结果,当收到送来的讲话草稿,邓仔细看了几遍,想来想去还是只好放弃。于是,下决心否定这篇稿子,自己找了几张纸,用铅笔写了一个类似提纲的东西,然后马上打电话找胡耀邦和于光远来家里商量。邓小平说,写好的这个稿子不能不否定,要另写一篇,请你们组织几个人按我这几条写一个初稿,再来研究修改。这件事当时并没有公开。后来,时过境迁,不知怎么传来传去,有些人还以为是那个笔杆子写的。光远同志找到邓的这篇重要讲话提纲,使我们对于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来龙去脉,对于伟大中国崛起复兴之路怎么迈开第一步,怎么才能平稳、更矫健,有极重要的意义。

光远同志不仅仅是大智慧、大学问的人,更是一个有趣的、好玩的人,我虽已年迈多病记忆力衰退,但想到和光远同志在一起经历的种种,那个鲜活的形象就历历在目,令人无法忘怀。从邓小平讲不要问姓社姓资,要抓经济发展;从皇甫平发表三篇文章,一直到后来邓小平南巡讲话,光远同志从来都是坚定地表示“不改革开放不行”。后来他写的东西少了,但讲的仍然很多,他对形势是乐观的,他说改革开放以后,最大部分的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不改革没有出路,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更鼓励别人发表各种各样的见解。1984年,中央整党办公室约请我写了一篇关于农村改革的通俗讲话,他看到了,曾写过推荐文章。后来出单行本时,就成为这个小册子的序言。90年代我写《中国农村改革实录》,他为我写了篇很长的序,论述中国农村各个时期的发展,这是他研究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过程中一篇重要的文章。还有我那本《好人一生不平安》,光远同志作的序言,开头就说:“我很少为别人的书作序,因为认为写序往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先看明白这是一本怎样的书,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年龄变老,愈发没有这个气力,遇到别人提出写序的事情,常常只有婉言谢绝了。然而,当前些天吴象来电话,提出希望我为他的《好人一生不平安》作序的想法时,因为我们是多年相识的老朋友,没犹豫就答应了下来。”这一段话,我看到后既惭愧不安,又感激莫名。他长我六岁,又是著名学者,我一直尊他为老师、前辈。交往

一直非常愉快。当然也想和他结识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但朋友这两个字始终没有出口,更不会见诸文字。所以见到这一段话,内心的高兴、兴奋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有些出版社往往恳请光远同志编一些有标志性的书,他也忘不了我,组织或帮助我参加。他重视文化学术的发展,寄希望于比他年龄小的人。像对待我一样,光远同志事实上为不少人的著作做过序,只是晚年例外。他就是这样对提携后人勤笔耕耘,不遗余力。

记不清哪一年了,于老搬了家,史家胡同那间大的仍给他留作书库。闻讯后,我和老伴到他新居探望,他已不能走路,可是他仍然像以往一样,总是豪情满怀。他对我说,我仍然可以坐轮椅飞天下。现在回忆起来,在他坐轮椅之后,我们还有过三次难忘的共同出访的经历,光远同志确实也做到了“坐着轮椅飞天下”。

90年代末,光远同志,后来杜老、厚泽同志我们几个一同去了广东参加一个研讨会。会后听说南海县群众性电脑应用有新的发展,他与厚泽同志去了南海。他们两个是老干部中运用电

(上接92页)观点范畴的一类论说,实质上是可以归入“体制模式说”的,因为这一结论有强大的内在历史逻辑力量。

我们从俄罗斯学界的研究联系到了中国学界的情况,从俄国学者梅杜舍夫斯基的“体制模式说”,联系到了中国学者的“体制模式说”,这似乎扯得远了一些,但这样联系起来,会让中国读者感到更贴近我们自己,更容易理解一些。

三

上面我们集中谈到的有关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体制模式说”,也就是梅杜舍夫斯基从分析历史和信息认知理论出发,对苏联崩溃原因所做的解释。这实际上是俄罗斯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苏联解体原因所作的第八种理论解释。再加上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苏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提出的“三垄断说”——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也就是说,是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垄断权力

脑的先锋。在此前后,光远同志已坐上了轮椅。我们一起上了黄山市,他对开发山区、开发太平湖与黄山结合起来的观点十分赞同,给省市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后来,我们又一起去了四川,他给农村出现的农家乐出主意。到成都郊区参观时,他对打麻将发表了许多有意思的见解。我们去看都江堰的路上,他忽然讲起了延安。当时,我们十几个人坐在一个中巴上,胡冀燕带头唱起了歌,这些八九十岁的老头子像年轻人一样唱起了黄河大合唱……还有很多很多,一一说起,像是总也说不完。

光远同志以98岁高龄,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我有幸在晚年结识了他,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悼念老友,诌了八句,不讲韵律,以此来表达我对光远同志怀念之情。

博学高才知古今,谦恭行事从无矜。
解放思想参与者,时代变迁尽寸心。
有幸识君虽已晚,良多受益暖如春。
悲情难断送于老,此后叹无鸣铎音。 ■

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行政特权制度,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灭亡。这是俄罗斯对苏联解体原因所作的第九种理论解释。这第九种解释,实质上与梅杜舍夫斯基的“体制模式说”异曲而同工,只是更集中着眼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方面,并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

这样看来,综合俄罗斯学术界、舆论界关于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解释,总共提出了上述9种理论或9种观点,而其最大的概括、最精的提炼、最高的升华,具有最大覆盖面的结论,是“体制模式说”。因为正是这一原因论解说,不仅涵括了“帝国论”、“社会经济论”、“现代化危机论”,而且覆盖了久加诺夫的“三垄断说”和“综合论”的各个因素,甚至在筛除其情绪因素、信息杂质和不实因素前提下,也包括了“阴谋论”中某些合理的“戈尔巴乔夫因素”等。可见“体制模式说”,是解说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各种理论观点的提高、深化和升华的集大成者。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吴江的“意外遭遇”

○ 徐庆全

2012年11月13日,吴江去世。转眼间就一周年了。

关注这位老人,并不是因为我与他有多么熟悉,其实我和他只有几面之缘——我因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感兴趣曾经去采访过他。我对他参与的或者主动推动的那一段历史作为充满了敬意。他是开思想解放先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大讨论的主要的推动者之一。吴江老的这些功绩,已镌刻在历史中。

而被历史所忽略的,或者说不被世人所知道的,还有另外一面:此后,吴江的人生却有了“意外遭遇”,他竟然不得不离开中共中央党校。此后,吴江的命运依然阴影笼罩,仿佛掉进了类似奇门遁甲的阵势。

“意外遭遇”这个词,是吴江老在他的回忆录中用的词,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常常这样用。我曾经纠正说,他的遭遇不是“意外”的,是意料之中的;吴老说:现在看来应该是这样的,但在当年,我的确觉得是“意外”的。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中的“把柄”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理论工作务虚会成了一些人攻击的目标。社会上盛传三中全会犯了右倾修正主义的错误,有人公然说今后必须继续反右。有些地方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人认为批判“凡是”就是同中央“分道扬镳”,个别部门甚至发生反攻倒算行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因此中断了。

1979年下半年,务虚会结束后不久,邓小平赴天津、山东、上海等地考察。他讲了几次话,从思想路线讲到组织路线,重新提出要警惕“两个凡是”。他说:“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

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孔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因而他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形势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估计:“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至此,真理标准讨论所解决的问题,仅限于:第一,解决了全国范围“大的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全国范围一切方面的问题;第二,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大量问题。邓小平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75-177页)

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毕竟是一个重大信息。

吴江得到一份邓小平讲话的非正式记录。他立刻将这份记录稿送给胡耀邦,请他考虑是否在《理论动态》写一篇东西,宣传邓小平讲话,继续推动已经中断了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胡耀邦看完记录后给吴江电话,要他先到中宣部跟少数人讲一讲关于补课的内容,以个人的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让大家议一议。

在中宣部的小范围的会上,吴江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对当时面临的情况和补课的内容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次补课或者说继续讨论,重点应当齐心协力顺题,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解放思想,旗帜鲜明,端正思想路线首先要端正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思想路线。领导的责任在于通过讨论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方针上来。他提出,根据前一段的经济和目前的情况,这次的补课在思想上始终要抓住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不能把“文化

大革命”的错误,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思想体系记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下,要区别真“高举”和假“高举”、真“坚持”和假“坚持”;另一个,就是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想及帮派组织路线并肃清其流毒,“两个凡是”就是极“左”思想及帮派路线流毒的集中表现。

此后,胡耀邦又要求吴江在党校向全体学员讲一讲,吴江照办了。如果说在中宣部是小范围的“讲一讲”的话,在中央党校全体学员中就是大范围的“讲一讲”了。从小范围到大范围的“讲一讲”,不经意间透露出的是一种政治智慧——吴江当然心领神会。大范围的“讲一讲”后,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开始推动起来了。

首先是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及秘书长刘澜涛找到吴江,说中央统战部正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上暴露出来的糊涂观念和“左”的东西很不少,想请他在会上就真理标准问题讲一讲,帮助大家统一思想。

报告由刘澜涛亲自主持,会议印发了吴江的讲话全文,并开了两天小组讨论会,讨论“简报”也送给吴江一份。吴江留心翻阅这些“简报”,发觉多数同志赞成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认为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统战工作大有裨益,目前统战工作的阻力主要是“左”。但也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有一位省委统战部长说:“这样重大的讨论,既然在中央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中央没有正式文件或作正式传达,而由中央党校的副教育长出来讲呢?我们那里,省委从来没有传达过,也没有讨论过。这次回去,说补课重要,如果党委不动,我们统战部门补课是补不起来的。”这个反映很重要,说明虽然三中全会公报鲜明地对真理标准讨论作了“传达”,但有的省委却按兵不动。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这场讨论的方式的特殊性。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三分之一”的问题。在吴江原来收到的小平讲话记录稿中,有这样几句话:“利用毛主席的错误,坚持‘两个凡是’,即换一个面孔,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样的人,个别单位竟达到三分之一。这是全国的缩



吴江2011年4月在翠湖

影。”吴江在演讲时声明,这是根据别人的记录稿,不是原文。会议印发的讲话稿,也特意写上了吴江的声明。

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简报”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个别单位达到三分之一”的估计是适当的,党内外思想僵化半僵化转不过弯来的人的确相当多;另一种意见则反对“三分之一”的估计,他们撇开个别单位这个词,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坚持“两个凡是”,这还了得!

吴江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向会议作解释。其实,他就是有机会解释也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他的这次演讲,已经被邓力群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编写成会议简报送到了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了。而且,后来吴江才知道,简报整理者把前一种意见略去,只把后一种意见写上,听说小平同志看了有些不悦。不管怎样,能够引起邓小平的“不悦”,编写会议简报向上反映的目的总算达到了。后来,吴江利用请邓力群向党校学员作报告时的机会,专门向邓力群说明简报整理者断章取义的事情,邓却沉默不语。

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同时,中央组织部也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吴江又被部长宋任穷邀请于9月6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讲同一个问题,讲话内容基本上与上次相同,不过突出了这次小平同志所说的“用人”问题,“现在还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

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登了这两次报告的

要点,题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要解决领导思想问题,补课要落到实处》。《内部参考》发至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吴江的报告扩大了邓小平讲话的影响,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从吴江在“补课”中被人抓住“把柄”这一事实来看,对于是否进行真理标准的“补课”,依然存在着争论。争论不上台面,“小动作”就会不断出现——这也是中国政坛特有的现象。

“宣传陈云经济思想”风波

1980年10月,《陈云文稿》出版。按照通常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选一概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辑。但《陈云文稿》却由邓力群主持下的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持编辑。

针对当时选择改革方向的需要,《陈云文稿》收集了陈云从1956年到1962年的文章和讲话。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又遭到严重挫折。陈云根据当时变化了的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阐述了许多重要的经济观点,提出了许多切实的主张,包括必须改进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建议。这些建议,不是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市场调节;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搞一些小自由。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来源。邓力群等人认为,这对于即将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定是可贵的指导思想。

按照通常惯例,中央领导人的文集出版,报刊都要发表专论,号召全党学习。有关单位也要请人作学习辅导报告。因此,中央党校校务委员、第一副教育长兼理论室主任吴江,请邓力群给党校学员作辅导报告。其所以请邓力群作报告,不仅因为他是《陈云文稿》的编辑者,而且他在“文革”前帮助陈云做过一些文字工作,为陈云起草过一些讲话稿。

邓力群作了认真准备。他讲的题目是《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在中央党校一共讲了四次,听讲的学员是在党校学习的中高级干部。邓力群口才好,逻辑清晰,能吸引听众。但出乎吴江意料之外的是,学员听了这四次讲演之后议

论纷纷,意见很大。事后,校方召开座谈会,了解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听众对经济工作本身的意见。这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中高级干部,特别关心经济体制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统购统销,指令性计划,把经济越搞越死。报告说,“调整是关键”,“改革服从调整”,改革怎么能服从调整呢?农民自发起来的改革,你能拿“调整”把它挡回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怪圈,20多年了,还是在这个怪圈里折腾。总之,大家都觉得我们的经济体制有问题,但不知问题在哪里,报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正在拨乱反正,大家对神化个人很反感。邓力群在报告中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听众说,这把陈云同志提得过高了。邓力群还在报告中说,陈云同志“政治强,党性好,道德品质高”。听众说,这样评论党的高级领导人不符合报告人的身份。听众还不满意报告人在讲陈云经济思想时,常把自己摆进去,说自己跟陈云如何如何。

吴江向学员作了些解释,以缓和学员的情绪。他没有向副校长胡耀邦报告。但是,听报告的学员中有人向中央作了反映。这在中央党校是常有的事。学员中的“通天人物”很多。向中央反映情况也是学员的权利。

不久,邓力群说党校有人(首先是指吴江)向中央写信批评他。吴江没有介意。吴江只是认为“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句话确有些不妥,提议删去,以免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已经尽在这本书了。修改后讲稿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邓力群同意了。

2006年,在邓力群出版的回忆录中,有另外一种说法:“吴江在他那本《十年的路》里说我在讲话中说:陈云掌握了经济规律,毛泽东不懂经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吴江说,他建议我在整理讲话记录稿时把这个意思删掉。吴江还说,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把有关的意思删掉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给我提出过那样的意见,我也没有删掉我认为陈云同志经济搞得好的那些话。”

为此,我特意就此向吴江讨教。吴江再次认

真地回忆了整个事件。他说：

我当时是以党校管理教学的副教育长身份邀请邓力群到党校来讲“陈云文稿”的，他讲了四次，我在讲台上全程陪同。事后又是由我提议他的书稿（题为《向陈云学习做经济工作》）归党校出版社出版。对于陈云同志建国以来所做的经济工作，我有好印象，表现之一是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斗胆向中央建议让刚出来工作的陈云同志负责领导经济工作（那时党已将经济工作列为中心），此建议载会议简报第169号上。不久，中央果然成立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1980年10月《陈云文稿》出版了。当时我虽然对于《陈云文稿》不是照例由文献研究室编印而是由书记处研究室负责编印这件事有些不解，但出此书我还是比较重视的，所以特地请邓力群到党校来讲一讲。

没有想到的是，邓力群的讲话在党员学员（特别是一些老同志）中引起颇大的反映，我在《十年的路》一书中所写的还是有保留的，学员的反映除提出陈云的某些思想已不适应当前改革的形势外，主要是责怪邓力群过于突出陈云个人，如他在报告中说“陈云同志熟读资本论，毛主席没有读过资本论”，尤其是他说“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两句话，学员很不满。而邓力群在书中却是说“吴江在《十年的路》里说我在讲话中说陈云同志掌握了经济规律，毛泽东不懂经济”，这并非我书中的话。他把自己公开讲过的话作了删改，这不大好吧？当时，我向邓力群建议他的书在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时候，同时特别建议他把“毛泽东同志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这两句话删掉，他当时明明白白是表示同意的，否则，他的书也不可能在党校出版社出版。

至于邓力群说邓小平批评他不宜宣传“学习陈云思想”，这事我在他的书中才得知的。邓小平何以知道此事，我想很可能是当时学员中有人向上反映，学员中“通天”的人物很多。而我在当时听到学员对他讲话的反映时，只是在学员中为他的讲话习惯作些了解释，并未向中央什么人反映这件事，也没有向负责党校工作的胡耀邦报告。

这件事虽然与宣传《陈云文稿》有关，但并没

有涉及陈云，不同的看法只是在吴江和邓力群之间存在，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则被人为地涉及陈云。

两篇文章惹祸

所谓两篇文章，一是《理论动态》282期发表的《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1981年6月）；一是《理论动态》269期发表的《跳出圈子想问题》。这两篇文章对于编者和作者来说，都没有想到有什么联系，却有人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吴江和《理论动态》杂志的“反对陈云”的理由。

《谨慎谦虚和实干精神》是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孙长江写的。文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的事业需要创新精神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做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

这篇文章是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并兼副校长冯文彬建议的，时间在1981年二三月间。据冯文彬说：1980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批评华国锋并将他的辞职要求提交中央全会讨论，有人对此抱不平，因此流传一种说法：华国锋为人厚道谦虚，做事也比较谨慎；而新领导人胡耀邦说话随便，不够谨慎，很可能把事情搞糟。冯文彬说：这种说法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况，也可能别有用心。书记处议论了这个问题。冯文彬特别说：陈云的秘书王某也认为需要写文章批驳这种议论。冯文彬并提出要求：文章要说明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谦虚谨慎，现在我们的事业需要一种创新和实干精神，那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怕创新的消极情绪和做法，不是什么真正的谨慎谦虚。

吴江开始本打算让阮×写，后考虑阮笔锋太凌厉，就由笔锋较柔的孙长江写。孙写成后胡耀邦很满意，吴江也说不错。但是，过几天上面传来消息，说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质问胡耀邦：“耀邦同志，我是支持你的，听说你那里有人写文章批评我。”胡耀邦急忙否认：“这不可能。”过去《理论动态》发表重要文章，《人民日报》都要转载。这次人民日报接到电话：“这篇文章是针对陈云同志的，不能登！”原来，有一个人把这篇文章送给胡乔木、邓力群，邓力群送给了陈云，“文章针对陈

“云”的罪名由此产生。吴江、孙长江、阮×受到中组部的调查。

吴江从外地出差回来后找中组部部长宋任穷，问调查他是什么事，还对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作了解释。宋任穷说，调查是正常的干部考察，与文章的事无关。但他从抽屉里拿出《理论动态》269期的文章《跳出圈子想问题》，指出其中的一段文字让吴江看：

例如，曾经行之有效的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安排，在当时国际国内环境下，的确是比较适宜的，它的许多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但有的同志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把它当作模式，言必称

“一五”，行必法“一五”，这样就把当时的成功经验，变成了妨碍探讨新问题的圈子。

吴江恍然大悟：原来《理论动态》269期上的这段文字，被用来证明《理论动态》第282期的文章确有“不可告人的针对性”，确实是“不可宽恕的渎神”行为！

《跳出圈子想问题》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胡耀邦出的，稿件同胡耀邦审定，除了《理论动态》上发表以外，还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很明显，胡耀邦是反对回到50年代的，而且坚定地站在这场争论的前沿阵地。

对于这样的上挂下联，多年以后吴江仍然感到不可思议。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这篇文章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的评价，可以说无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何况文章开头就开宗明义的点明了文章的立意：“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作出决定时固然要谨慎从事，但研究问题必须打破思想上僵化的状态，跳出过去的圈子即既成模式想问题。”这种立场有什么可挑剔的吗？

不过，吴江也承认：联系到当年的形势，这种过激的反应似乎也有可以理解之处。

1980年改革刚刚开始，关于如何对待50年



吴江与夫人邱晴2012年春节留影

代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的争论也随之开始了。当年，一种观点认为，50年代的经济是很成功的，只是大跃进以后搞糟了，现在应当回过头去采取那时的经验。计划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计划经济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执行上有问题，主要是公有制经济集中的太多太死，没有适当的市场调节。所以，现在需要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以便把经济搞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50年代我们走的是苏联的路，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50年代的成功经验不否定，但不能把那时的经验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而

自束手脚，应当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

吴江感叹说：两种不同的观点的对立，很自然地形成了两股不同的势力；相互之间的较量，会使人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触动地雷，或者在毫不相干的问题上会被一个方面认为有意反对自己。这两篇文章所惹的祸，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不过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1982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任命王震为校长。据邓力群回忆，这是他提名的。开始胡耀邦觉得不合适，建议找一位年轻一点的去，他提名项南。陈云坚决反对。开始王震不愿去，陈云亲自找王震谈话，并让他把中央党校办成“黄埔军校”，王震才走马上任。王震上任前，有人给吴江打电话说：“书记处任命王震当晚，邓力群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来者不善，你可得有思想准备啊！”

王震一到中央党校，直接命令教育长宋振庭给中组部打电话，通知将吴江、孙长江、阮×从党校调出。这三人正是《理论动态》282期事件以后进行特别调查的对象（宋任穷说是“正常考察干部”）。与此同时，胡乔木在书记处会上提出调蒋南翔任党校第一副校长（实际是顶替冯文彬）。

6月26日,王震在党校部、室主任会上宣布三件事:1.蒋南翔要来担任第一副校长;2.吴江要调离党校,属正常调动;孙长江不进领导班子;3.阮×这个造反派头头要清除,清除后向中央写个报告。他说:“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但我要和这个造反派头头较量较量。”

吴江是党校理论室主任,孙长江、阮×是副主任。对阮×问题胡耀邦主动承担责任,以保护冯文彬、吴江。他在有关阮×的调查材料上批了两句话:“阮×当编辑是我的主意,文彬、吴江没有责任。”

紧接着,吴江在“文革”时期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的说法开始飞短流长。王震在党校的讲话中确认了这一说法:“吴江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吴江听后,虽然觉得事情太离谱,但很纳闷这种流言是如何出来的。到这年9月“十二大”会议期间,冯文彬突然找到吴江说:“你究竟是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的组长?这个说法很普遍,邓力群对此默不表态,因此连耀邦也将信将疑。你要加以说明,是则是,不是即不是。”这样,才引起吴江的重视,向中央书记处写信说明:我是比邓力群更早揪出来的“黑帮”,哪有资格当邓力群专案组的组长?这封信引起了邓力群的回应,两人这场公案各自都有陈述,至今还被人常常提起。

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以后,他们反过来再查《理论动态》282期文章的写作意图,仍无所得。他们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要把理论室的盖子彻底揭开。”最后虽然没有查出什么结果,王震还是下令解散了理论室。

吴江在“十二大”小组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连夜训斥总编辑秦川:“《人民日报》竟敢发表吴江的文章,你们还要不要脑袋?”吴江感到了事态的严峻。后回到党校,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教育长宋振庭被撤销职务,他则留任党校。吴江不想也不能再在看不见的“阵中”继续陷下去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事已如此,留任何益?留任势将遭遇不可测的命运。”于是,他立即写信给胡耀邦提出辞职。

1982年9月24日,王震到党校开紧急会议,说是有要事传达。他发表讲话说:“吴、孙、阮三个人,他们在三中全会前后写过一些正面文章,但他们的表现不好,在党校工作不合适。先生不

好,学生也教不好。”“看人要看本质,不能看现象,这三个人以调出党校为宜。”“他们写信批邓力群,可是邓力群还为他们说好话。邓力群是正派人。胡乔木、邓力群是经过考验的,还得依靠他们,不能依靠吴江等人。”参加会议的冯文彬向胡耀邦汇报王震这次讲话内容。胡耀邦在电话记录上批道:“对吴、孙、阮等同志的问题要由党的组织部门调查核实后作出实事求是的处理,不能个人说了算!”

1982年10月16日,吴江调离党校时,胡耀邦亲自找他谈话,组织部长宋任穷也在座。吴江再一次提到《理论动态》282期那篇文章的事。胡耀邦说:

你们可以说清楚这件事,文章让大家看!我看过了这篇文章,绝不是针对陈云同志的,没有那回事。我不相信《理论动态》的同志会反对陈云同志。小平后来也看了这篇文章,他并没有表态。“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和中间,这种事可不少,从字里行间找问题,从文字上进行猜测,教训可不少啊!我们不能再干这种事。不能随便立案。

遥想三四年前,邓小平认为《理论动态》的编辑“政治上强”,与现在“文德不好,不堪信任”的评语相对照,历史就是这样的悖论!

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社会转型的十多年间,伴随着高层意识形态导向的忽左忽右,思想理论界的知识分子时常会在这种摇摆中遭遇“意外”。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1年,批判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反自由化运动开场。从此,真理标准讨论夭折,思想解放运动终止,代之以反自由化运动。1982年之后,反自由化追根溯源,追到理论务虚会,称“理论务虚会是自由化之源”。反对“两个凡是”的、参加理论务虚会而又不转变立场的、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活跃一时的人物,被称作“自由化分子”,纷纷受到清算。

吴江“意外遭遇”是与中国社会转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意外”其实并不意外。

吴江老人已经走了一年了,我常常能想起老人那淡定的笑容,常常能想起挂在客厅的那副对联:“俯仰处无愧天地;褒贬时自有春秋。”■

(责任编辑 黄 钟)

女儿心目中的饶漱石

○ 陆兰沁

我1938年出生在巴黎,当时父亲和母亲陆璀被党派到法国工作。而后不久,他们又被派到美国工作,只得将我寄养在我出生的医院的附属婴儿所里,并由中共巴黎支部的同志临时加以照顾。1939年,父母从美国奉调回国参加抗战时,本想取道巴黎把我一同带回,不料动身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上交通中断,他们只得改道回国,而我不得不一直留在了法国。我们一家人也就这样天各一方近十年之久。

直到1947年,我母亲又被派往巴黎的国际民主妇联工作,我们母女才得以相见。1949年,母亲离开国际民主妇联,将我带回中国。那年我11岁。当年7月1日到达满洲里。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我们7月7日到达北京,7月中旬到达刚解放不久的上海。

到达上海那天,我们母女俩从火车站被直接接到父亲办公的大楼。记得当我们走进办公室时,父亲正在和几个人商谈事情。见我们进来,大家都高兴地站起来。我因见过父亲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他。他面带微笑从办公桌后面走了出来。他中等个子,身体微胖,一头浓浓的黑发,双眸大而炯炯有神,嘴上留着的胡须为他增添了不少威严和帅气。我胆怯地站在母亲旁边看着他越来越近。突然,也许是本能吧,我向前了一步,踮起脚,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我的这个突如其来的“洋礼节”使父亲不觉一怔,但很快他和在场的其他人一起会心地笑了起来。这情这景仍历历在目,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据母亲后来对我说,她把我这个独生女儿带回到父亲身边的那些日子,是她见过的我父亲心情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当时,我一句汉语都不会讲,父女沟通,只能靠母亲做翻译。当母亲不在跟前时,不管我和他用法文讲什么,他总是微笑着回答:“好好好。”后来我发现他不仅对我说“好好

好”,而且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会常说“好”、“好好”,所以我曾多次开玩笑地叫他“好好爸爸”,而他总是以笑容和慈祥的眼神回应我。人生常常如此,对于父母的爱,做儿女的,往往感觉很迟钝;而等到很久以后体会到了这份爱并想要回报的时候,才发现为时已晚,已无法报答。我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女儿!如今想来,和父亲那为数不多的相聚时光,竟成了我一生难以表怀的珍贵记忆!

渐渐的我发现,父亲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对己对人要求都很严格。平时,他话不多,不苟言笑。虽然他和人说话时语调不高,文质彬彬,也没有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但我总感受到在他身上有一种威严,也总能感觉到大家对他很尊重,所以当时的我对他还真有点敬而畏之。

我回来后不久,他就开始抓紧对我的教育。他和母亲在一个练习本上工工整整地给我写了四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作为练习汉语的字帖。母亲手把手教我一笔一画地写,父亲抽空检查我的作业,他们边检查边给我解释每个句子的意思。就这样,我边接受父母的爱国爱党的启蒙教育边学习汉语,这四句话便成了我最早会写会念并能理解的汉语句子。我虽然在法国学校已念到初中,但由于不懂汉语,回国后不能立即上学,他们就托人在机关里找到了一位懂法语的同志——秦老师,给我上汉语补习课。从此父亲又有新规定:凡是我学过的汉语口语,都要在日常生活中练习着说,不许我再用法语讲,也不许母亲再给我做翻译。在他这样严格的要求下,紧张的学习使我落下了头疼的毛病,但我的汉语确实有了明显的进步,很快我就插进了华东保育院小学部5年级上学。

进入学校后,我高兴地穿上了和同学们一样

的统一发的服装,开始过集体的生活,平时住校,周末才回家,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更少了。每次回家,总看到他在伏案工作、看书,很少休息。他似乎没有时间休息,也不会休息。有时看到母亲硬拉他才去散散步,偶然也见过他打打台球,但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个人娱乐爱好。他生活简朴、从没有因为生活上的事向组织提出要求,组织上怎么安排他都说“好”。当时,我们在上海的励志社住的那个套间条件很一般,而且在楼里位置比较靠后面,但作为华东局一把手的他,却住得心安理得。据母亲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巴黎工作时,父亲也是把正规的卧室让给其他同志住,而他们自己却住在一个很不方便的近乎是过道的空间里。

刚解放时,因为实行供给制,父亲要求大家办事都要按规定按制度办,不能破例,不能搞特殊化。他对自己严格、对母亲、特别对我更是如此。他曾担心我长期在国外生活,可能养成了娇生惯养的坏毛病,总是经常对我说:“新中国刚刚建立,人民生活还很艰苦,我们革命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艰苦朴素;你作为一名干部子女,生活一定要节俭,不要搞特殊,要注意影响”等等。实际上,我在法国时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里的生活也很动荡艰难,我并不娇气,但我知道父亲的教导是对的。住校期间念书之外,我学会了缝被、补袜子、补衣服、织毛衣等生活技能,努力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后来,父亲还把他在战争年代行军打仗时用过的马褡子送给我用,要我继承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父亲的不断教诲,促使了我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培养简朴的生活作风和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思想作风。父亲送我的马褡子是用黄绿色粗军布做的。它不但一直陪着我上了小学、中学、大学,而且“文革”期间还陪着我上了“五七”干校,参加“拉练”等活动。如今,它已成了我家的革命文物和传家宝。

父亲对母亲的要求也很严。记得我们搬到北京之后,有一次母亲用自己的津贴费给我买了几个桔子。等到晚饭后她拿出来给我吃时,父亲看见了很不高兴。他批评母亲“破坏制度”、“搞特殊”、“不注意影响”,弄得那天晚上家里气氛很紧张。花自己的钱买几个桔子吃都要受批评,这



饶漱石在颐和园

样的事放在今天,真的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作为党的重要干部,他真的是率先垂范,都有点不近人情了。

父亲从不愿意对我讲他革命的过去,怕我出去炫耀,所以过去我对他的革命经历了解很少。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从母亲那里听说一些。她特别提到父亲在“皖南事变”中表现得很坚强、勇敢,经受住了考验的事情。她告诉我,在项、袁二人不辞而别万分危急的时刻,父亲挺身而出、勇挑重担,给中央发报并与叶挺军长一起临危受命,负责指挥新四军剩余部队突围。特别令我感动敬佩的是父亲在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所表达的决心“我为革命牺牲,正我初衷”。

父亲是个“工作狂”。在紧张而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和在建国后为巩固人民政权、发展国民经济,他持续不断地超负荷工作,终于积劳成疾。他面部神经痉挛,眼睛周围的肌肉常常不停地跳动,他看书报和批阅文件、写东西都很困难,情绪也变得越来越烦躁。1952年初,遵从组织决定,他很不情愿地停止了工作离开上海到北京治病;而到北京后,在不少中央领导同志的好心劝说下,他又极不情愿地接受了当时时兴的苏式“睡



1952年2月,周恩来、邓颖超在西花厅与陆璀母女合影。

眠疗法”。不幸的是事后神经系统留下了些后遗症,这或许导致了他在后来的政治风暴中的一些“不正常”表现。

在父亲治病和养病期间,不少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他、关心他。由于父亲的关系,我有幸多次去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的家里。我还曾分别在朱德、粟裕、张鼎丞等人家住过不短的时间,得到过他们及其家人令人难忘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和粟裕、张鼎丞、曾山等同志比较谈得来,他们过去一起战斗过、性格相近、互相敬重、来往相对多些,各家的大人小孩也都彼此很熟。然而令我不解的是后来揭发父亲和高岗结成了“反党联盟”,而据我所知,高、饶之间除了工作关系外,二人私下没有交往。他们过去未曾一起工作、关系生疏,他们性格不同、兴趣爱好也不同,我们两家也不曾有过什么往来、都互不认识,连他们二人的秘书也都是事发后很久才相互认识的。

1952年,我随父亲来到北京后,依然住校,周末才回家。谁能想到,1954年暑假期间,我这个刚刚入团不久的初中生,在和学校其他共青团员一起高高兴兴地去公安部礼堂听中央文件传达时,才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得知“高饶反党联盟”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一直以来被大家称赞为“党性最强”、“原则性最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父亲竟然一下子变成了“阴谋家”、“野心家”、“反党分子”!

但结论是党中央、毛主席做的,在那个年代,它是不容怀疑的。我只能用给父亲扣的那顶帽子——“伪君子”来强解我所有的疑团。在社会、学校、家庭里所受到的党的教育影响下,我向党、团组织明确表态:坚决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和父亲划清界线。(然而曾令我不解的是“伪君子”一语竟然出自曾任我父亲政治秘书的艾丁同志之口。最近才得知,艾丁逝世前曾为在揭发批判“高饶反党联盟”时的政治压力下无奈说出的这个违心不实之语,和它后来成为中央文件里形容饶漱石人格的定语而痛哭流涕、悔恨不已。)

据我和母亲当时了解的情况,党中央在对父亲的“反党”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教育之后还是准备保留他的党籍的。然而,在这期间又先后冒出了扬帆、潘汉年的“内奸”问题,父亲即被认定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1955年,他被开除党籍并被捕入狱。从此,我们父女真的一刀两断,再没有见过面,也从此杳无音信。同一年,母亲也因受牵连,第一次被捕接受隔离审查(文革期间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近7年之久)。从此,背着家庭“黑锅”包袱的我,也开始不断地经受种种考验。记得文革前夕,我工作单位的一位领导曾试探式地问我:“想不想见你父亲?”我心里一怔,想这是不是组织上又一次在考验我的立场,就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想见。”“如果他想见你呢?”他追问,我坚决回答:“也不见。”这个回答确实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一直到文革后,偶然从一些材料中得知,被关押10年之久的父亲于1965年才被判刑,而后有一段时间被假释出狱。从时间上来看,正好是我被询问见不见父亲的那段时间。难道真的是他在那时提出过要见我?但那位领导已经去世,详情已无从得知。我也许就这样失去了与父亲见面的最后机会,成为终身遗憾!而令我同样遗憾和懊悔的是,文革期间,当我母亲再次被关押入狱后,在担心随时有可能再被抄家的恐惧心情下,我把自己一直保存的和父亲合影的照片,全部销毁了。

文革结束后,全国掀起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然而一位中央领导在几次讲话中都强调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为了“顾全大局”,我和母亲决定耐心等待。这期间,我爱人曾主动与我商量决定:父亲革命一生又久经磨难,一定是年老体衰之人……即使不能平反,只要他能被假释出狱,就接他回家和我们一起生活,安度晚年。我爱人那善良朴实的心使我当时非常非常感动。岂知那时父亲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公布的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材料中,我看到了在“文革”中父亲为刘少奇写的一份证明材料。从其中一条注释里,我才得知,父亲早已于1975年3月屈死狱中。一刹那,我欲哭无泪,只觉得自己那颗对父亲的亲情已几近麻木的心,一下子被一股强烈的刺骨的悲凉紧紧裹住而无法跳动,我感到窒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在那份写于1967年6月1日的证明材料里,父亲以当年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和代理党的满洲省委书记的身份,证明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也没有人因此被捕。证明里写道:“我只记得他是因为到沈阳奉天纱厂等处工人党员接头谈话,被敌人把他当作小偷而被捕的。因为敌人未得到刘的其他材料,故刘只在监狱住了十天左右即获释放。”并“即到我家”。“当时,我们对秘密工作都缺乏经验,故发生刘被捕后,我仍未立即搬家和刘释放后即到我家的事情。……”从而证明少奇同志没有叛变。这当然不会被当时的专案组采用,但却成为后来为刘少奇平反的有力证明。尽管父亲自己当年被扣的罪名就是反对刘少奇,可是他不计前嫌,即使身陷囹圄,在文革高压之下和全国上下一片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叫喊声中,也没有落井下石,仍然能够实事求是写出那样的材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党史军史工作者和一些熟识了解父亲的同志或公开或内部撰文介绍他的革命经历、对他的评价和对那场“高饶事件”和“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看法。中央正式文件里,早已将“高饶反党联盟”改称为“高饶事件”,而“饶潘扬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和扬帆也早已相继正式平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新近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21

年7月—2011年6月)》里把1955年全国党代会上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改称为“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

多年来,我母亲和我曾先后分别给党中央、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写过申诉信,大多无人理睬,但2004年6月4日,中组部一位副部长率中央纪委同志到我母亲家里答复我母亲2001年4月的申诉信时,连称“饶漱石同志”,并历数了他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及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然而,那位副部长最后还是说:“可惜,他后来附和了高岗,反对了刘少奇同志,故原来的基本结论维持不变。”实在叫人寒心和难以理解。而后来再写信,就都石沉大海了。

今年11月是我父亲的110周年诞辰。千言万语,我最想说的是:我为过去对父亲的误解伤害感到内疚,更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自豪! ■

(责任编辑 黄 钟)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192229、57733087、57192223、57733086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顾娜、高晶、牛萍萍、文馨(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安志文谈高岗

○ 杨继绳

2001年8月22日，在安志文办公室，安志文谈到高岗及其问题，谈话整理如下：

从西北到东北这一段时间我给高岗当秘书，个人关系也不错。东北土改是他主持搞的。我觉得当秘书时间长了，找李富春，希望调出来，下去搞土改。李富春把他的秘书刘家栋给高岗当秘书，我才调出来。赵家樑在高岗事件前后都给高岗当秘书，他最近还给中央写了一个东西，意在给高岗翻案。给我看了。我认为高岗的事解决不了。

高岗是反对刘少奇的。高岗反刘少奇的话，很多是来自毛主席跟他的个人谈话的内容。高岗还把这些内容跟一些高级干部私下议论。他反对刘少奇的几件事，现在看来刘没有错。如批评刘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批判的天津讲话，说刘反对山西的合作化，说刘反对开除富农党员，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毛主席个别跟高岗谈的。毛信任高岗。毛主席对高岗说，刘少奇这个人没有过社会主义关，现在要帮他，帮不过来就让他当议长（当时还没有人大）。

高把毛主席与他的谈话和一些高级干部私下议论时，这些高级干部也对高岗说了一些话。如彭德怀、陈云、林彪等。毛发现高岗到处讲。毛曾约陈云谈话。陈向毛反映了他和高岗对刘的意见，也谈了高岗和他谈话的情况。毛说你有意见当面找刘谈。还叫陈云去杭州告诉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

有一次，大区的书记都进京了，毛主席说：我将来要退到二线，一线怎么办？两个方案，一是设几个副主席，一是设总书记。这个问题没有进一步谈，实际上是试探。

大概是1953年12月下旬，毛在一个会上说：我现在到杭州去休息，一线工作谁主持？刘少奇



高 岗

说，轮流主持吧。周说，还是少奇主持。陈云也表示由少奇主持。邓也支持少奇主持。高岗说轮流主持。这次会上，毛认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虽未点名，实际上是批高岗。散会后，从会议室走出来，高岗和邓小平走在一起。高岗问：你为什么支持刘主持？邓说，这是历史形成的，还是刘主持合适。高岗也向邓说了自己轮流主持的看法。高和邓过去没有接触，就是这一次对话，后来邓揭发高岗拉他，活动他反对刘少奇。

后来，陈云揭发高岗，说高岗和他谈到将来党内设副主席时，高岗说过“你一个，我一个”。高岗反对刘的意见大家都知道。高岗也对我谈了这些看法，幸好我没传播，所以总理说我是“基本守法户”。

高岗两次自杀。一是四中全会上，通过加强

党的团结的决议,没有点名地批判了高岗,这次会上刘少奇主持会议也作了检查。毛主席没有参加。全会后,总理主持会议,揭发高岗的问题。在刚开始时,高岗把我找去,拿一个材料给我看(他的交代)。这个交代材料是他的秘书赵家樑帮他写的,其中有很多重大问题(高级干部中的私下议论)。他说:“我给中央写了这个交代,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些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林彪告诉你,刘少奇又私又贪;彭德怀说中央有两个圈圈,即周的圈圈,刘的圈圈;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事,你要慎重考虑。”过两天,在开会期间,高岗用警卫员的手枪打了一枪,警卫员当即把枪抢过来了,高自杀未遂。赵家樑叫我去,我去一看,高岗很不平静,他把那个交代材料撕得粉碎。我和赵家樑到总理办公室,总理问什么事,我说高岗开枪自杀。总理问,他手里有什么?我说,他手里有一个材料,撕掉了。总理让我们等着,他约了当时一些开会的同志,听了赵家樑的汇报。后来让习仲勋宣布对高岗实行监管。总理问,这个材料是谁写的?我说,是赵家樑写的,只有我一个人看过。

彭德怀在朝鲜打仗,高岗在东北,朝鲜战争的后勤支援是总理负责,但什么事都找总理不合适,找了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高岗就成了朝鲜战争的直接后勤保障。所以彭、高关系比较好,二人私人谈话也比较多。但要说彭和高岗结成联盟也没根据。

在揭发高岗时有人说高岗反总理,曾提出让林彪当总理。高岗不承认他反总理,他只承认反刘少奇。这其中也有这么一段事:有一次毛主席找高岗谈话,谈到政务院的去向问题,一是改成苏联那样,即部长会议主席,二是改成国务院。毛主席当时对周不满(关于五口通商的事),就问高:“如果改成国务院,你能不能当总理?”高连说“我不行”。毛问:“谁行?”高答“林彪行”。后来总理对赵家樑说:“毛主席说高岗反对我。”

高岗第二次自杀是吃安眠药。在监管期间安眠药是控制的,每天发放。但他把几天的安眠药存起来了,一次吃下,就死了。自杀前他写了交代,一直不承认他反总理。

高岗出问题时,四中全会还没开,高岗就对我说:“我犯错误,乱讲话。我希望和陈云同志谈



一次话。你帮我找一下陈云。”当时高岗曾想找主席,主席已表示不再见高,让高找刘、周谈。北满时期高是司令,陈是政委,来北京后也有一些共同的看法,所以高想找陈云谈。东北当时五书记会议(林彪、高岗、陈云、彭真、罗荣桓)只有我一个人参加记录,所以我和陈云也熟。我去陈云家,向他转述了高岗的意见,陈说可以谈。后来他们谈了,谈什么我不知道,但知道谈完话高岗回来大骂陈云。

高岗文化不高,有点“二杆子”。当时在陕北就有争议,不过陕北老百姓对他还不错。我最近去陕北,有人还问我为什么不给高岗平反,他对创造陕北根据地有贡献。刘志丹的26军,政委是杜衡,刘带部队到外围打仗,队伍被打散了,干部都是化装回来的,政委杜衡叛变,省委贾拓夫去了中央。在这种情况下,高岗把部队组织在一起,又把杨虎城的一个团策反了过来(其中有地下党)。刘志丹回来才得以重新恢复26军。陕北主要是两个人:刘志丹、谢子长。谢子长死得早,只剩刘志丹,下面就是高岗。26军后来与25军合并为15军团,刘是副军团长,高是政治部主任。他们还打了一个胜仗。但后来刘、高又被关起来了,中央到了陕北,才把他们放出来。七大以前,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是贺龙,政委是关向应。关向应生病,高岗代理。毛找高岗谈话,说,你找贺龙谈一次,说他有军阀主义倾向。高回来后发愁:贺龙是老资格,我怎能找他谈这个问题?最后他还是请贺龙到他那里去,说:老总,主席对你有点意见,让我转达一下。这是主席对你的爱护,问题就这样解

决了。七大高岗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抗战胜利后,中央派1万名干部10万大军进入东北。10万大军由林彪统率。当时由于敌强我弱,林彪的10万大军开始没有阻击住敌人。在抚顺会议上,林枫批评林彪不打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就是毛给林的电报。林把毛的电报给高岗,高岗是政治局委员。林彪当时希望高岗回延安一次向中央汇报东北的情况,还说能否请刘少奇到东北当书记。高岗说没有理由回延安。东北土地改革是高岗主持的。10万军队进东北能发展百万,与土改成功有关。高岗把干部都轰下去搞土改。东北武器不少(日本人留下的),就是没有人。土改后,农民踊跃参军,军队很快发展成100万。

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毛对高岗的信任。四平战役后,退到哈尔滨。林彪、高岗、陈云、罗荣桓四人给中央发电,要求改组东北局,建议将彭真由书记改为副书记,并建议林彪任书记。毛很快就同意了,这中间高岗起了很大作用。彭真由书记改为副书记只管哈尔滨,不久就调到中央工作委员会(平山)。当时毛派高岗到东北时就对高说:你创根据地有经验,彭在这方面经验不够。

毛对高岗的信任还表现在对高岗的安排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有高岗。当时不少人对高岗当副主席不理解,毛解释说,中央领导中南方人多,没有北方人,高岗是北方人。后来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增加了两个人:林彪和高岗。彭德怀从朝鲜回来后主持军委工作。彭有一篇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毛让彭给高岗修改。高岗文化水平低,他怎能修改?这只是表明毛对高信任。毛又让高岗当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那时的国家计委直属中央管,不归政务院管,其地位比后来的国家计委高。建国后五个大局书记调进北京任职,高岗职务最高。所以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高岗反对刘少奇,是不是想取代刘?很难说。他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主张轮流。毛把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告诉高岗。

高岗这个人生活作风不好。上下意见很大。在东北时我对组织部长张秀山说:“你当组织部长怎么不管他的生活问题?”张说:“我怎么不管?一说他就跟我吵架,说我多管闲事。你

过去是他的老秘书,你管管试试?”我找到高岗,对他说:“高主席啊,我给你提点意见,你现在这么高的地位,生活上乱七八糟,不注意行吗?”他一下子站起来,说:“你听人说了什么?造了什么谣?”我说:“高司令,你坐下。我会造你的谣吗?”等他平静下来,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件事。今天你跟我说了,我一定注意。”

他为什么自杀?他写检查开始不承认反党,过不了关。后来他还是写上了反党这句话,看来写这句话时下笔很难。他一直不承认他反党。

饶漱石不满刘少奇,他和高没有历史渊源。解放以后,饶到大连休假时才和高认识。到北京后,高岗可能把毛对刘的看法向饶讲了一些。

高岗的问题邓小平作了结论,邓认为高岗的问题不能平反。

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历史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例如,王明、陈云、康生三人从莫斯科回来时,毛说“喜从天降”。王明在历史上有错误也有功绩。1935年,他根据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主张和国民党实行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统一战线是对的,但王明带回来共产国际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本来康生和王明关系很好。后来毛批评王明后,康对毛说:王明在四中全会上的讲话是更左的冒险主义。■

(责任编辑 黄 钟)

本刊启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刊的实际情况,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将作品的数字化处理权、网络传播权、电子发行权、无线增值业务权授予本刊,同意本刊将以上权利转授予与本刊合作的第三方使用,稿件采用后即自动获得上述授权。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酬。如作者对上述处理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

我的信仰历程

○ 张泽石

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物理系

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那时，我16岁，正在四川成都私立铭贤中学高中二年级读书。暑假的一天，学校基督教团契的唱诗班正在城里参加慰问伤残抗日荣誉军人的演出，忽然听到报童高喊：“号外！号外！美国的原子弹炸得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啦！”顷刻之间，人们都涌到大街上欢呼流泪，互相拥抱；酒店的伙计把酒坛子抬到人群里，任由大家举杯痛饮，共同庆祝渴望已久的胜利！

回到学校，新学年开始，物理老师在第一节课上给大家介绍了原子弹是怎么回事，讲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的决定性贡献。接着说：“哪一天中国也有了原子弹，看谁再敢欺侮我们！”最后，老师说道：“我老啦，只盼望你们这一代，女生中能出一个中国的居里夫人，男生里能出一个中国的爱因斯坦。”物理老师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1946年夏，我满怀着老师的期盼，以物理、化学满分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那一年是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第一次在全国招生，我们重庆考区报考清华的学生超出一万人，最后只录取了200名。

好不容易赶到清华园报到

尽管我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但是要由重庆赶到北平去上学，在那个年月真是困难重重。首先是交通不便。长年战乱之后各省之间的陆路交通尚未恢复，去北平只能走水路：先坐船沿着长江出三峡，经宜昌、汉口、南京到达上海；再乘海轮经东海、黄海、渤海抵达秦皇岛，最后乘火车经过天津才能到达北平。而更麻烦的是我们班里只有我一个人考上清华，当时社会秩序混乱，

爸妈不放心年仅17岁的儿子独自远行，我自己也有些心虚胆怯。

比我大两岁的铭贤同窗好友王凤翔，他没考上清华但考取了重庆大学，我也考上重庆大学。我便跟他说：“我俩一起读重庆大学得了。”他立刻瞪大眼睛冲我吼道：“你，你！我要是考上了清华物理系，打死我也不可能放弃！你这个弟娃太没出息了！走，我送你去北平！”他果真放弃了上重庆大学，护着我在路途上辗转将近一个月，千里迢迢去了清华园！还陪着我在教务处报到、提着我的行李卷把我送进宿舍，最后又叮咛我：“别忘了物理老师的话！我们全班同学可把老师的期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见我含泪点头才放心离去。王凤翔后来去天津考进了北洋大学先修班，来信说他决心学航空，毕业后陪我一起去美国留学。

我就是这样在同班学长的关爱护送下进了我日思夜想的清华园。那已经是1946年10月初的事了。

遇上了1946年年底的“反美抗暴运动”

六十多年前的清华园真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清华园里有一流的教学设备，更有一流的教授。不只是有张东荪、周培源、吴有训、华罗庚这些当时中国物理学界、数学界的顶级大师，也有朱自清、吴晗、张奚若、费孝通这些文史哲社会学科方面的大师。梅贻琦校长更是广受国人尊崇的大教育家。

1946级物理系一共招收了2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尖子学生。大家都经历过战争的磨难，都肩负着家长和老师的厚望，都心怀着“科学救国”之志。因此，无论是在课堂上、在实验室、还是在图书馆，我都能感受到大家勤学苦练的劲头，那真是达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地步。

但是，1946年圣诞节晚上发生了一件事，犹

如一块巨石扔进平静的湖水,突然间破坏了清华校园的安宁!

那时我铭贤中学的同班同学在北平上大学的一共有四个,除我之外那三个都是女生,她们在辅仁大学学美术。其中一个姓王的大姐姐家就在北平。圣诞那天晚上我们都到了她家里过节。哪知就在我们欢度圣诞之夜时,据传几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北平东单平安电影院看完电影后,从电影院里挟持了一位北京大学的女生,拽到东单广场上给强奸了。

北京大学的师生愤怒了,怒火迅速蔓延到北平各个大学、中学!而美军顽固地拒绝将罪犯移交给中国法庭审判,更是火上浇油。于是1946年底那场“反美抗暴示威游行”爆发了。为了参加游行,学校第一次停了课,清华是当时离天安门最远的大学,我们上千名同学,冒着严寒,长途步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大家一路上高喊口号:“严惩美军罪犯!”“美国兵滚出中国去!”甚至喊出了“打倒美帝国主义!”这样激烈的口号。那天回到学校,我又累又饿,脚上还打了泡。紧跟着感冒发烧在床上躺了三天,还为耽误了功课而着急上火。

我在病床上想起了教过我英语的那些美国老师,想起了为救援中国抗战而牺牲的美国飞虎队队员。总觉得不能因为几个美国兵犯了罪就把美国对我们的好处全都抹煞掉,更不该说什么:“前门刚赶走日本虎,后门又进来了美国狼”,把美国跟日本等同起来。但我知道当时不少同学反美情绪很激烈,不会同意我的想法。

从基督教信徒变成共产主义信徒

“反美抗暴”学潮过去后,校园内逐步恢复了平静,加上期末考试临近,大家又把精力集中投入学习。我特别想给中学物理老师和王凤翔送去一个惊喜,几乎天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我在清华物理系第一学期的期考成绩获得全优。我立即把这个“开门红”喜讯送给父母和师长。

寒假来了,我极想回家过春节。但是当时内战已经烽烟四起,坐火车、汽车回家的路完全阻断。我同宿舍的室友买了飞机票回湖南长沙过年。我便写信给父亲请求汇款给我买飞成都的机票。母亲回信告诉我:正在市场上倾销的价廉物美的美国



清华大学时期照片

纺织品把国产纺织品给冲垮了,父亲跟人合办的纺织厂破产了,目前家里正急着筹集我们五兄妹下学年的学费呢,等暑假再回家吧!这个不幸消息对我打击很大,不久又接到母亲的信要我试一试向学校申请助学金。我立即把家里遭遇的变故给学校写了报告,校方找我去谈话,给了我二等助学金,勉励我安心学习,继续争取优秀成绩。当时二等助学金不仅够缴纳学杂费、伙食费,还可以买些生活用品。完全免除了家庭负担。开学后,我心怀感激更加专心求学了。

然而好景不长,1947年春天时局迅速恶化,内战加剧,物价持续高涨。学生食堂的伙食每况愈下,学生饭厅外墙上的壁报栏里,各个系级出版的壁报对政府的批评日益尖锐。批评国民党不该撕毁跟共产党达成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双十协定”,不该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内战,把国家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批评政府官员贪污腐

化,鱼肉百姓,民不聊生……。

清华园不再是“世外桃源”,原来平静的校园变得波涛汹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被讥讽为“书呆子”行为,我们这些仍然经常晚上跑图书馆的,被同学们劝说:“别再‘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啦!”不久,教育部长朱家骅来清华视察,当众宣布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决定取消到外国留学的助学金。他向我们这些家境困难想靠助学金出国留学的学生泼了一大盆冷水!我的那个“要当中国的爱因斯坦”的梦想算是被彻底粉碎了!

终于,1947年的5月20日,北平爆发了上万名大中学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大示威游行。这次学潮是由中共北平地下党指挥华北学生联合会出面组织的。我们清华大学学生会通过各院系的学生代表动员同学们参加。那天凌晨,我被同班好友梁燕叫醒,一起到饭厅去制作纸旗。我的任务是把三角形的纸旗用糨糊粘在小竹棍上。我干着干着就趴在饭桌上睡着了。梁燕把我摇醒,把他自己正抽着的香烟塞进我嘴里,要我抽两口提神。我平生第一口烟就是这么开始的。当时呛得我剧烈咳嗽真的把瞌睡虫给吓跑了!

这次示威游行是由我们清华大学打头阵,在高高举起的“国立清华大学”大横幅下面,整齐排列着穿上军服的同学。他们都是参加过远征军的高班学员。他们的气势让阻挡游行的警察们让开了道路。这回参加示威,我因为从心眼里痛恨国民党打内战,整得民生凋敝、社会动乱,真的搞得“华北之大竟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游行中我喊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梅贻琦校长心疼我们,鉴于上次游行不少同学病倒,这次让学校租了不少大卡车把同学们接回清华园。

我没有坐车回学校,而是应铭贤中学同窗王姐姐的邀请跑到辅仁大学去看她。她说,叫你来是要跟你告别,明天我就要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去了。这让我张大嘴却说不出话来,在班上我们一直亲如姐弟,又都是虔诚的基督信徒。第二天一早,在前门火车站,我跟已经化妆成农家姑娘的她含泪告别。这件事对我的刺激极大。

北平的“反饥饿、反内战”学潮带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学潮风起云涌,毛泽东高兴地把国统区的

学生运动称之为“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五一学潮”以后,清华校园里的中共地下党开始积极地推进这个“第二条战线”。首先是在同学中成立各种“进步社团”:诸如读书会、壁报社、歌咏队、剧艺社等等,用以开展“革命思想教育”。

1947年5月底,梁燕介绍我参加了我们班上的“戈壁草读书会”。会员们一起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热烈讨论。我被《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那优美的、气势恢宏的文笔所吸引,更被他描绘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间天堂所陶醉!

1947年6月底,我们读书会的会长杨坤泉吸收我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联盟”。他明确告诉我:“中国民主青年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团结热血青年共同奋斗的组织。还说,虽然你在班上年龄最小,你的爱国热情却比好多同学都高!然而不久我就知道了我高涨的“爱国热情”如何严重影响了我的求学热情。我第二学期的期考成绩不仅失去了全优,“微分方程”课竟然不及格!面对这个成绩,我惭愧的只给父母写了一封平安家书。暑假开始后,“民青”组织上分配我参加“农民识字班”的活动:到清华园附近农村去教青年农民识字、同时向他们进行革命宣传。当我坐在农民的土炕上眼见他们家徒四壁的贫困,感受到他们的淳朴善良,我在感情上要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决心也更加强烈了。

1947年8月18日,我的“农民识字班”班长刘崇仁,在清华园天文馆后面的树林子里跟我谈话。他说,你在“农民识字班”的表现很好,我们决定邀请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起投入革命洪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我热泪盈眶,跟他紧紧握手。我当时竟然有在教堂接受洗礼的那种感动。

就这样,在清华园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完成了从基督信徒到共产党人的嬗变。

一周之后,王凤翔在家里过完暑假回了天津,专门跑到清华园来看我。他看了我第二学期的成绩单,沉下脸来问我怎么回事?我除了对入党之事保守秘密,其余都据实相告。他听完拉着我的手,围着清华园的内墙转了两圈,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都听人家的宣传;中国不能走俄国暴力革命道路;不要浪费了这么难得的学习条件,



游击队时期照片

不要辜负了老师、家长的期盼……我低着头说：“凤翔哥，等新中国建立后，我一定继续把物理学好，一定去实现我们科学救国的理想！”他深深地叹口气，失望地走了。

40年之后，王凤翔作为访问学者，从美国加州大学到北京航空学院参加学术会议。在我家那间简陋的卧室里，他拥抱着我、拍着我的后背说：“都怪我当年没有本事把你拉回头，让你这辈子吃了那么多苦！”我摇头：“哪能怪你老哥子没本事，只能怪小弟我那时不听你的话！”

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我在1947年8月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并不知道一旦当上共产党员，我就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而且，从此我就必须“一切听从党的安排”。那年9月，新学年开学后，党组织根据我能歌善舞的特长，安排我领头跟几个文艺细胞较多的党员与“民青”盟员去组建一个新的“进步学生社团”：“清华民间歌舞社”。我们在学生食堂门口，张贴了海报：《我们几个民间歌舞爱好者，成立了“清华民间歌舞社”，欢迎爱好歌舞的同学报名参加》。很快就有20多位同学报名。我们请了著名舞蹈家戴爱莲，来教我们跳她创作的西藏舞《春游》《巴安弦子》；又请了“西部歌王”王洛宾，来教我们唱他创作的新疆民歌《阿娜木汗》《青春舞曲》等等。这些舞蹈确实优美，新疆

民歌也十分动听，吸引了许多同学来参加我们的歌舞社。这些民间歌舞是纯粹的艺术精品。我们随后便排练了一些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歌舞，比如《凤阳花鼓》《茶馆小调》，它们述说民间疾苦，揭露政府腐败；又比如《陕北秧歌舞》和《山那边哟好地方》，它们赞美共产党统治下的解放区何等民主自由，勤劳致富。我们这些歌舞节目在校内外的文艺晚会上广受欢迎。北平不少院校也先后建立起类似的民间歌舞社团，作为开展学生运动的有效手段。

我既要分担我们歌舞社的组织管理工作，又是歌舞队的骨干演员，还常被邀请到一些兄弟院校的“民间歌舞社”去传授歌舞。在清华园大二的第一学期，我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但代价沉重，我的期考成绩进一步下降，各科成绩没有超过70分的，还有两门不及格。那个寒假，党组织减轻了我的负担，让我复习功课，争取补考及格。

1948年春天，国共内战出现了重大转折：共产党的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此时，解放军部队的扩充、新占领城市的管理，以及新政权的建立都急需大量知识分子参加。清华园里的地下共产党开始安排它手下的共产党员和“民青”盟员经过秘密通道到解放区去，或者秘密派回他们的家乡去搞迎接解放的地下斗争。

1948年6月初，我的地下党联系人刘崇仁代表党组织通知我：组织上决定安排我先去解放区接受“敌后工作培训”，再返回四川去搞“敌后武装斗争”。他还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他自己不久也将去解放区，盼望革命胜利之时，我们都能回到清华园一起复学。我按照他的吩咐，化妆成学徒工冒险混过封锁线，到达解放区接受培训。同年8月，我再装扮成商贩从解放区偷偷回北平，不巧正遇上全城戒严抓捕共产党。我只得到城外荒野坟地里躲藏了一夜。幸好，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菊已经是共产党员，我被安排到她家里住了几天。她帮我买好船票，

坐海轮沿着两年前由重庆来清华园那条漫长曲折的路线回到了重庆。当时,父亲已经应聘到位于乐山的川康毛织厂任厂长;我赶往乐山,踏进家门,见到了母亲惊喜的眼泪和父亲惊讶的眼神。而我这个自认为已经是“职业革命家”的儿子,却羞于向他们表达自己的爱了!庆幸的是,他们当时并未预见到他们最疼爱的三儿子将要经历什么危难。

1948年10月,我在前往广安华蓥山寻找共产党游击队途中,被正在围剿游击队的国民党保安团识破我是假扮农民,将我抓进监狱拷问。幸亏我舅父在国民党广安县县党部任秘书,我买通牢房看守将我的求救信送出,舅父接信后到监狱把我保释出来;我随即被安排到四川大学物理系当“借读生”,实际上是在该校地下党建立的“方言歌舞社”担任教练。1949年4月20号晚上,四川大学发生了“四二〇大搜捕”事件,那时我已经被国民党情报人员盯上,名字已列入搜捕黑名单,但当天晚上我恰好被安排去一位教授家里向川大教师们介绍解放区实况,侥幸躲过了一劫;之后,我立即被转移到远郊农村一个秘密据点去开展农民运动,同时负责为川西地下党编辑出版《火炬报》。我通过秘密收听共产党的电台广播,把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刻印成油印小报,将它取名为《火炬报》,秘密传送到学生、工人和市民手中去。1949年8月中,国民党情报人员发现了分发《火炬报》的联络站,逮捕了联络站的两名地下党员。他俩经受住了酷刑拷问,拒绝供出我的藏身地,才没有让我跟他们一起成为共和国烈士。随后我就被安排到“川康边人民游击队”担任宣传队队长。我们这支上万人的游击队在1949年底的成都战役中,协助解放军完成了围歼胡宗南兵团的任务。

1950年元旦,我们游击队宣传队排练了一台精彩的歌舞节目去慰问解放军。受到部队首长的热烈赞赏,却给我自己带来了不能回清华复学的后果。游击队解散

时,队员全部回家,干部都分配到地方参加新政权建设,唯独我们宣传队被全部调往解放军成立军分区文工队。我被任命为文工队队长,从一介书生变成了一名解放军军官。一个月后,我向部队党组织请求允许我返回清华大学继续上学。军分区政委亲自找我谈话,仗是打完了,政权还不巩固,我们还要清匪、反霸、搞土改,这些关键在于提高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你们下乡演出《白毛女》效果有多好。你们文工队现在离得开你这个队长、教练兼演员么?再等几个月吧,到时候我负责打报告送你回清华念书。

可谁也没有料到:几个月后,我等来的是朝鲜战争,是抗美援朝。

1951年3月,我怀着或者马革裹尸回或者光荣胜利归的思想准备,跟随我所在的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由于中美两国的实力相差过于悬殊,我们志愿军的伤亡极为惨重。我们到达三八线投入战斗一个月后即陷入美军的重重包围,但我最终也没能突围出去,而是当了美军的俘虏。

在韩国美军俘虏营里的三年铁窗岁月

被俘后,我先后被美军囚禁在韩国釜山、巨济岛的战俘营里。饱尝了丧失人身自由,远离故土亲人以及食不果腹、衣不避寒的痛苦。但更令我难以忍受的是美军采取的战俘政策。美军鼓励一些反共战俘要求在停战后去台湾,并给这些人以控制战俘营的权力,让他们用政治陷害和暴



借读四川大学时期

力手段去强迫尽可能多的战俘拒绝回大陆。这就剥夺了我们大多数人想要回归故土跟亲人团聚的选择权利,这迫使我们组织起来拼命反抗斗争。1952年5月7日,朝鲜人民军战俘扣留了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为人质,要求美军当局放弃他们推行的、强迫战俘拒绝回归自己国家的罪恶政策。这就是当年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杜德被迫同意召开朝中战俘代表大会,我因为在坚决要求回国的斗争中表现出色,又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被坚持回归大陆的难友们推举为大家的总代表被送去参加战俘代表大会。“杜德事件”结束后,我们这些战俘代表被恼羞成怒的美军当局判为“战犯”,长期关押在巨济岛最高监狱与“战犯营”。并因“战犯”不受日内瓦战俘公约的保护,我们经受了残酷的身心折磨,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签字。两个月后,双方交换战俘,我被遣返回国。

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子

当我们再次跨过鸭绿江踏上中国的土地时,我在心里呼喊:“祖国,您的满身创伤的儿子回来了!”我为重新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做人的尊严而万分激动。

然而等待我们的是“怕死鬼”、“变节者”、“背叛者”的罪名,是开除军籍、开除党籍、终生监控的处分。在我退伍回家之后,到清华请求复学遭到拒绝、各处去求职碰到冷脸、出国前订婚的婚约被反悔。正当我走投无路之时,我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历救了我。北京第九中学急需高中物理教师,校长看了我档案里写的“终身监控使用”几个字,便对人事干部说:既然写有“使用”两个字,那就把这位清华物理系学生先使用起来再说嘛。

1955年夏天,我兢兢业业地开始站上讲台教书。只希望自食其力,别再让父母为我操碎心,也别让学生失望。1956年夏天,我与学校一位不嫌弃我的语文教师结了婚,1957年初夏我们的儿子降世。我看见了自己生命的新的曙光。哪知儿子出生还不到一百天,我就因了“抗美援朝变节者”身份在那场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二类右派分子”,取消了我的教师资格和每月70元工资,改为发放18元生活补贴,下放农村监督劳动六年。

但让我更加痛苦的是,父亲受到了我的牵连。在1948年我以“职业革命家”身份回到家里时,曾再三劝说父亲参加革命。父亲同意后,他接受了地下党的安排,在解放前夕以袍哥名义组织了工人武装护厂队,防止了国民党军队对工厂的抢劫,并保护了当地的水电站。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父亲被诬陷为在解放前夕组织“反共自卫队”妄图负隅顽抗,立即以历史反革命罪逮捕入狱,1959年冤死狱中。这个晴天霹雳让我后悔莫及,欲哭无泪。我不止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更让他老人家沉冤海底。

1963年我被重新分配工作,到一个偏远的中学任教。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我再次被扣上“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的帽子,遭受关押、批斗、折磨。1976年文革结束后,我们开始向党和政府申诉志愿军战俘的集团性历史冤案,1980年我们争取到了平反昭雪,恢复尊严。我父亲的冤案也争得了昭雪。我生命中的30年磨难终于截止了。

承受三十年磨难后的想法

60多年过去了,现在再来重新审视我走过的的人生道路,可以比较冷静、客观地去分析认识了。

“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这是当年在清华园里暗中流行的快板词。那是说我们原来要走的科学救国之路走不通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武装斗争、革命救国的路了。这么看来,主要是那时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苏俄革命胜利影响下,在华夏大地上出现了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我被清华园里的那股激流卷进去了。但是,清华园还有很多同学为何没有被卷进去?王凤翔为何也没有被大潮卷进去?我有自身的问题和弱点。

我简单地相信“消灭私有制”是正确的。但是,苏联最终的垮台和中国大陆前30年的沉痛历史已经证明,私有制是人类的生存权的保障,不应该用暴力去消灭。至于我的浪漫,我的不想墨守成规,勇于探求新生事物,甚至喜欢冒险,应该是一种好品格。但是,浪漫不应该建立在幼稚和轻信的基础上。■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汪东兴：毛泽东不同意江青进常委

○ 杨银禄

【编者按：本文是杨银禄同志的一则日记。多年来，有一种传闻，认为毛泽东要让江青当接班人。本刊发表杨银禄同志的这则日记，供读者参考。】

1999年10月3日上午9时，我和汪东兴同志的前秘书高成堂、孙守明，江青的原秘书刘真、刘玉庭等一行8人，到汪东兴同志家中看望汪老。他跟我们讲了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情节，他说：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江青认为她进政治局常委的机会到了，于是就请求人事安排小组的周总理和康生替她和姚文元说说进常委的事。有一天，要开政治局会，会前，毛主席对我说：“他们提议江青、姚文元进常委，我是不同意

的。”主席问我：“你同意江青、姚文元进常委吗？”我说我也不同意。主席说：“他们两位怎么能进常委呢？进政治局就完全可以了，要增加常委名额的话，只有二老有资格，一位是朱德同志，一位是董必武同志。你先去布置政治局会场吧。”

我刚刚走出主席办公室的门，就接到总理的电话。他说：“我与康老一起要向主席汇报提议进政治局常委名单的事，你向主席报告一下。”总理、康生来了以后，总理问我：“主席同意我们进去吗？”我说主席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你们进去吧。主席对他们说：“我不同意江青、姚文元进常委，他们进政治局就可以了。”■

（作者曾为江青机要秘书）

（责任编辑 黄 钟）

读者来信摘要

拜读了贵刊今年第8期卷首董郁玉先生的重头文章，获益殊多。该文受内容和文体制约，长句不少。而美文不厌多遍读。但有一个地方虽经反复诵读、推敲，仍难得真谛。

董文说：

但是，在资源似乎永远处在稀缺状态的世界，人的行为，尤其是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必定要与行为人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产生具体的后果。这种行为与责任的对应性，是人类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自然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道德的逻辑支点之一。不以“自然正义”为基础、或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或许可以屏蔽“自然正义”于一时，但终究不能解构已经根植于人性的这种正义观。也正是这种“自然正义”，支撑和建构着在当今世界普行着的所谓“责任政治”。

愚以为，笔者加点的语句表述有误。

不以“自然正义为基础”而偏偏又要处心积

虑地去“屏蔽”它，就必须煞费心机，炮制出另类似是而非难以自圆其说靠强权推行的所谓意识形态。这就是与“自然正义”（行为与责任的对应性）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借以达到得逞于一时的政治目的。照我理解，这便是作者的本意。

但加点的语句中，顿号与“或”字，均表示前后句属平行关系。“不以”二字不仅管着前半句“‘自然正义’为基础”，也管着后半句即“或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这样表达的文意就成了“不以”自然正义为基础，也“不以”或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就可以“屏蔽”自然正义于一时。作者一再谴责的作为“屏蔽”手段和武器的“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便无缘无故的消失了踪影。这样还用什么去“屏蔽”自然正义于一时？于是“屏蔽”便失去了依托，顿成无缘之木、无本之水。

愚以为，可将顿点改成逗号，将“或”字改成“而靠”（有诸多能与其表达相同意思的词语可供选用），原句改为“不以‘自然正义’为基础，而靠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或许可以屏蔽‘自然正义’于一时”。

山东读者 李裕泉

改革要有时间表

○ 宫希魁

有一种说法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其本源意义在于强调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重要性,对此必须正确把握和理解,不要误读了这一命题。改革究竟是一个有始有终有时段限制的历史过程,还是一个永无休止没完没了的无限持续过程?我的回答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改革虽然是我们前进和走向复兴的动力,但绝不能把改革理解为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无休止过程。改革是清道夫,改革是助推器,改革本身不能当饭吃,它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我们的目标不是滞留在改革的过程之中,而是要尽快地到达改革的终点和彼岸。如果弄得不好,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命题很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利用,以此为托词把本来应该和能够推进的改革推向遥遥无期。

我国目前所正在进行的改革,是有明确目标指向的,其内容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从所涉及的范围和广度上区分,改革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改革是事关国家全局的制度和体制创新过程,比如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中观改革虽然也有全局性,但具有明显的条块领域性特点,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财税管理体制改革等。微观改革则涉及面更窄、更具体,有项目性特点。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实行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金融政策、对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增幅实行适度倾斜政策等。

与这三个层次的改革相对应,完成改革的时限要求是很不相同的。宏观改革由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点,其完成的时限要求可以放长一些,或者只能划定一个大概的时限区间。但这绝不是说可以没有明确目标设定,没有时间限制,“没有完成时”成为理所当

然。1992年党的14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2002年党的16大规定到202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中观改革范围要小一些,不确定性也小一些,可控性强一些,因此其完成的时限要求应更短一些,更明确一些。至于微观改革,基本属于较为具体的制度、政策、措施方面的改变和调整,应有具体的完成时间表。由此可以看出,每一项中观和微观改革,决不能“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无休止地推延下去。一个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文件制定了若干年,千呼万唤始出来是不正常的。就是宏观改革,也不能没有时间表,可以无限期地拖下去。

我们把眼光放宽些,凡古今中外具有改革性质的历史事件,不管其成功也好,还是失败也好,或者既不完全成功也不完全失败,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内宣告结束。一个进行了几十年还远远看不到尽头的“改革”,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先例。为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础的商鞅变法,始于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38年商鞅被车裂,历时不过18年。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始于公元1068年,到王安石1076年退隐金陵,不问世事为止,不过8年时间。如果算到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为止,也只有18年。近代的戊戌变法,史称百日维新,来去匆匆,更为短暂。日本的明治维新从1868年宣布改元明治开始,到1889年确立立宪结束,历时21年。上世纪30年代,美国以时任总统命名的“罗斯福新政”,始于1933年旨在整顿金融的“百日新政”,结束于1939年走出危机阴影,经济全面复苏,历时仅6年多。所有这些著名的具有改革性质的历史事件,其时限都没有超过30年。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人为把改革长期化,无休止拖延下去,并不一定是否符合客观规律的历史进程,而是很有可能掉进了孙立平教授所说的“转型陷阱”,长时间在泥沼中

不能自拔。

30多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之路。只有把改革进行到底，才能迎来中国更加光明的前途。这是一个国人最具广泛认同基础的基本判断。就是那些别有用心的阻挠改革、扭曲改革的人，在表面上恐怕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改革遇到了新的困难和挑战：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凸显，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和自然环境恶化，腐败严重，地区差距扩大。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对改革方向的分歧对立日益加深，而且争论的焦点已从意识形态上的姓资姓社演化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角逐。

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已是改革之要。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凭借不合理的制度规则、公权私用、垄断地位等不正当手段和途径攫取集团性特殊利益的群体，即可称为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并不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私利。既得利益集团嘴里喊着改革，但行动上不想改、不愿改甚至反对改革，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个集团企图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在“渐进式改革”的幌子下把国家推入“转型陷阱”的泥潭。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怀疑。由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连“改革”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私利不想把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却煞费苦心制造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以掩人耳目。

一曰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此论看似稳妥，实为托词。从长跨度看，“渐进改革”就一定比“激进改革”绩效好，未必如此，长痛短痛的利益比较并未见分晓。两德统一，如果撇开意识形态

价值判断，从德国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出发，闪电式的合并比渐进式的统一不知要好多少倍。

二曰要整体配套，全面推进。这话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没有问题。但作为搪塞之词来用，就大谬不然了。因为滴水不漏的全面系统设计而又容易具体操作的完美方案，固然理想，可是在现实中，这类完美方案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所谓“最好”是没有的，我们的选择空间只有次优或较好。因此，不是要等十全十美了再干，不少情况下有个七八成甚至五六成把握就应该冒险一搏，否则就不要大力提倡改革需要勇气了。

三曰改革“难”哪，“难于上青天”。我们当然承认，改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一件需要冒风险的事情。但这不能成为这也不能干，那也干不成的理由。有很多事情事在人为。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些看上去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事情，只要你准备好了去摸它一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解决“三公经费”滥用、官员收入及财产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问题就都卡了壳，一推再推，难有实质性进展。这些事情世界上多数国家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这难道不需要深思吗？事情本身恐怕并没有那么难，有些所谓“困难”是人为造出来的“稻草人”旨在吓唬人而已。

四曰国家大，人口多，国情特殊。这更不能成为拖延改革的理由。正是这样的国情，改革的主导者才应该更加看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涉及这么多人命运前途的大事，岂能等闲视之，久拖不决。

五曰坚持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当然就要至少一百年不停歇地搞下去了。这是对邓小平著名论断的误解。邓小平论断是一个长周期判断，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认识，其制度至少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这期间必然要发生多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改革，组成一个改革的链条，而不是说我们这次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轴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改革非要搞它一百年不可。

改革动力不足是一个现实问题。凝聚改革信心，激发改革动力，靠什么？靠的不是喊改革口号或阐述一般性的改革道理，而是要通过实实在

宋平在甘肃的两件往事

○ 邹雅林

宋平同志于1972年7月25日经中央批准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在甘肃工作了10年。他常说：“甘肃是个穷地方，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说大话，也说不起大话，所以无论谈到哪方面的工作，都不能把成绩说得太满。”他还说：甘肃有过说“大话、空话、假话”血的教训，在1958年“大跃进”中大刮浮夸风、征过头粮，曾因此饿死过近百万人，想起这件事就让人心里难过！要永远牢记：在这么多饿死者的灵前还说大话、空话、假话是天大的耻辱！

我在宋平同志身边工作多年，他对我的教诲是终生难忘的。现在就我亲历的几件往事记载如下。

“救灾就是抢救人命”

我认识宋平同志是从1973年到定西地区救灾开始的。在“文革”中，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的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极大的打击和挫伤。加之1971年、1972年两年大旱，粮食产量锐减，许多地方颗粒不收、水窖枯竭、救灾无门，群众缺吃、缺穿、缺水、缺柴，许多人家无隔日之粮，并无可饮之水，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1973年又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情况继续恶化，农民已无法承受连续三年灾荒的沉重打击，都说“三年困难时期又来了”。特别在青黄不接的春荒，天兰、兰新铁路有成千上万的人挤上火车，到新疆、陕西讨饭、“背粮”，通渭、陇西、渭源等县的部分乡村，80%的农民外流逃荒要饭。如果再不设法解决，真的会出现“三年困

在的改革进展，特别是一些关键领域的关键性进展，来证明改革确实是在向前推进，确实是在攻坚。人们的信任和耐心是有限的，不可以无限透

难时期”的悲惨境地。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5月26日，周总理来到西北组会场听取讨论。宋平同志抓住时机，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国务院汇报了甘肃受灾的情况。周总理在5月29日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一段甘肃的情况，他说：“我听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很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甘肃人民。”会后周总理立即派8个部委、12位司局长参加组成近百人的“国务院赴甘肃学习调查组”，由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商业部副部长刘忍、水利部副部长王英先带队，从这年6月18日至8月20日，深入到甘肃省中部地区18个干旱县和陇东、临夏地区，对群众的生活、生产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和做好救灾工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省委决定：由宋平和省委副书记茅林、常委申效曾三同志组成接待组，宋平担任组长。然后从省委、省革委会和有关厅局抽调一批干部，兵分三路，分赴定西、临夏、陇东进行调查与救灾工作。我刚从省革委会北湾“五七”干校经过审查、彻底平反后回到轻工业厅，还未正式分配工作，领导决定叫我随副厅长雷祥同志一起前往，在宋平同志领导下的通渭县做调查与救灾工作。

宋平同志一到定西就“约法三章”，他说：“我们是来救灾的，周总理指示我们：‘救灾就是抢救人命。’我们就是抢救人命来了！群众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我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渡过难关，不

支下去。■

（作者为中共大连市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要再现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悲惨境地。所以我们决不能搞特殊化，不搞迎送那一套，更不能大吃大喝，在地、县住招待所，一律吃四菜一汤，下去后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实话实说，不许说假话、空话；对揭不开锅的没粮户，要及时想办法解决，开展生产自救。”

开饭的时候，定西地委书记王化宇同志（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地委其他领导同志作陪。王化宇同志说：“欢迎大家帮助我们做救灾工作。我们定西是个穷地方，按照宋书记的指示，吃顿便饭，四菜



宋 平

一汤，菜都是定西一带产的。”可是，桌上不是四菜一汤，是两大茶盘菜、一个汤，宋平同志一看就笑了，他说：“好嘛，这是化宇同志别出心裁，大家都吃吧。”这时，他看到桌上有一瓶酒，立刻告诉王化宇：“酒一定不能喝，下去救灾喝什么酒？”他拿起酒瓶问王化宇：“这是山西的汾酒，是定西产的吗？”王化宇同志马上说：“按宋书记的意见办，不喝酒。”叫人把酒全部收了回去。

我们小组在通渭调查救灾期间，宋平同志曾两次到通渭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和我们一起挨门挨户到农民家中调查访问，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当我们跟随他走进一家农民的住处时，屋内被烟熏的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只见屋内的土炕上没被子、褥子，连一张草席也没有，五个光着腚的孩子和妈妈一起围坐在土炕上，几双明亮的小眼睛扑闪扑闪地惊奇地看着我们，大的有七八岁，最小的还在母亲怀里抱着，哭闹着要吃的，可是家里已经断粮，锅里只有半锅野菜汤；另一家农民，一家五口，将家里能换钱的东西都卖掉买粮了，连屋上的房瓦也揭下卖掉了，仅这个村卖房瓦的就有七户；还有一家农民，穷得连个吃饭的碗都没有，只有一个破钢盔当饭碗，树枝当筷子，谁看了都会心酸流泪！……挨门挨户地走了十几家，都是穷得叮当响。宋平同志几次痛心地流下了眼泪。他只是反复地说：“解放20多年

了，怎么还穷成这个样子！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辜负了中央的重托。”宋平同志是不抽烟的，这时他向我要了一支烟，慢慢地抽起来。他问我们：“你们说，我们看的这些农户，每户的家当值不值十块钱？”我们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有的说：“不值十块钱。”有的说：“家家户户一贫如洗，哪有值钱的东西！”宋平同志心情沉重地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抓农业生产，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关心改善农民生活。三年困难时期的教训决不能在甘肃重演。”这时，宋平同志没有停留在对农民生活困

难的调查上，而是在困难中探索群众生产自救的办法，提高群众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他对雷祥同志说：“你们轻、手工业方面应当多想办法，找些时间短、花钱少、见效快的短平快项目，帮助群众渡过难关，不能只等中央的救济。”我们说：“通渭盛产胡麻，麻秆可以沤制亚麻纤维，争取出口；附近有陶土，可以烧瓷器，只是工艺落后，产品颜色发黄、制作粗糙，没有销路。”他对这里的陶土非常感兴趣，并且和我们一起到产陶土的山坡上仔细地查看了陶土，要我们帮助改进工艺，多搞些适销对路的产品，他说：“只要认真发掘，生产自救的门路还是有的。”同时他还叫我们把全省轻、手工业的情况给中央调查组写个报告。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罗玉川和宋平同志先后直接给周总理和国务院发了三份特急电报。罗玉川带领国务院工作组于1973年6月20日到达兰州，6月28日就给周总理和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发出第一封特急电报。报告这里的灾情比原来预料的要严重得多，由于连年干旱，粮食产量低、家底薄，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每天吃不到8两粮的生产队占68%，吃回销粮的生产队占83%；有些社员无钱买粮，在卖掉猪、羊、鸡后，就变卖家具、砍树卖柴，有的连房上瓦都拆下卖掉了！通渭一个县就有2322人外出讨要，全县一起外



199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视察甘肃兰州市南北两山造林绿化情况(自左至右: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邹雅林,兰州市市长柯茂盛,省委书记李子奇,宋平,兰州市委书记李虎林)。

逃的有94户。这时,罗玉川心情沉重,感到责任重大,立即提出请中央筹集粮、款、衣、被等解决困难的意见。经省委同意决定:群众已经断炊的,提前供下月的回销粮;无钱买粮的,增拨一批救济款,以稳定社员情绪。宋平同志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接连给周总理和国务院发了两封特急电报,报告灾情在继续发展,人口仍在继续外流,请求中央尽快调入粮款,全力安排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除这三份特急电报外,中央调查组还上报国务院七份关于甘肃灾情的调查报告和开展生产自救的情况(其中一份《关于甘肃省轻、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报告》是我根据宋平同志的指示写给中央的)。不久,国务院就给甘肃省拨来救灾款5650.5万元,救济粮6498.5万公斤,汽车130辆,还有棉衣、棉被等大批救灾物资。以后按照宋平两封特急电报的要求,继续紧迫而及时地将灾区所需的钱粮陆续运到兰州,一直到接上新粮,帮助灾区渡过了难关,没有饿死一个人。

在调查中,我们曾给宋平同志汇报过三次情况,他每次都对我们的调查给予明确的指示,他说,要教育干部在发放救灾物资和救济款中,要廉洁奉公,不准贪污挪用;要办事公道,不能徇私舞弊;要分清轻重缓急,按照调查情况,有计划、有秩序地发放;并且特别交代先让光着腚的孩子穿上衣服,揭不开锅的人家尽快解决口粮,决不许饿死一个人。

坚 决 抵 制 把 工 业 学 大 庆 会 议 篡 改 为“ 批 林 批 孔 ” 会 的 阴 谋

定西地区的救灾工作结束后,我随雷祥副厅长一起回到厅里,但仍然无法平安工作。

本来我在省革委会北湾“五七”干校对我审查

的问题已于1972年正式作了全部平反的结论,并且已经任命我为厅里办事组组长(办公室主任),可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因此受到攻击,诬称这是“继承孔老二的衣钵”,请“隐士”,举“逸民”,要“新老账一起算”,企图再一次把我打翻在地。这时,我就去找在甘肃中部地区救灾工作中认识的宋平同志的秘书张学忠同志,把我在“文革”前的不幸遭遇如实地告诉他,请他报告宋平同志我渴望有个安定的环境能够好好工作的请求。学忠同志向宋平同志反映了我的请求,1974年宋平同志同意把我调到工业学大庆办公室工作。这是我一生中工作的最大转折。

1975年初至1976年2月,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他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的方针,排除“四人帮”的破坏和各种干扰,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这年,甘肃工业战线由宋平同志主管,经过整顿也开始出现了生机。1975年5月初宋平同志想借整顿的东风,召开一次工业学大庆会议,认真落实大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创业精神,推动甘肃工业的发展。

根据宋平同志的指示,由省工办主任(原省委常委、秘书长)郭坦牵头,从省工业学大庆办公室、省轻工业厅、省煤炭局抽调我和毛敌非、金仲超三位同志,负责起草工业学大庆的报告。可

是,当时邓小平同志领导进行的一系列整顿,遭到“四人帮”的疯狂攻击,当时的省委主要负责人紧跟“四人帮”统一部署,攻击和破坏邓小平领导进行的整顿工作,因此置全省工业生产于不顾,企图改变这次会议的正确方向,硬要把准备召开的工业学大庆会议开成“批林批孔”的会议,所以我们起草的工业学大庆报告虽然经过十多次修改、写了十三稿仍然未能通过,我们就这样与之针锋相对地坚持了八个月,始终没有屈服。宋平同志不仅始终没有屈服于这种强大的压力与迫害,更没有掉转船头改变工业学大庆的正确方向,而发难者自己却把这场斗争的真实面目暴露在全省人民面前。我们一直在这场斗争中支撑到这年的12月底。

从1976年元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当时甘肃的主要领导不甘落后,紧跟着开展了这一运动,对1975年各项整顿工作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甘肃省工业学大庆报告起草小组这时也受到了猛烈地攻击,他们诬蔑“郭坦在工办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继承孔老二的衣钵”,请“隐士”、举“逸民”凑成“黑班底”起草工业学大庆报告(报告起草小组的四位同志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批斗)。给郭坦同志贴了一千多张大字报,从省革委会的办公大楼一直贴到大门外中央广场大街的门墙上;尤其是其中一张“七人大字报”,把我们起草工业学大庆报告的四个人作为刮“右倾翻案风”的“黑班底”点名进行攻击。我们对此非常气愤,一致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政治迫害。毛敌非同志是“文革”前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的副处长,对炮制“七人大字报”的成员他都认识,他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去找起草这张大字报的牵头人据理力争:我们工业学大庆报告起草小组的四个人,都是组织上调来的,我们虽然在“文革”中都受过批判,但是都已做了平反的结论,怎么能说我们是“凑成的黑班底”?为什么给我们强加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他们支支吾吾,不作正面答复,只是说:“大字报不是针对你的,你染这件事干什么!”那么,这张大字报是针对谁的呢?很显然是冲着领导筹备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宋平同志的,是有来头的,因为工业学大庆会议的指导思想未能改变为“批林批孔”的会议而触怒了

一些人才冒出这场斗争的。由此,在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工作中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全省人民面前深入展开。

这场斗争开始时,宋平同志因公外出。他回来后,郭坦带领我与敌非、钟超三人对上述情况向宋平同志如实做了汇报,宋平听后冷静而严肃地说:“大家受委屈了!这场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我的,因为我不同意将工业学大庆的会议开成‘批林批孔’的会而触犯了一些人;工业学大庆的正确方向是不能篡改的,这是两种立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前奏和政治阴谋,迟早是会发生的。我贯彻的是中央文件精神,他们找不到直接攻击我的借口,所以只有把你们端出来开刀。”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学大庆报告起草小组于1976年2月被迫解散,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也至此夭折。■

(作者为甘肃省政府原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

——读《红尘冷眼》

○ 董国和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红尘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的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共分十一个不同时期，《无愧室日记》从1960年2月记至1962年12月，前两年正是“困难时期”。但他所记述的宴会之频、酒肉之丰，尤其是出访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称为“蝗虫”之行。“蝗虫”语出陈四益的《臆说前辈》，他在回忆朱东润时说：先生到各地参观归来，“在课堂上讲到沿途受到的招待，感慨系之：‘我们这批人就像蝗虫，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而组织者是“想让他们看看人们怎样在勒紧裤带搞建设”，没想到却得此浩叹。

宋云彬因“嫉恶太甚”，“赢得头衔右派来”，但身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有到各地参观访问的机会，这就与公款吃喝接了轨。他第一次出访到河南，时在1960年2月27日：“九时乘火车赴洛阳，阿平送我上火车。”28日“下午二时半到洛阳，住西工区国际旅社”；“旅社中饭菜甚佳，不免吃得过饱，有消化不良现象，吞服保和丸，殊少见效。”

“菜甚佳”为2月29日所记，3月2日则记云：“晚上有宴会，酒有多种、菜亦丰盛，以肠胃不好，不敢多吃也。宴会散后有舞会，我不会跳舞，当然不参加。”

3月2日，记有买生姜者一笔，此因“生姜在北京极难买到也”，可知北京的供应也是每况愈下。这次出访到16日“乘车返北京”，期间还参观了三门峡、花园口等地，沿途也都受到盛情款待。但因他“饭量大减”，款待文字着墨不多；而其中闲笔，却颇有深意：

“下午，参观管城红旗人民公社。看敬老院，敬老院隔壁(西大街二十七号)住一七十多岁之老人，门口张贴一告白，中间大字书‘代写书信’，方有两行小字，其文曰：‘代写检讨、坦白、悔过各

书，保证一定作用。’其人从前殆一讼师也。”此为3月12日所记，而在1960年5月10日，还有一则补记：

“上下午校《后汉书》。晚饭时，伯宁来，云裳亦在，余方饮酒，谈凡事必须实事求是，如在郑州参观展览会，讲解员指陈列的七个大鸡蛋，谓是一只鸡在一天内所下，并谓现已跃进到每天一只鸡下十四个蛋，又如前年有人赴天津参观农村，谓一亩试验田产粮达十万斤，皆与事实不符也。伯宁不以为然，且戒余不得在阿庄面前说，妻亦从傍附和之，余大生气，大家为之不欢云。”

知此，既知大跃进为何还能继续升温，因有众多“伯宁”的“不以为然”；而这前车之鉴，则由宋云彬被“戴帽”而来；有了众多人被“戴帽”，才有了讼师的复活，由此“困难”也就更加严重。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而为“戒余不得在阿庄面前说”，就用“参观访问”来改造他的“必须实事求是”，这就有了浙江的口福。

去浙江途经上海，1962年1月7日：“在上海大厦吃午饭，有煮干丝、红烧划水等，好极。”此行访问先到杭州，晚“八时二十分”到达，“副省长任一万”等官员迎接他们，“九时半，吃夜饭，有鱼头豆腐、红烧肉。”

1月19日：“晚上，田县长宴请我们，喝了好多杯山西竹叶青。”1月20日：“中午到宁波，宁波市委、市人委负责人请我们吃饭，有不少省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亦在座，大悲和尚、尘空和尚及杜伟、胡耕民等都跟我热烈握手。”

1月26日：“上午，参观金星制笔厂、上海塑料制品三厂，午饭与圣陶等同吃，饮大曲一杯。下午，不去参观，乘车赴苏州，苏州市政协秘书长朱公亮、市交际处钱伯仁、市人委办公厅何介雄

来接,住南林饭店四号房。南林饭店苏州最高级之招待所也。晚饭在南林饭店吃。”

27日:“晚饭饮洋河高粱。”28日:“上午游虎丘,照了相;看留园、西园,也照了相。中午,地委罗运来书记、市委凡一书记和茅玉一市长请客,座有王亚南、吴强,他们都说宋委员海量,于是大家来劝酒,喝醉了。”

29日:“上午,参观城隍庙豫园,照了三张相。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七种点心:糖粥、蟹壳黄、南翔馒头、八宝饭、鸭血汤、酒酿圆子、葱油面。同徐铸成一道回上海大厦,纵谈为乐。徐去而志行来,作长谈,留他吃夜饭,我又喝了绍酒。”

30日:“七时,偕圣陶父子及伯祥赴和平饭店,应金仲华之邀,吃晚饭,陪客有金子敦、周予同。”31日:“下午四时上火车,住五号车厢,一号铺,与曹杰同房间。晚饭菜甚佳,喝了一瓶半啤酒。”

此次沿途款待,比上一次更丰盛也更热情,宋云彬因胃口好,记述的就更详细更生动;而他的胃口好,则由于“处境顺利,心情愉快”。“三年困难时期”,香烟也按票购买,但照样有特供。他嗜酒也嗜烟,1960年6月2日“上午与千家驹同车赴劳动人民文化宫公祭林伯渠”,“家驹谓政协可配售香烟,归来特致函政协询问”。但询问结果,却是“无回音”:“上星期四瞿陡初语余,谓曾接政协电话,问余之吸烟情况。今见郑洞国,我问他配了香烟没有,回说配到了两条牡丹牌。看来政协不会配给我了,而中华书局配来的都是不能吸的次等香烟。事情就是这样的可恶可恨,我却有一个好办法,就此戒了烟,岂不是件大好事!”

这件“大好事”,记于1960年6月12日。10月29日他被“摘帽”,老友张阆声贺诗说“孟嘉仍是旧丰神”。而在11月24日,就记有“人事组给我十一月份一斤半高级油票”;此前在21日已记有:“政协服务组来电话,谓购煤事已解决。余不需购煤,问之彬然,始知人事组用余名义向政协请求,用来调剂缺煤之同事也。”这“用余名义”,正是“丰神”的最佳写照。

“丰神”如故,又可以发表文章了,这就有人来约稿。他于2月1日晚抵京,“二十多天的参观访问,相当劳累”。然而就在这一天,“中国新

闻社寄来征稿信,约我写参观访问感”。此后在2月21日,他又记上一笔:“上午,偕彬然等赴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座谈号码检字法,即在俱乐部午餐。昨天与潘光旦、费孝通约定今天下午二时半在民盟中央作谈话录音。”因中间有变,“五时许,民盟用汽车接我到文化俱乐部,我和潘、费作了谈话录音,谈的是这次访问苏州的一些观感,据说将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广播云。”由此可知,这次出访,他们还要畅谈“到处莺歌燕舞”。

“无愧室”所记市场供应贫乏的状况,也有多处。他迁居北京后,在1958年11月1日有此记述:“伯宁请吃全聚德烤鸭,下午四点定桌”,但“回家已九时半矣。全聚德以烤鸭著名,然近来每天分配到的填鸭子不多,供不应求。伯宁此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定到一只,然鸭身小,烤法亦不如前矣。”

此为全聚德之景,再看1958年11月13日之记:“云裳买来烧鸡两只,大不盈握,余谓鸟也,非鸡也,云裳坚谓是鸡,疑莫能明也。又买来熏黑鱼头一个,其状如蟒蛇头。”北京食物匮乏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

食物如此匮乏,宴会却依然是“水陆罗八珍”。1960年4月8日记:“大会讨论,张修竹、荣毅仁等发言。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这是他在出席政协会议时,所品尝的口福。

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中写道:“例如包括我在内的,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城市中人,特别是大城市中人,当时是靠特别调拨的粮食得以维生,虽有小不足,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但不致命。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而“其中许多死者已是后人的绝户”!

邵先生的反思振聋发聩。在一碗稀粥就可救一条人命之时,“无愧室”所记真可谓春秋之笔。在《红尘冷眼》序文中,罗以民说它“方配为正史作注脚”,信哉斯言。■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责任编辑 黄 钟)

俄罗斯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说

○ 马龙闪

苏联解体2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对这个问题,学界争论激烈,社会上众说纷纭,那么,俄罗斯学术界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人家作为当事国,作为身历事件的当事人,对自己国家的这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又是怎样评说的,我们应该仔细加以倾听和研究。从人家当事者那里得到的信息、史实和评说,应该说是最全面的,最有权威、也最有说服力的。我国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来自俄罗斯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和观点,大概是不无兴趣的。

其实,我国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也吸收了俄罗斯学界有关具体问题的不少资料和成果,但多是呈碎片状的,支离破碎而非系统性的,且由我们自己做了“思想加工”。有些人甚至采取“我注六经”的态度,在关键问题上依据一些经不起推敲和检验,甚至于子虚乌有或捕风捉影的说法,来注解自己的观点;更多的人,不是抱着冷静的科学理性,而是以高度情绪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态度,来解说、“宣传”这个问题。至于俄罗斯学界和舆论界从整体上怎么看待、解释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原因这个问题的,我国学术界则很少做过全面而深入的介绍和系统的研究。

俄罗斯学术界20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其实像我国学术界一样,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了多方面深入而细密的探讨;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文章和著作,可以说同样是汗牛充栋。但是,对于俄罗斯学术界这方面研究的综述文章,见诸我国报章杂志的却比较少。主要原因是,这些年我们国家设置的有关课题,都操之过急,没有人下足功夫去专注于此。国家规划的、有资金保障的、人力充足的课题,不研究这个题目,作为学者个人或某几个人,是不可能从事这类皓首穷经的项目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俄罗

斯来说,毕竟身处异域他邦,对人家在这类问题上的研究,需要搜集大量的文本资料,了解起来相对是比较困难的,若不倾注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是难以胜任的。对于某些有点权、有点钱,又有相应物质资源的人来说,说实在的,他们也没有多少可资利用的专深人才来致力于此,况且俄罗斯学界的解说与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他们对此避之而唯恐不及,哪还会去研究此类问题。

所幸,最近为研究俄罗斯当代史学史,笔者集全力翻检了不少俄文报刊,看到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堪称是俄罗斯国家史学权威刊物的《俄罗斯史》,刊载了由其主编A. H.梅杜舍夫斯基教授撰写的《从分析史学观点,看改革和苏联崩溃的原因》一文。该文简括而又精辟地概述了近些年俄罗斯史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我们可以借助这篇文章,结合其他资料加以综合,向我国学界介绍一下俄罗斯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总体研究情况。

—

梅杜舍夫斯基是在2010—2011年期间,为纪念苏联改革开启25周年、苏联解体20周年,撰写此文的。他说,过去“就这个问题所发生的争论”,“与其说触及的是事件过程的实质和对它的学术解说,毋宁说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在苏联开启改革四分之一世纪、苏联解体也已过去20多年之后,对这一问题进行完全学术研究的时机已经来临,因为这已为这一问题的理性分析提供了一定的时间距离”。他就是抱着这一态度,从分析史学的视角,采取信息认知论的方法,来冷静、理性地研究苏联灭亡原因问题的。

按照梅杜舍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对苏联崩

溃原因的概括,俄罗斯史学界近些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归纳为七种理论,或者说七种观点。但他并不完全认同这七种看法,他从分析史学出发,用信息认知论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实际上可称为俄学术界就此提出的第八种看法;加上我们中国学者都很熟悉的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提出的苏共瓦解的“三垄断说”,实际上俄罗斯舆论界和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总共提出了九种理论或者九种观点。

下面让我们看看,解释、评说苏联败亡解体原因的这九种理论、九种观点,究竟都包含了些什么内容。

先看看梅杜舍夫斯基依据现代俄罗斯文献,对俄罗斯学术界解释苏联崩溃原因的七种理论、七种观点所做的概括。

第一,是帝国论。这种理论把苏联看作是同其他大帝国相类似的国家,其解体也与这些帝国瓦解有着相似的各种原因,主要是在现代化条件下发生的政治不稳定和民族冲突。按照这种观点,帝国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它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帝国必须靠维持世界政治格局中各种力量的平衡,一旦失去这种平衡,就会导致“帝国走向极端”并引致解体和灭亡。这一类型的国家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国家规模巨大;二是,国家在民族构成上具有非单一性,就是说,它包括相当数量的民族,具有国家管理的超民族结构;三是,帝国的所有部分都是靠强有力来支撑。维系国家的基础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从经济到军事制度,从宗教到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相应的就是,一旦失去构成制度标志的其中之一,国家的解体就是不可避免的。提出这种观点的西方和俄国学者为数不少,笔者作为中国学者,第一次听到这一观点是在1996年,那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科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H.萨哈罗夫应邀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时介绍的。

对这一理论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帝国”是包含各种类型的国家,“帝国”这一概念本身就有不确定性,所以,很难划清“帝国”与“非帝国”的界限。在他们看来,在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构成都有相似的特点,无非是表现得弹性大小而已。这些持异议者还有一个论据,认为苏联与传

统殖民帝国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其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同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相比拟,恰恰相反,它们之间不完全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出于这方面的原因,A.H.梅杜舍夫斯基本人也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观点。

第二,是民族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把苏联国家解体的原因看作是没有形成具有明确价值观和公民身份的民族,或者相反,认为是“主体民族没能掌控国家局面”。而“就苏联的情况而言,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造成民族结构标志物的不稳定性,而形成民族精英之后,他们要求建立对本地区政权和资产所有权的监督和控制,并力图把资产私有化”。同样,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压倒苏联的弥赛亚思想而占据上风,成为主要的破坏因素。持这种观点的为数众多,一度在俄罗斯学界曾风行一时,并曾在一段时期内影响我国。

不过一些俄国学者认为,这一理论虽然有其表面上的说服力,但实际上偷换了因果关系,是用国家解体的结果来解释它的原因。就苏联的情况而论,倒是恰恰相反:是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现象产生了民族,并导致民族的分裂,而不是相反。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存在了那么长时期,而它瓦解后却重新建立了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这些学者拿出的论据是,有相当数量的多民族国家,如西班牙、大不列颠、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它们都是按民族区域分配权力和财富的,至今这些国家也没有解体。即便包括当今的俄罗斯联邦和后苏联地区的一些国家,也是如此。

梅杜舍夫斯基大体认同这一观点,并不同意民族主义是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

第三,是民族—人口理论。该理论把危机的原因“看作是对帝制国家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民族,遭到侵蚀而发生的民族关系的变化”,即,主体民族由占国家族群的多数转变为少数,因此,国家“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

包括梅杜舍夫斯基在内的一些俄罗斯学者,也不认同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虽然如实地描绘了崩溃前夕苏联民族—人口形势的变化,但没能对其他一些帝国崩溃的逻辑做出解释,因为那些国家的民族人口,并未发生上述数量上的变化。



1991年3月17日,戈尔巴乔夫与赖沙一起参加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决。

第四,社会经济理论。这种理论把苏联衰落的原因,看作是制度造成的缺乏经济效力,而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而是以计划经济和强制劳动为基础的。其后果是,社会发展停滞,政治制度断裂、革命危机爆发和苏联解体。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苏联这种类型的国家,在这方面像停滞不前的具有东方专制制度或专制皇权制度的国家一样,处于现代世界进程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而一当企图摆脱计划经济的困境,就会导致解体和垮台。按照这种理论,世界石油价格的暴跌就成了苏联不稳定的起爆器。这一观点是经济学家、叶利钦时期的总理盖达尔在《帝国的灭亡——现代俄罗斯的教训》(莫斯科2006年版)一书中提出的。

持异议的学者,对这种理论提出了三点驳论:一是,该理论没能对这种制度这样长期存在的原因做出解释,因为该制度先前他也曾遇到过这些经济困难,但却能够通过镇压的手段加以克服;二是,这种理论对下述问题也没能做出回答:为什么这种制度不垮台(这种例子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就不能使之适应新的经济条件;三是,该理论没能揭示出在国家激烈动荡后,传统的政权精英为什么能在事实上保存下来,因为其保存下来是造成他们接踵而来的专断复辟倾向的原因。

第五,是现代化危机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苏联在有效实现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以

后,却没能力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及时改革社会经济制度。”苏联在这时虽然还保持着对外扩张的势头,但无力改革却导致国家在技术和军事上的落后。这样,就在冷战中表现出了失败,也遭遇了意识形态的崩溃。于是,这种现代化的危机便转化为帝国的危机。这种观点,是由曾被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的俄科学院院士、西伯利亚分院院长B.B.阿列克谢耶夫等人表述的。

梅杜舍夫斯基对这种观点的说服力表示质疑,指出:这样说,“未必能解释得通苏联现象的本质特点,因为技术落后早已存在(惟其为克服技术落后这一任务,才使共产主义制度在其整个存在期间合法化),而意识形态瓦解和国家解体则发生在苏联军事强大的巅峰”。这就是说,用现代化危机理论来解释苏联的崩溃,不完全符合苏联的实际情况。

第六,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之为“阴谋论”。这种观点认为,苏联的解体和瓦解,是“一种全然预谋策划的行为”。这就是说,“是外部压力和内部阴谋,或者是二者里应外合把苏联搞垮的”。这种说法,主要是在戈尔巴乔夫后期被撤职的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其《改革:背叛的历史》和《大国的悲剧》这两本书中提出来的。这两本书多年前都已被翻译成中文,其观点为一些中国学者广为传播,所以,这一观点不仅为我国学界,而且为社会大众十分熟悉。

在传统上,凡解释革命和政变,往往都会提出类乎这种“阴谋论”的说辞。梅杜舍夫斯基认为,这种说法无法回答下述这个主要问题,即为什么像罗马帝国这样的国家,不能防范这类阴谋的发生,而同时,其他一些国家为什么又能成功地加以防范?在这位学者看来,每当一个国家被倾覆瓦解,与之有重大利害关联的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往往“诉诸带有浓重情绪色彩的论据,

诸如‘背叛民族利益’等等的说法,这是不可避免的”。言外之意是,情绪终归是情绪,代替不了理性的分析。梅杜舍夫斯基认同西方学者的下述观点:尽管苏联解体瓦解的“外部因素无疑是存在的,但没有理由将其绝对化”。这位俄国学者认为,这种“阴谋论”近乎个人决定论,事实上,这是把苏联解体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因素”或者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个领袖人物的虚荣和冲突”。

这样看来,这种“阴谋论”,是我国的一些学者,大多是半学者和半政治人物,从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等人那里原封不动搬过来的。

第七,综合论。这种理论以P.G.皮霍亚教授为代表,此人曾任叶利钦时期的国家档案局局长,现任俄罗斯国家行政学院一个教研部的主任,他不同意用一种主要原因来解释苏联的瓦解,认为“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瓦解苏联的唯一主要原因”。因为“苏联解体不是历史地决定着的,这就不是某一历史规律的体现”。持这种理论的学者,还包括这一类观点,认为国家垮台的原因是文明冲突论的结果,也是上述所有一系列因素,特别是民族种族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交相结合的结果。

梅杜舍夫斯基认为,文明冲突论本身就缺乏明确性,这使人们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运用这一理论,所以他看来,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同时他也认为,列举各种原因来解说苏联瓦解,意味着人们无法找到其中某一主要原因来准确诊断苏联的病症和死因。

从上述可以看出,梅杜舍夫斯基对上面提到的这七种理论,或者说七种观点,都一一提出了驳论。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集中论述了不认同上述一系列理论观点的理由,他认为:“所有这些理论,只是说明了现象的个别方面,无法作为包罗所有方面的因素令人信服。这些用单一因素和多因素的解释之所以缺乏说服力,其原因在于,它们无法揭示出危机各种变化情况的体制性关联;它们没有考量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因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可划分为整体性原因和短期性原因。这些解释之所以缺乏说服力,原因还在于,它们通常具有宿命论的特点,因为它们是从国家崩溃的预设性出发的,在这个意

义上也混淆了因果关系,没有分析在各个阶段存在的各个过程的变化,或者相反,它们也陷入了历史唯意志论的对立的极端,把事态归结为领袖人物的感情用事和失误。这些解释并不是排他性的,不是与其他解释不相容的,因为它们几乎都可以归结为整个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最后,这些解释也显得很不具体:假若苏联注定要解体,那为什么存在了这么长时间,而又为什么这解体又恰恰发生在20世纪末,而不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或20世纪60年代?须知,那时上述所有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存在的。这些理论总的缺陷是,它们实质上重复着人们在解释过去罗马帝国和其他帝国崩溃时所提出的论据,从好的方面说,它们是企图依据19世纪出现的理论,来解释现代史上的现象,从坏的方面说,它们是为此利用了当年那个时代本身的术语,而同时又依靠从苏联意识形态中因袭来的思想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就不能认为这些解释是完备的。”

梅杜舍夫斯基关于上述七种苏联解体瓦解原因论的这段话,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一、他虽然不认同对苏联解体瓦解的这七种解释,但他没有把这些解释同他的看法完全对立起来。他说:“这些解释并不是排他性的,不是与其他解释不相容的,因为它们几乎都可以归结为整个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这就是说,“整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才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而其他因素都是从这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因素派生的,“它们几乎都可归结为”这个体制。

我国读者中,可能会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这怎么说得通,难道能把认为“戈尔巴乔夫因素”是苏联瓦解主要原因的观点,同认为体制模式是苏联瓦解根本原因的看法协调起来吗?其实在我国,早有学者讲过,“戈尔巴乔夫现象”实质上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更确切些说,它是对斯大林体制“逆反效应的产物”:惟其曾有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才引发戈氏提出的“民主化”;惟其有斯大林惨无人道的“大镇压”,才会有戈氏要求的“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和“人道”,是针对斯大林的“非人道”和“专制独裁”而提出的;

他提出的“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正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逆反效应的产物”。所以说，“体制模式”是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并不排除其中这个“戈尔巴乔夫因素”；非但不排除“戈尔巴乔夫因素”，也不排除“叶利钦因素”、“赫鲁晓夫因素”、勃列日涅夫因素、苏斯洛夫因素、日丹诺夫因素，等等，因为所有这些人物及其活动，都无一不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无一不是苏联瓦解的或大或小的因素之一。

在我国学术界，有人太过强调戈尔巴乔夫个人因素对苏联解体作用的观点，有“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嫌疑而遭到人们否定以后，最近两年，这种观点又演变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共腐化变质说”，其实，“苏共腐化变质”，或早一些变或晚一些变，不管在张三手里变，还是在李四手里变，这也无不与“体制模式”相关联；因为苏共本身就是这种体制模式的产物。

至于上述对苏联瓦解原因的其他种种解释，也几乎无不同苏联这个具有“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这样或那样地联系着，因为它们都是由后者决定并派生出来的。

二、还应提请注意，梅杜舍夫斯基在这里把造成苏联危机的原因，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整体性原因”，一类是“短期性原因”。这种划分极为重要，过去在苏联解体原因问题的研究中，还几乎没见人提出过这种划分：所谓“整体性原因”，就是对苏联历史发展全过程，几乎在各个时期，在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影响的原因；所谓“短期性原因”，顾名思义，是只在某一时期，某一时段，或只在某个局部方面发生短时间影响的原因。通过这种划分，就可以在影响苏联瓦解的诸因素中，区分出轻重缓急和主次分量来，不至于对各种因素进行一、二、三、四，不分主次轻重地平行罗列，这样，就能从造成危机的大量因素中，进行比较分析、过滤筛选，突出最权重者。把这位俄国学者的这种区分，放在中国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毛泽东关于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思想。不过用梅杜舍夫斯基的概念，在这里便于更具体、深入地理解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其实，为了更全面、更易懂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在梅杜舍夫斯基这两个概念和范畴的基础上，再加以扩展，进一步划分出下面一些范畴和

概念，比如“全局性原因”和“局部性原因”；“长期性原因”和“短期性原因”；以及“全覆盖性原因”和“点线性原因”，等等。这样，就能把梅杜舍夫斯基提出的“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性原因，同经过信息筛选过滤，排除其信息杂质，吸取其合理成分之后的上述七种原因论，基本协调一致起来。所以，这位俄罗斯学者说，上述七种原因论解释“并不是排他性的”，它们几乎都可“归结”，并统一于“整个专制权力体制的多民族大国”。这就是说，这种“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是属于“全局性原因”、“长期性原因”、“全覆盖性原因”和整体性原因，而上述七种原因论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只属于“局部性原因”、“短期性原因”、“点线性原因”和“个别方面原因”。总之，“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性原因，是可以覆盖和涵括上述所有原因的。

梅杜舍夫斯基之所以对上述七种解释不加认同，就是因为它们之中任何一种原因论解释，都不能与“整个多民族大国”的“专制权力体制”性原因相比拟，因为只有这种“体制模式性”原因可对苏联历史过程产生这么长久、这么深刻，这么多方面、这么全局性的影响，可以全面覆盖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军事、外交和社会各个方面，对其各个时期的危机做出解释；而其他七种解释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起这种长期性、全局性的作用。而且，这位学者通过在后面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了这一体制模式性因素在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又怎样造成了苏联更大、更严重的危机。

在梅杜舍夫斯基看来，上述七种原因说之所以说服力不足，是因为它们大多因袭过往时代（19世纪）的旧说，来解释一个全新时代的现象；或者因袭苏联时期僵化的意识形态，来解释它自身的灭亡，这正像一个人自己来评价自己，用自己的话语来为自己辩解一样，是显得苍白无力，无以说服人的。况且，它们只能对历史过程做一个局部方面或某个时期、时段的说明，而不能进行全覆盖式的、全局性的、长时期的、总体上的说明。

二

梅杜舍夫斯基正是突破19世纪和苏联时期

的思维框架及思维局限,依靠信息认知论的方法,从历史分析的视角,用新的话语体系,对苏联瓦解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信息认知论是在信息化时代条件下解决信息认知方式的一种理论。在信息社会,通讯工具多样,计算机普遍应用,互联网发达,人们从各种渠道都能轻易获得或发布大量信息。这样,就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权和发布信息的自由权,以至于不限于书刊就能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然而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信息质量的问题,即所得信息是否经过了检验核实,是否确实可信可靠的问题。近些年在研究苏联解体瓦解原因问题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有些人拿出子虚乌有或虚无缥缈的材料,就来论证重大严肃的历史政治问题,比如,用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讲话”来论证他的“背叛”:这个讲话,后来经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查证,该国根本就不存在一所叫“美国大学”的高校,何来戈氏在这里的讲话?!

况且,经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核实,标明戈氏该讲话日期的那一段时间,戈氏就没到过土耳其。就是这样一件没经核实,只是在一个研讨会上被抛出的纯属于虚乌有的资料,就被我国某些学者到处引用。甚至在核实此材料为乌有的十年之后,不久前在我国被号称为最有权威的学术刊物上还在传播。近年,在谈论苏联解体问题时,一些学者运用类似这类乌龙性资料尤多,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正是根据信息社会中信息爆炸、出现信息质量问题这一现象,信息认知论才应运而生。它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各种验证方式保障信息及其来源的可靠性,以确保信息的质量可信度。

梅杜舍夫斯基正是依据这种理论和方法,对涉及有关苏联解体问题的信息及其来源,通过构建现实实在的认识动机,用信息可靠性标准对各种各样的信息加以筛选,区分真实信息还是过手(虚假)信



叶利钦和基里延科

息,是学术创造型信息还是转播宣传型信息,是经过操控腐蚀而变形的信息,还是真实直接的学术信息,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对信息来源者的历史意向和行为动机加以分析,就能鉴别、确定信息资源的质量来。这位严肃的俄罗斯学者,依靠这种严格的信息分析法和信息筛选法得到的资料,进一步通过历史分析,得出结论认为:

“苏联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但与俄帝国不同,它是自然而平静地灭亡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倒不是苏联的解体,而是它竟然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其长命的基本原因在于核武器的遏制作用),因为它既违背经济规律,又与人类理智的本性背道而驰。苏联不是被居心叵测的人搞垮的,而是由于人们认识到(官方也承认)它的结构模式的反常规性和无效能性而瓦解的;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苏联的基础。它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就像一栋房屋,是匆忙草率搭建起来的,它的整体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失去任何支撑能力。可以说说明这个论断的基本证据就是,在它垮塌之时,没有任何人起来对它进行维护。与此同时,也丧失了用全新性质形式构建政治体制的机遇,因为,精英们在全球化信息过程的背景下,恰恰不懂得如何构建政治体制的真正机制,不懂得掌握制度性参数,不懂得如何稳步而有计划地推进改革。这样一来,由于离心倾向超过向心倾向,在20世纪末全球化条件

下,这种体制的解体便成为不可避免。”

这段话言简而意赅,有关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重要论断尽含其中。笔者尽量严格按其原义并用易懂的语言翻译了出来。尽管如此,对于某些非专业读者恐怕仍显得不易理解,出于这一考虑,在此不妨再多费点笔墨,对其主要含义略作一些阐释。

第一,这里主要强调指出,“这种”苏联“模式”是其解体瓦解的根本性的、也是主要的因素。这位俄罗斯学者特别强调:“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立苏联的基础”,它是决定苏联解体瓦解的整体性因素,即起着全局性、长时期、全覆盖影响的因素:因为“这种模式”作为“苏联的基础”性因素,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从一开国到其历史的终结,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影响;它对苏联的作用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孔不入,超过前述各种原因论因素的权重和分量;前述七种因素都是由这个整体性因素派生出来,并由它所决定的。

前面曾经论及,在梅杜舍夫斯基看来,其他七种原因论解释与他的“体制模式说”,并不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而是前者可“归结于”后者,后者可涵括前者。这样看来,梅杜舍夫斯基实际上是依靠信息认知论的方法,排除前者在学理和资料信息上的一些非理性成分、附加杂质和虚妄因素之后,在前七种原因论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对苏联解体原因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是对以前研究成果的提高、锤炼和升华。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也提出了较为独特的解释。在苏联解体的“现实原因”方面,梅杜舍夫斯基没有责难个人,而是归结为整个“精英集团”,归结为他们不懂得“在全球化信息过程的背景下”怎样进行政治改革,不懂得“如何构建政治体制的真正机制”,如何一步步“有计划地推进改革”。而且,这个“精英集团”在改革问题上纷争不断,曾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和对抗,这样就贻误时间,丧失了改革的最佳机遇,最后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解释与我国学界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把苏联解体灭亡的责任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个人及其在改革上的错误和失败,而是将责任归之于整个“精英集团”。这倒是别开生面,应该引以深入思考的。

从梅杜舍夫斯基的结论看,他关于苏联瓦解的“体制模式说”,倒是同我国俄罗斯问题研究者多数主流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客观地说,他的论证更深刻一些,方法论显得更严谨。不过,我国学界就“体制模式说”提出的时间,要比这位俄罗斯学者早得多;我国学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就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这种观点,较之他在2010—2011年提出,要早了10多年时间。

就世界学术界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学界,是对苏联瓦解原因问题研究最给力的国家,我们两国投入的力量最大,对问题开掘得最深,因而取得的成果也最为显著。就目前我们对俄罗斯学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可以说我们两国学者得出的结论,是殊途同归,相当一致的。在两国学术界,分歧和激烈争论都存在,但这是表面现象。剔除一些学者在学理、动机上的非理性,以及在资料信息上的虚妄杂质外,总的来看,几乎把苏联解体瓦解原因的所有因素都可以归拢、统一于“体制模式说”这一总的结论中来。

为了说明整个问题,在这里笔者不妨举出一个饶有趣味的例子。我国有一个学者,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上,他认为,是思想、组织和政治“三大主要原因”造成的;在这三大原因中,每一原因的现实因素和历史因素,在他看来基本是各占一半。说实在的,这种看法较之“王小石”的观点,更客观一些,但基本属于“王小石”观点的范畴。这种看法可以说是他预先形成的定见,是“先入”的观点。但在论证问题的过程中,他通过对“三大主要原因”的阐述,在做结论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综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长期的思想理论混乱是基础性原因,长期的组织政策失误是关键性原因,而实行‘革新思维’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这里明显表现出了这位学者“先入论断”与其“下意识”“逻辑结论”的矛盾:在该学者那里,是历史逻辑的强大力量在一念之间占了上风,让他得出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思想、组织和政治)三大主要原因”是“基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模式”之上的结论;而这一结论正是同他在文章开头,甚至同这句话后半句得出的“先入论断”相矛盾的。从这个例子可以明显看出,属于王小石(下转57页)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3年第9期刊登的李国芳《1947年内人党重建风波》一文,与近年贵刊发表的另二篇有关文革时内蒙古“打内人党”事件的文章一起,为我们不应遗忘这起全国文革史上死人最多的最大冤案,起了很好的作用。只是李国芳文中涉及的一个重要历史问题应当予以澄清。依李文中的叙述,似乎特木尔巴根、哈丰阿等人原来的身份都只是日伪政权高官。事实是:特木尔巴根、朋斯克、乌力吉敖其尔(乌献文)都是1925年与乌兰夫同时期赴蒙、苏,特、朋、乌入学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乌兰夫上的是中山大学。特、朋留苏期间加入苏共,乌兰夫此前已是中共党员,乌献文的身份是内人党员(198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正式确认乌自1925年5月赴蒙时参加革命)。1928年,乌献文奉共产国际指示回国搞地下工作。1929年,特、朋、乌兰夫等同时同批奉共产国际指示回国,特、朋(包括乌献文)等以内人党名义,乌兰夫等以中共身份分头开展工作。哈丰阿等一批东蒙古革命青年,就是特、朋等秘密发展加入内人党的。“九一八事变”后,特、朋、乌、哈等奉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明确指示,打入日伪政权,长期潜伏,宣传抗日,积蓄力量。1938年,朋斯克赴蒙古国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碰”上肃反被囚,1945年战后才获释回国,特、哈、乌等从此失去了上级(共产国际)组织联系。

1947年,哈、特、朋、乌等人提出重建内人党,实际上秉持的仍然是过去共产国际(苏共)提出并领导实施的内蒙古革命由内人党直接领导的方针,而对中共中央已适时改变了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方针,缺乏基本的了解和领会。当时,这些人都已加入或转为中共,并且同时提出内人党置于中共统一领导之下。所以,李文最后指出这是“一次党内争论”,符合历史事实,当时中共上级领导机关也是这样对待和处理的。事后,这些人继续并一直担任着内蒙古党政军高层领导职务。亦因于此,乌兰夫于1948年笼统地称这场争论是与代表封建上层利益者们的“两条道路斗争”,是不够客观、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此外还应指出,李国芳文中说1925年的内人党初名内蒙古国民革命党是不准确的,其蒙古文原

文(即李文所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拉丁转写)从未改变,只是汉译有过多种,亦非1927年正式改译。李文称哈、特等人为原“伪蒙疆政权”(内蒙古西部)官员,也是错的,应是东北的伪满兴安省政权。文中两次出现此称,显然不会是笔误。

白拉都格其(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教授)

更 正

2013年第7期《关于〈雅可夫列夫访谈录〉》一文中,提到1991年发生在前苏联的一场著名政变:“9·18”政变不就是“好汉们”上演的一出“螳臂当车”吗?(第83页)。这句话里的“9·18”政变应为“8·19”政变。

北京读者 江棋生

2013年第8期《1933年四川兵灾》一文中提到的“绥定”应改为“达县”(详见第25、27页)。作者所说的“绥定”特指绥定府辖内的达县,绥定府于1913年被废,因此1933年时已不存在“绥定”这一地名。

四川读者 张郑武

2013年第8期“读者来信摘登”中,有关晏福民的学历,应改正为1939—1946年在重庆南开中学,1946—1948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北京读者 周其湘

今年第7期第41页最后两行应为:“接着,1965年末至1966年1月初(原稿误为1966年末至1967年1月初),在古巴哈瓦那举行了亚非拉三洲人民团结大会,”作者谨向读者致歉。

穆广仁

2013年第8期第30页右栏第3段中的“樊功”,应改为“懋功”。

2013年第8期第85页的配图文字有误,应为“丁惠康(右)、张澜(中)、罗隆基(左)”。

2013年第8期第32页左栏第1段中的“著名作家杜宣”应为“著名作家杜宣”;第34页第5段中的“陈麟章”应为“陈麒章”。

本刊今年第9期第39页所刊图片,说明中说“在中南海合影”有误,该照片拍摄地点是故宫警卫连连部。

书名

张发奎口述自传	张发奎口述	夏莲瑛访谈及记录	56.00	9.00
南非的启示		秦晖	78.00	9.00
思痛录		韦君宜	35.00	7.00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128.00	11.00
斯大林的战争		杰弗里·罗伯茨	69.00	10.00
国史札记(人物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我的朝鲜战争 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张泽石	23.50	6.00
1949 我不在清华园		张泽石	23.00	6.00
回忆与研究(上下)		李维汉	75.00	12.00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合战:1945-1949	蒋永敬	刘维开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		资中筠	29.00	7.00
雾露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晖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我眼中的改革	[德]汉斯·莫德罗		45.00	8.00
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主编		59.00	9.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雷颐	32.00	7.00
观念的水位		刘瑜	36.00	7.00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孙越生	35.00	7.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黄道炫	48.00	8.00
蒋介石初上台湾岛(1949—1953)	李庆	根志优	58.00	9.00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金雁	68.00	10.00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左凤荣等	246.00	20.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48.00	8.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个“秀才”		张希贤	56.00	8.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	148.00	18.00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诚	38.00	6.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著	29.50	7.00
苏北利亚		于疆	22.00	6.00
《转折》《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李晨主编	72.00	12.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11.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19.00	12.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国家记忆(一)		章东磐	98.00	10.00
国家记忆(二)	章东磐	晏欢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戈叔亚	28.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袁天鹏	48.00	8.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七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频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216.00	26.00
母亲杨沫		老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鬼	38.00	6.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高岗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黄宗良等	246.00	20.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黄苇町	26.00	7.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吴东峰	28.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杨天石	60.00	8.00
我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38.00	6.00
我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奎松	54.00	9.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朱正	26.00	7.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冯建辉	16.50	5.00
走出个人崇拜		薄一波	88.00	11.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沈宝祥	39.80	8.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杨显惠	34.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25.00	7.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图书介绍

《思痛录》 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作者痛定思痛,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回忆是真诚的,反思也是深刻的,以新的视角,给人们启发和教益。文章以深刻反思和强烈的批判意识,表现出作者愤怒、痛苦、懊悔、自省的复杂情感,当愤慨地谈到那场荒谬的“反右”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作者当时已痛悔自己走错了人生道路,错误地加入共产党,投奔延安,“如果在一九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她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谈到民主党派中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如储安平、章乃器、罗隆基等人时说:“他们参加政协,“哪里晓得只有吃饭和鼓掌的权利?”……

作者追述往事,也反省自己,痛恨自己被党性所迫,在“反右运动”中“也干了些违背良心”的事,“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这些沉痛真言、是对荒谬年代里人情世态和政治风云、民族悲哀的剖析,直面惨痛历史,勇敢的暴露黑暗,思考和总结我们的历史。显示出一个有头脑、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真诚品格。

韦君宜女士感叹:“这是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

《陈独秀全传》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在中国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但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1929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因他转向托派而被开除出党,之后又被扣上: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主义、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十多项罪名。如果独立思考和以科学的态度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重新考察,这些所谓的“罪名”均不成立,除了“汉奸”罪名是完全诬陷外,有的则属于权力掌握者的“理论解释权”(成王败寇)的产物,有的则是把革命阵营中的不同意见“妖魔化”的结果。在正义的立场上,此为中共党史上的最大冤假错案。

本书充分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详尽梳理了陈独秀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他与共产国际、中国托派、民主党派和国民党的复杂多变和纠结的历史关系,以全新的观点和视角对陈独秀有一个重新评价!

《张发奎口述自传》: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的张发奎,晚年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口述的自传,本书讲述了张发奎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以及不同时期他对蒋介石的看法和评论、国民党的高层决策内幕,更道出了国民党党内的种种秘密,也讲述了他眼中中国共两党及人物的品格。他的口述自传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北伐、抗日、国共战争史,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见证历史，传承文化！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印文集自传、家史家谱



沙龙与讲座

- 老人出书沙龙：凡在本机构签约出书的作者，均可申请举办一期专题讲座或亲友聚会，回味生活、交流心得、分享愉悦！正规出版的组织举办签名售书活动。
- 寻根修谱讲座：欢迎自荐或推荐家族、姓氏文化研究者、爱好者开办“姓氏文化”或“寻根修谱”讲座，重点讲座我们将在媒体推介。



服务热线: 010-6892 0114 6252 5116

接待地址: 北京中关村海淀图书城“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邮编 100080

网 址: 《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文化网》(www.jzwhw.net)



全国免长途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代理出版：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千元，300页印刷100本6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010-57223540 58426176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7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自费出版网）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A类出版作品展示



B类出版作品展示



悼于光远老

吴江的“意外遭遇”

安志文谈高岗

川北的红军“冤烈”

汪东兴：毛泽东不同意江青进常委

改革要有时间表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 元